

HUANGPU

黄埔

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为黄埔同学立言 为祖国统一尽力

双月刊 总第224期
2025.5

随“山河为证”策展人寻访黄埔旧址

回忆炮兵生涯

春城飞花处，翠湖藏军魂

山河重光日月新 ——纪念中国对日受降80周年



目录

特别策划

山河重光日月新——纪念中国对日受降 80 周年

- 6 中国对日受降述略 / 姚新婧
20 一纸降书出芷江——芷江洽降纪实 / 王园
26 南京受降始末 / 贾伟龙
32 故宫太和殿受降 / 李慧敏
-

时政

黄埔之声

- 40 黄埔军校在祖国统一进程中的时代价值 / 王海青 李立

两岸纵横

- 44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5 年 6 月—7 月 / 吴亚明

军事天地

- 48 解码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那些“明星武器”（中） / 石稼

情系黄埔

- 54 随“山河为证”策展人寻访黄埔旧址 / 单补生

人物

人物春秋

61 徐会之在抗战中的二三事 / 童吉怀

我的黄埔前辈

64 忆祖父陈明仁(下) / 陈湘生

历史

口述历史

71 回忆炮兵生涯

/ 口述:潘章雄 采访:孙晓明、黄炜炜、魏钟曼 整理:黄滢

黄埔往事

76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从南口抗战到忻口会战的黄埔军人 / 傅克刚

文化

文化黄埔

83 “纸上论兵”亦不凡

——慕中岳的《中国战争史·第一卷》 / 蒲元 马砚斌

锦绣中华

90 春城飞花处,翠湖藏军魂

——记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办学地昆明 / 赵灿林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5 年 9 月 3 日)

习近平

全国同胞们，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代表，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全体受阅将士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共同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

政协、中央军委，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各国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暴、自立自强的伟大民族。当年，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今天，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全军将士要忠实履行神圣职责，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新时代新征程，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山河重光 日月新

—— 纪念中国对日受降 80 周年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日本侵华战争更是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尊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日本投降，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对日受降是对

侵略行为的正式否定，是反法西斯阵营“正义战胜邪恶”的具体体现，不仅终结了日本的侵略扩张，更向世界传递了“反对侵略、捍卫主权”的正义理念。中国对日受降更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自强的标志，由此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受压迫、被欺凌的历史命运，重塑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从此开始以掌握自身前途命运的坚毅形象步入世界民族之林，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对日受降的一系列过程以及相关档案成为铭记历史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依据和警示基石。这一历史过程再次印证了一个永恒的命题，那就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 姚新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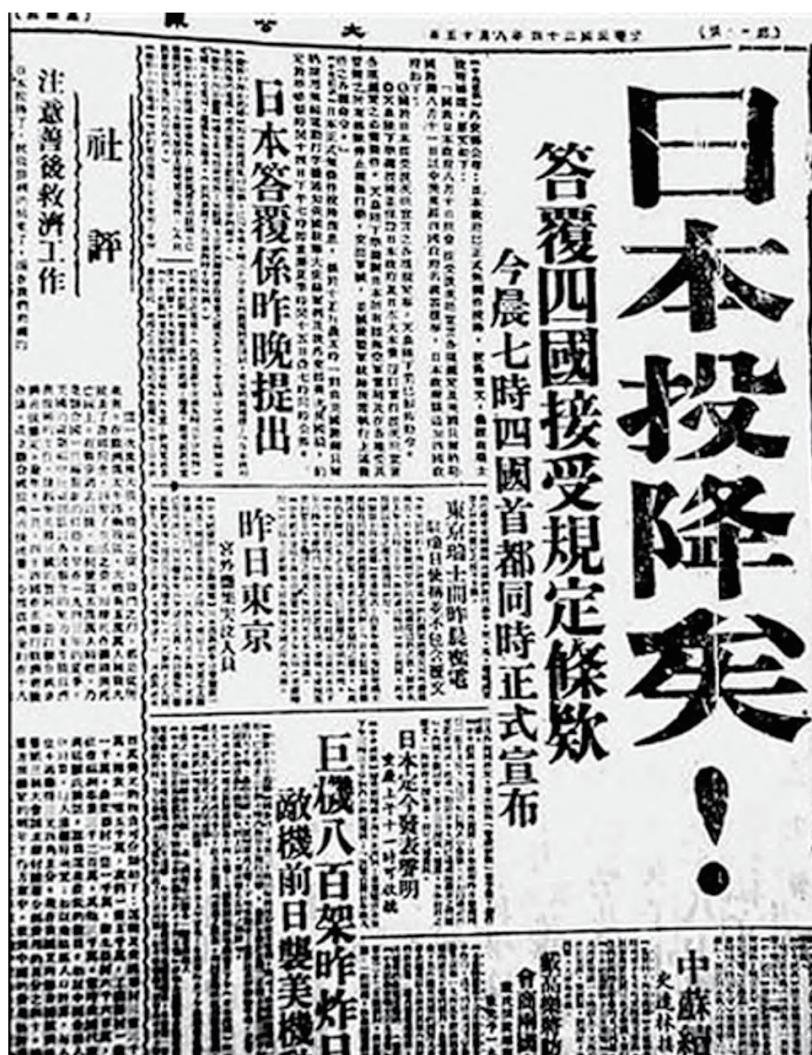


中国对日受降述略

□ 姚新婧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的对日受降工作随即展开。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之一，接受日本投降的一系列过程，见证了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后的伟大胜利，彰显了亘古不变的人类公平正义。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中国战场的全面反攻、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逼迫日本统治集团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苟延残喘的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两国政府向中、苏、美、英四国转交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8月15日上午7时，中国外交部接获日本致中、美、英、苏正式投降电文。中国按照同盟国所划分的受降区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国（未包括东北地区，含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日本投降代表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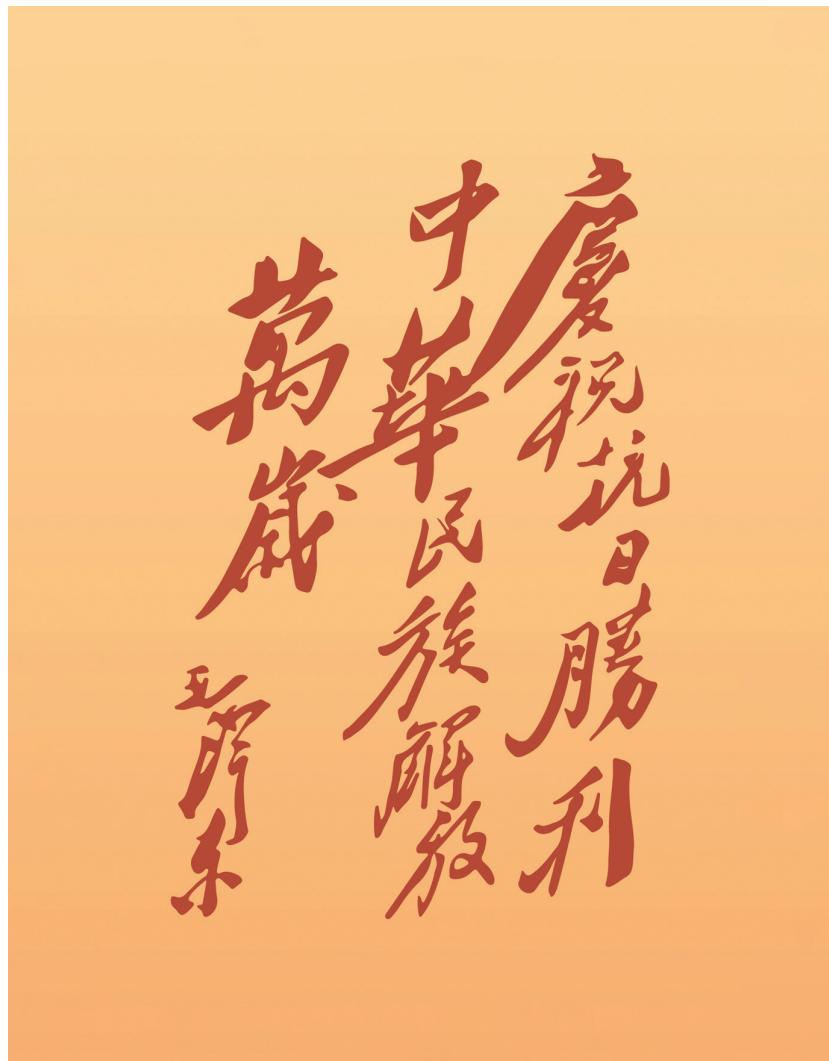


/《大公报》“日本投降矣”的相关报道。

8月15日下午5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电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

知其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黄埔军校

总教官)的命令。电令中规定的接洽地点是上饶第三战区的玉山机场,但由于玉山机场跑道经大雨冲刷损坏,飞机无法降落,于是改至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湖南芷江。8月17日,蒋介石复电冈村宁次:“八月十七日电悉。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选在芷江洽降,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能够避免在日占区(玉山属于日军占领区)洽降的危险,最为安全;同年4月至6月的芷江保卫战即湘西会战,打得日军狼狈不堪;芷江是通往西南的必经之路,又是大后方联系前线的纽带,交通条件较好,曾经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中美空军联队的大本营,拥有中国战区第二大军用机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芷江最终被定为洽降地。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等人及中国战区各受降主官先后抵达芷江。8月21日,冈村宁次派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飞赴芷江洽降。当天下午,萧毅肃代表何应钦接受日军洽谈投降事宜。今井武夫交出了侵华日军的兵力分布概要图等文件和表册,并在记载着投



/毛泽东题词“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上签字盖章。

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8月27日,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黄埔军校1期生)率官兵百余人由芷江飞往南京,建立中国陆军总部南京前

进指挥所,受理日、伪军投降事宜。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应邀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警卫人员共近千人。



/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投降全权代表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国受降全权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在投降书上签字，交由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名、盖章。至此，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全过程约 20 分钟。随后，何应钦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典礼顺利完成，并说：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指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中国战区 16 个受降地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就开始拟定各战区、各方面军受降以及控制要地的兵力调动计划。8 月 20 日，何应钦率领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到芷江，一方面处理芷江洽降事宜，另一方面准备各地区的受降工作。26 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 16 个受降区、100 处缴械点，并指定了各地的受降主官。27 日起，何应钦飞赴各地转告芷江洽降经过和部署受降工作。南京的受降签字典礼结束后，16 个受降区的受降工作陆续展开。其中，上海南京地区、山西地区、杭州厦门地区未举行正式受降仪

附表五

中國陸軍各地區受降主官，地點日本軍責任者及部隊等一覽表

／中国陆军各地区受降主官、地点、日本军责任者及部队一览表。

式。其他地区的受降仪式大多是参照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受降与9月9日南京受降的典礼模式，由中国军队受降主官主持受降仪式，该区日军投降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盟军与中国官兵、地方官员和新闻记者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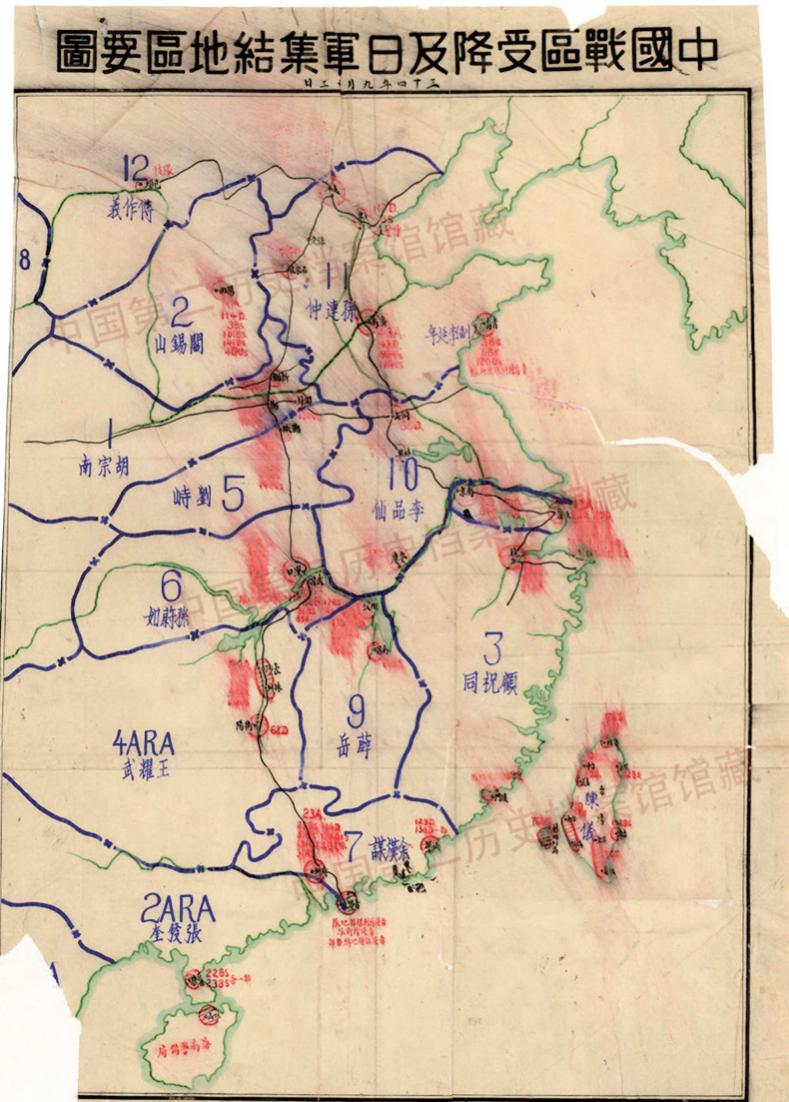
第一战区新郑地区受降。新郑地区受降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黄埔军校1期生）为受降主官，指挥第一战区所属部队，负责接收郑州、开封、新乡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日军投降部队有第110师团，集中地点在洛阳；第6骑兵

团、第 22 军，集中地点在新乡；第 10 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郑州。9 月 22 日，受降仪式在郑州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胡宗南正式接受鹰森孝投降。

第二战区山西地区受降。山西地区受降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为受降主官，指挥第二战区所属部队及第一战区的3个军，负责接收山西省。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1军司令官澄田赉四郎。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军、第114师团、第3独立旅团、第10独立旅团、第14独立旅团、第5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太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

“（1945年）9月13日，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日军澄田賛四郎派山冈道武少将为代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为代表），未举行仪式。”

第三战区杭州、厦门地区受降。杭州、厦门地区受降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黄埔军校教官）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负责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日军投降部队第13军、第133师团、第62独立旅团、第91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杭州；海军陆战队集



/ 中国战区分区受降及日军集结地区示意图 (1945年9月13日)。

中地点在厦门。9月4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杭州富阳洽谈受降事宜。9月13日，顾祝同在南京参加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后，飞抵杭州。当天下午，他会见媒体发表谈话，

称第三战区按照陆军总部要求，不再举行受降仪式。9月15日，顾祝同在杭州召见松井太久郎的代表——日军第133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规定自9月16日至18日，杭州附近日军必须向中方缴枪。

第五战区许昌、郾城地区受降。许昌、郾城地区受降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黄埔军校教官）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负责接收郾城、襄阳、樊城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也为鹰森孝。日军投降部队第115师团、第14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郾城；第13独立骑兵团、第92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许昌；第4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商丘。9月20日，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刘峙正式接受鹰森孝投降。

第六战区武汉地区受降。武汉地区受降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负责接收武汉、沙市、宜昌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日军投降部队第132师团、第5独立旅团、第11独立旅团、第85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汉口；第12独立旅团、第86独立旅团、第88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武昌。9月18日下午3时，受降仪式在湖北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孙蔚如正式接受冈部直三郎投降。

第七战区潮汕地区受降。潮汕地区受降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

负责接收曲江、潮汕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第23军司令官兼香港占领地总督田中久一。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4师团、第130师团炮兵大队及潮汕支队等，集中地点在汕头。9月28日，受降仪式在汕头市外马路131号潮汕前进指挥所举行。第七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代表余汉谋主持受降仪式，田中久一的代表军参谋长富田直亮签字。

第九战区南浔地区受降。南浔地区受降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黄埔军校第一分校校长）为受降主官，指挥所辖部队及第73军负责接收南昌、九江等地。薛岳任命第58军军长鲁道源为南昌受降主官、新3军军长杨宏光为九江地区受降主官。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兼第11军军长笠原幸雄。日军投降部队第11军、第13师团、第58师团、第22独立旅团、第84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九江；第7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南昌。9月5日，九江受降仪式在柴桑巷新3军司令部大院（今柴桑路的军分区院内）举行，杨宏光正式接受笠原幸雄投降。9月14日，南昌受降仪式在第58军军部礼堂举行，鲁道源正式接受笠原



/ 1945年9月，入越受降的中国第一方面军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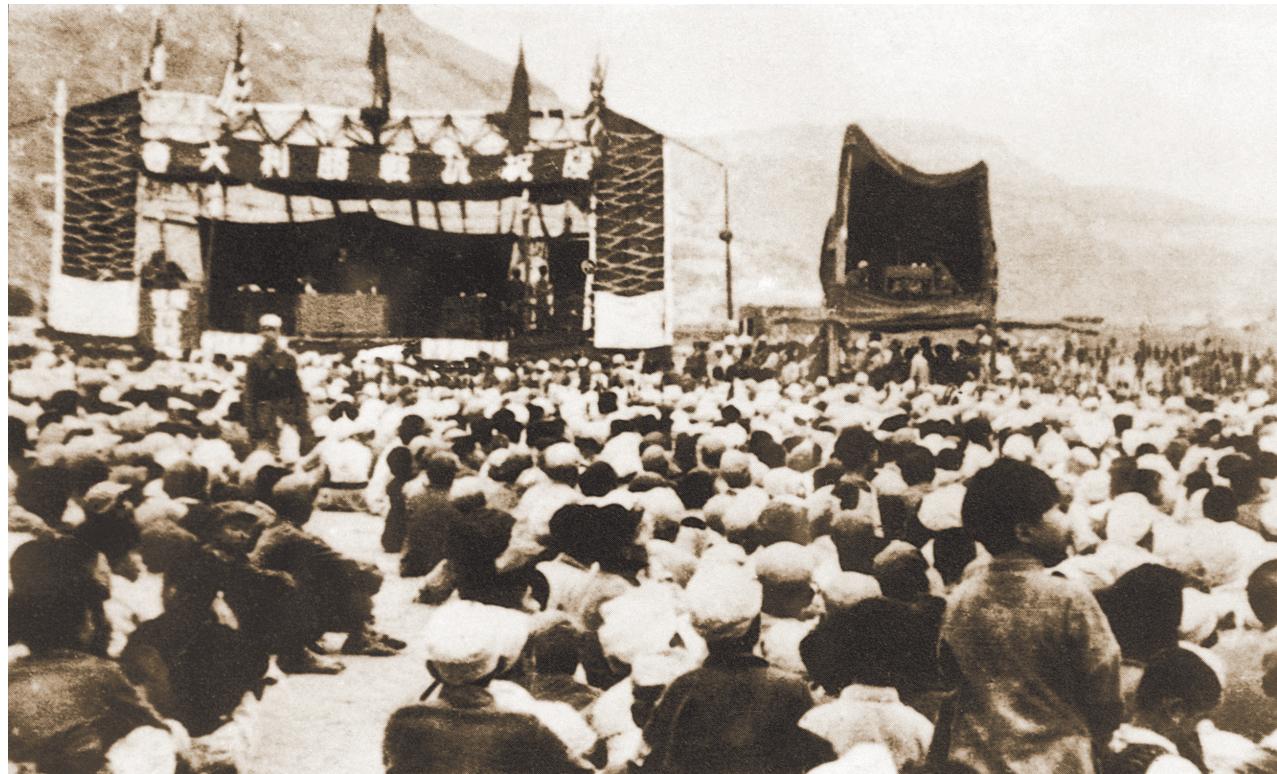
幸雄投降。该区是16个受降区中第一个举行受降仪式的地区。

第十战区徐海地区受降。徐海地区受降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黄埔军校第一分校主任）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负责接收徐州、海州、蚌埠、安庆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日军投降部队第65师团，集中地点在徐州；第70师团、第1独立骑兵旅团集中地点在蚌埠；第131师团、第6独立团集中地点在安庆。9月24日，受降仪式在安徽省蚌埠市二马路省府会议厅举行，李品仙正式接受十川次郎投降。

第十一战区平津地区受降。

平津地区受降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为受降主官，指挥新8军、新30军、新31军、新40军，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兼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日军投降部队第118师团、第9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天津；第3骑兵旅团、第2独立骑兵旅团、第3独立骑兵团、第8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北平；第7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保定；第1独立旅团、第2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石家庄。10月10日，受降仪式在北平故宫太和殿举行，孙连仲正式接受根本博投降。

第十一战区青济地区受降。



/ 延安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青济地区受降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生）为受降主官，指挥山东挺进军、第19集团军所属第12军、第17军，负责接收青岛、济南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43军司令官细川忠康。日军投降部队第43军、第47师团、第9独立骑兵团、第11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济南；第5独立旅团、第12独立骑兵团、第1独立旅团及海军陆战队集中地点在青岛。12月27日，受降仪式在济南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

藏”楼举行，李延年正式接受细川忠康投降。

第十二战区包绥地区受降。包绥地区受降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负责接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区。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也为根本博。日军投降部队第21独立骑兵团、第24独立骑兵团及热河省内日军部队，集中地点在包头等地。9月28日，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投降。该区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最北端的地区。

第一方面军越北地区受降。越北地区受降以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为受降主官，指挥第52、第60、第62、第93军，暂编第19、第23、第93师等，负责接收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日本投降代表为入侵越南的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投降部队主要有第38军、第21师团、第22师团和第34独立旅团。9月28日，受降仪式在越南河内总督府举行，卢汉正式接受土桥勇逸投降。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是中国军队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以

战胜者的身份到境外接受侵略者的投降，也是中国战区 16 个受降区中最南端的、唯一一次跨国受降。

第二方面军广州、海南岛地区受降。广州、海南岛地区受降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指挥第 46、第 64 军负责接收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新 1 军、第 13 军负责接收广州、香港（后改为英国接受）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也为田中久一。日军投降部队第 23 军、第 13 师团、第 104 师团、第 129 师团、第 130 师团以及第 13 独立旅团、第 23 独立旅团、第 81 独立旅团，集中地点为广州；第 22 独立旅团和第 23 独立旅团一部，集中地点为雷州半岛；海南警备部队集中地点在海南岛。9 月 16 日，受降仪式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张发奎正式接受田中久一投降。

香港地区本属于中国战区受降地区范围，但英国蓄意恢复对香港的统治，拒绝由中国战区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争夺香港受降权，并获得美国的支持。中国政府与英美多次交涉，最后中英协商，由英国海军少将夏悫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1945 年 9 月 16 日，受降仪式在香港



/ 香港同胞欢庆抗战胜利。

总督府举行，夏悫正式接受日本香港陆军司令官冈田梅吉和日本海军华南舰队司令官藤田类太郎投降。中国政府派遣以潘华国为首的军事代表团、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出席了受降仪式。

第三方面军京沪地区受降。京沪地区受降以第三方面

军司令官汤恩伯（黄埔军校军事教官）为总受降官，指挥新 6 军、新 74 军，负责接收上海、南京等地。日军在上海的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 13 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日军投降部队为第 13 军、第 27 师团、第 60 师团、第 61 师团、第 69 师团、第 89 独立旅团、第 90 独立旅



/ 南京市民欢庆抗战胜利。

团，集中地点在上海。在南京地区，受降主官为新6军军长廖耀湘（黄埔军校6期生）。日军在南京的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6军司令官十川次郎。日军投降部队为第6军、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第161师团、第13飞行师团，集中地点在南京。因南京已经举行过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所以京沪地区不便再举行一次受降仪式。9月11日，汤恩伯在上海召见日军指挥官，交



/ 10月25日，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

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

第四方面军长衡地区受降。长沙衡阳区受降以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黄埔军校3期生）为受降主官，指挥第71军、第100军及原在长沙、衡阳地区的部队，负责接收长沙、衡阳、岳阳等地。该区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日军投降部队第20军、第64师团、第81独立旅团、第82独立旅团、第2独立骑兵团，集中地点在长沙。另外，第68师团集中地点在衡阳。第116师团、第17独立旅团集中地点在岳阳。9月15日，受降仪式在长沙湖南大学科学馆举行，王耀武正式接受坂西一良投降。

台湾地区受降。台湾地区受降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为受降主官，指挥所属部队，负责接收台湾、澎湖等地。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日军投降部队为第十方面军、第9师团、第12师团、第50师团、第66师团、第71师团、第8飞行师团、第75独立旅团、第76独立旅团、第100独立旅团、第102独立旅团、第103独立旅团、第112独立旅团及澎湖守备队，集中地点在台北、新

竹、苏澳等地。10月25日，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更名为中山堂）举行，陈仪正式接受安藤利吉投降。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日自主受降

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地位垄断受降权，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对此，中国共产党力争解放区军民应有的受降权。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先后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该予以坚决消灭。1945年8月15日下午3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电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同日，朱德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电报，指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

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及其他抗日武装也突破国民党方面的限制，在各地发起进攻，迫使日、伪军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古北口受降。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并迅速击溃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古北口是连接华北、东北和内蒙古的重要长城关口，1933年3月被日本关东军侵占，是密云地区最大的日伪据点之一。8月14日，苏军占领古北口。9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苏军一起在古北口日军军营操场举行受降仪式。受降仪式由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李守善和苏军师长乌里涅夫共同主持，正式接受日军在古北口最高长官本野以及48名日军的投降。9月19日，苏军将古北口正式移交承兴密联合县政府。

宝安群众武装配合部队受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 9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苏联红军一起接受古北口地区日军投降。



/ 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展厅复原的受降仪式场景。

宝安县南头、深圳、新桥、布吉、平湖等地日军大部撤走剩

下少数日、伪军盘踞在南头、西乡、固戍几个据点。此时，

东江纵队第一支队主力已调走，中共东宝县委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依靠群众武装对日、伪军进行迫降。当即将龙华、民治、布吉抗日自卫队（民兵）编为1个大队，周吉、刘鸣周任正、副大队长；观澜抗日自卫队编为1个大队，张仲亭、黄来任正副大队长。第一支队宝太线特派室、宝深线特派室，在抗日自卫队配合下迅速行动，以张仲亭大队包围深圳墟，以周吉大队和当地抗日自卫队包围南头城、西乡、固戍等日、伪军残存据点，进行迫降。8月19日，宝太线特派室在抗日自卫队配

高郵戰役全體戰勝骨體英雄模範合影



/ 高邮战役全体战斗英雄模范合影。

合下，收复西乡、固戍，迫使伪军两个连投降。8月20日，宝深线特派室率领抗日自卫队进入深圳墟，接受伪区署和惠阳县警察大队投降，收缴各种枪械300多支。8月23日，第二支队收复沙头角、平湖。8月30日，宝深线特派室接受驻南头城日军和宝安县伪县政府、伪联防大队投降，收缴各种枪械600多支。

沙沟受降。日军无条件投降后，驻扎在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一带的日军拒绝投降，并于11月29日携带枪械逃离鲁南。鲁南铁道大队得到情报后，

果断将沙沟站南韩庄段铁路炸毁，切断日军的去路。同时，将临城站南的铁路破坏，迫使日军进退两难，最后集结于沙沟一带，被团团包围。12月1日，铁道大队政委郑惕、大队长刘金山在沙沟车站附近正式接受日军投降。这次受降仪式上缴械投降的有：日军太田的铁甲列车大队、小林的铁道警备大队、滕县中队和临城中队、铁道青年队第6大队、铁路警察和矿警、日军军属及商业机构职员等，共2000余人。他们共交出山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400多支、

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

高邮受降。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已经收复了华中敌占区的大片土地。但是，位于苏皖解放区南面的高邮仍被日、伪军占据，他们拒不缴械投降，并将原驻扬州的日、伪军调集至高邮，妄图负隅顽抗。12月19日，新四军主力组成的华中野战军由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指挥，向高邮拒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仅仅用了一周时间，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即为高邮战役，也被称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26日凌晨，高邮城内举行了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仪



/ 张家口民众庆祝抗战胜利。

式。受降仪式在原日军驻高邮指挥部礼堂（今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举行，华中野战军第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新四军正式接受侵华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投降。

华丰受降。1946年1月23日，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官叶飞率部在山东省泰安以南、华丰矿区以东的东太平庄附近，包围了拒绝投降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43军第11独立警备队（警备队相当于旅团，队长为

洼田武二郎，所以又称洼田旅团），迫使日军交出40多节车皮的武器装备。之后，又在泰安以南、北大关以北洼地包围了一部分日军，迫使其放下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在华丰地区收缴日军各种炮11门、轻重机枪56挺、步马枪800余支、汽车37辆，各种炮弹、子弹数十万发及大批其他物资。华丰受降是新四军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中国参加同盟国对日受降

1945年9月2日9时，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右舷甲板上举行。中国战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出席。9时4分，日本天皇和政府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日军大本营投降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9时8分，麦克阿瑟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身份签字。然



/ 中国政府代表徐永昌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后接受投降的 9 个同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澳大利亚代表布莱梅将军、加拿大代表哥斯格洛夫上校、法国代表莱克勒将军、荷兰代表欧英将军、新西兰代表伊席特将军。日本向同盟国

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对日受降的本质，是以法律程序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文明重生，为中国的近代屈辱史画上血与火的句号，极大振奋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国对日受

降，印证了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必然失败的历史规律，警示“强权必败”“和平必昌”的人类公理，既是中华民族捍卫民族尊严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

一纸降书出芷江——芷江洽降纪实

□ 王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21日，中国政府首次与侵华日军在湖南芷江就受降具体事宜进行接触商谈，这成为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起点，揭开了侵华日军正式投降的序幕。

历史选择定芷江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6条投降原则，命令他通令所属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但冈村宁次对此置之不理，甚至在收到日本天皇广播的投降诏书后，也不愿意接受现实，还发电请求继续作战。次日，大本营命令他立

刻停止战斗，他一面电令下属即刻停止军事行动，一面指示军队“停战交涉未有行动之前，敌若来攻，为了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虽然他一再自称“停战”，却只字不提无条件投降。显然，他根本不承认日本投降的现实，妄图继续负隅顽抗。

此时，中国政府已将中日双语投降电文与《告沦陷区同胞书》印成了上百万份传单，由航空委员会派8架专机向沦陷区各城市散发，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冈村宁次的强硬态度逐渐发生变化，8月17日下午复电蒋介石，准备派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为代表赴玉山。但此时中方已重新考量：江西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肯认输。如果在玉山进行洽降，在心理上不能给日本降使造成压力，在安全保障上也不利于洽降的顺利进行。洽降地点改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有很多争论。

8月17日上午，在讨论洽降选

址问题的会议上，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建议将洽降地点由江西玉山改至湖南芷江。之所以这样提议，魏德迈有三点理由：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6军也驻在芷江；第二，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外加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洽降部队机动；第三，“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刚结束的芷江保卫战即湘西会战，打得日军损失惨重，不堪回首，这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把洽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挫日军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其实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他们有所戒惧。

于是，8月17、18日两封

电报，确定了芷江为洽降地，要求日降使8月21日到芷江，并规定人数、标志、盟机护航、需带表册、联络呼号等共7项应遵守事项。由此，湖南湘西小县城芷江，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洽降城。

洽降使节到芷江

1945年8月17日晨，何应钦以陆军总司令、战区总司令名义致电驻湘西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日军将在芷江向我投降，速派员妥慎准备典礼及官员来宾的接待事宜。”司令官王耀武接到何应钦的急电后，当即召集副官处处长赵汝汉（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9期生），选派人员前往芷江，全权负责洽降筹备工作。随后赵汝汉等人赶到芷江，安排典礼场所和交通工具，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8月1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率洽降有关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做洽降准备工作。同日抵达的还有第4处代处长刘措宜（黄埔军校6期生）、炮兵指挥官彭孟缉（黄埔军校5期生）、新6军军长廖耀湘以及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黄埔军校4期生）等高级将领。

8月20日下午5时，4架



/ 日军洽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走下飞机。

绿色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腾空而起，机上载着中国战区洽降使节、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领的32人代表团，以及60余名中外记者。同行的还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

当日，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各路军政要员、知名记者纷纷向芷江汇聚。他们佩戴着印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的红绸带，入住城南汽车站附近的东亚大旅馆，而工作人员则佩戴黄绸带。由于人员众多，七里桥的空军营房全部改为招待所，仍供不应求。

夜幕降临，何应钦在空军第5大队营房召开军政要员会议，何应钦宣布芷江成立陆军

前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受降有关事宜，包括接待日军洽降代表、规划各战区受降接管、成立南京前进指挥所、空运部队接收上海南京，并敲定21日举行的洽降仪式由萧毅肃主持，陈应庄（黄埔军校四分校教官）负责接待日本降使。对日本降使的接待采用军事化标准，起居以号音为准，尽显中国战胜国风范。

日本降机落芷江

8月20日，湘西芷江县城东门粘贴“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巨幅对联，城内大街小巷贴满“庆祝胜利，巩固世界和平”“抗战胜利万岁”等标语和横联，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日军洽降



/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副总参谋长冷欣（右），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左）在芷江洽降会场。

代表今井武夫一行 8 人乘坐专机，从南京起飞，中途在汉口降落住宿。当晚，机尾系上 4 米长的红色布条，作为投降标志。

8 月 21 日上午 9 点半，中美混合编队的 6 架战机从芷江起飞，前去押解前来芷江乞降的侵华日军洽降代表。他们在洞庭湖上空发现日机，随即下降至约 1500 米高度，在日机上方执行押送监控任务。日机到达芷江上空后，先围绕机场低飞 3 圈，表示向中国军民赔礼、

道歉、乞降。此时中美战斗机仍在空中警戒。

当天的芷江机场碧空万里，中国国旗迎风飘扬，跑道上停着百余架飞机，5000 多军民聚集于此，成百辆吉普车及各种型号的军车、小轿车排列在路边。11 时 15 分，日军洽降专机按指挥台指示绕场滑行一周后驶向指定地点，中美官兵数千人在飞机四周拦住愤怒的人群。只见日机机翼上下各漆有日本旗图，浅绿色机身油漆剥落、弹痕累累，飞机停下后，翼尾端

标志投降的 4 米长红布条立刻被中美官兵撕下留作纪念。

11 时 25 分，新 6 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命令对方打开舱门。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今井武夫，他头戴硬壳帽，鼻子上架着黑框大眼镜，脚踏马靴，着军服，腰挂短剑。中国人对今井武夫并不陌生。他担任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驻北平陆军武官室主任，亲手炮制了卢沟桥事变，参与策划成立汪伪政府。但此时的今井武夫没了往日的骄横，他立正询问是否可以下飞机，得到肯定答复后，8 名降使缄默不语、神情木讷地走下飞机。

下飞机后，今井武夫等人首先向中国国旗敬礼。陈应庄核对了降使和随员名单后，宪兵对日方人员及所携带的行李等进行检查。随后，今井武夫等坐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被送往戒备森严的临时住所。一路上，道路两侧站满了军人和市民百姓，有的举起相机拍照，有的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胜利的“V”字，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严惩战争罪犯”，还有的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掌声、鞭炮声经久不息，今井武夫一行汗流如注，面色惨白。

芷江洽降典礼

芷江洽降会场设在原国民党空军第5、第6大队俱乐部，是一栋双层西式平房。为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会场左右两个路口各搭起一座牌楼，上面缀有大型“V”字，扎着“和平之神”字样，左右两边分别缀着“公理”和“正义”字样。会场前的空地上，高高竖立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会场按标准礼堂布置，庄重肃穆。正前方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像；左右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联，上方有“天下为公”横批；横批两边是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面贴有“总理遗嘱”“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会场中央横放着两张长条桌，上面铺着白布，后面各有几把黑色椅子。中方代表席在正前方，面对日方代表及观礼席；日方代表席在正后方，面对中方代表及孙中山像。长桌的一端另外放了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后面是记者席，墙上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周围增派了警力，设3道岗哨。

8月21日下午3时，中方代表、文武官员、中外来宾等佩红、黄绸带入场证陆续入场

就坐。萧毅肃正襟危坐在中方代表席上，右边是冷欣，左边是柏德诺和翻译王武。与会的还有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等。中外记者100多人从狭小的会场一直挤到外面的走廊里。洽降仪式开始前，室内显得极为热闹，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互相道贺。今井武夫一行在隔壁等候。随后，陈应庄接到陆军总部电话：“立刻把日本代表带来，只准4人，副总参谋长、2个参谋和翻译，不准带枪！”

3时40分，今井武夫等日方洽降代表在新6军士兵荷枪实弹押送下，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会场，经允许后脱帽进入，向萧毅肃等人鞠躬，随后在指定位置坐下。

下午4时，洽降典礼正式开始。萧毅肃首先介绍了自己和与会代表，随后命令日本代表：“我受何应钦总司令委托接见你们，请说明身份并交出身份证明书！”今井武夫：“我没有带证明书，只带了冈村宁次的接洽命令书。”说着，他将命令书交由随员桥岛芳雄呈递给萧毅肃。

萧毅肃根据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电令，要求日方提供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越南北纬16度地区以北所有日本

陆海空军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今井武夫呈上驻华日军兵力分布各地概况图，称中国台湾地区及越南日军不属于冈村宁次管辖，因此图上没有注明。

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桥岛芳雄和翻译木村辰男毕恭毕敬地站在桌前，向冷欣说明他们交出的兵力配备地图时，会场中的摄影记者涌上前，将所有镜头集中到桌上的地图和正在解说的桥岛和木村脸上。冷欣见状，当即制止：“请各位保持秩序！”他的声音虽不洪亮，却带着战胜国代表的威严。随着记者们陆续退至指定区域，会场秩序渐归平静，但刚才短暂的历史瞬间已被镜头永久记录——地图上标注的兵力据点、防线部署，不仅是日军侵华的实证，更象征着侵略者军事特权的彻底终结。

当萧毅肃开始宣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1号备忘录时，会场气氛更加严肃。这份千言文件详细罗列了各战区接受投降的具体步骤，日文翻译念至关键处，今井武夫频频掏出手绢擦拭汗珠，其随员也神色紧张。备忘录宣读完毕，萧毅肃将受取证推至今井面前：



/ 萧毅肃 (左二)检视今井武夫呈交的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图。

“请在此签字。”面对今井“询问几点”的要求，萧毅肃用幽默而轻松的口吻说：“我看不必了吧，因为投降是无条件的。”今井武夫只得拿起毛笔，略微抖动地签字：

今收到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致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之中字第1号备忘录中文本一份，日本文本一份(以中文本为标准)；并已充分了解本备忘录之全部内容，当负责转送。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之代表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

二十一日时。

公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时。

地点：中华民国湖南省芷江县

萧毅肃向今井武夫郑重宣布：“冈村将军投降手续未完成前，冷欣中将将与你们同赴南京设前进指挥所，何总司令将空运部队至南京、上海和北平，美空军地勤先行进驻，望冈村全力配合。”说罢递上联络单位名单。桥岛芳雄急忙起身，恭敬递上日军的通讯规定表：“芷江电台现在马上可以与南京进行无线电联系，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通讯规定，希望予以利

用。”萧毅肃领首回应，强调后续将派人到宿舍进行细节联系，要求日方代表完成接洽后迅速返回南京。4时50分，日本降使鞠躬退场。5时，萧毅肃宣布洽降典礼结束。何应钦走出旁听房间，听取报告并验看地图、受取证，众人上前祝贺。

当晚，柏德诺设宴向何应钦表示祝贺。何应钦发表谈话，称接受了日本代表呈递的投降文件，宣布中日停止敌对状态。当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表第4号公报，公布了芷江洽降经过及日军兵力分布情况。

晚8时30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蔡文治(黄埔军校9期生)率6人组成的谈判小组抵达今井武夫住所，就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资料移交、旅华日侨遣送问题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

8月22日上午，冷欣、柏德诺、王武前往今井武夫住处，就在南京开设前进指挥所，接收军需物资、装备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当日，还有空军上校张廷孟(黄埔军校3期生)和有关参谋到今井住处进行个别谈话，就有关南京、上海等处机场的状况及通信设备等进行了事务性联系，并商谈了

日本航空机的接收办法。

南京签字缘芷江

在筹备芷江洽降的过程中，原计划在芷江举行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改变了计划。考虑安全因素，何应钦一直主张在芷江签字。8月21日，何应钦收到魏德迈电文，提议将日军投降签字地点从芷江改为南京。他当即致电在重庆的蒋介石，以“新6军尚未完成空运，个人在敌势力下行动困难”为由，建议维持芷江签字方案。8月22日，蒋介石复电明确：“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于是，何应钦在芷江一边继续受降的实质性工作，一边开始筹划南京签字典礼。

8月22日下午，何应钦在芷江召集“陆总”高级将领及海空军负责人召开会议，萧毅肃、王耀武、卢汉、张发奎等出席，重点讨论受降区划分、受降部队派遣等军事细节。拟定中国战区受降地共有16处，分别是越南河内（由卢汉入越受降）、广州（由张发奎受降）、汕头（由余汉谋受降）、长沙（由王耀武受降）、南昌（由薛岳受降）、汉口（由孙蔚如受降）、杭州（由顾祝同受降）、上海

（由汤恩伯受降）、徐州（由李品仙受降）、北平（由孙连仲受降）、太原（由阎锡山受降）、郑州（由胡宗南受降）、郾城（由刘峙受降）、济南（由李延年受降）、归绥（由傅作义受降）、台北（由陈仪受降）。晚上，何应钦再次召集顾问团及接收代表会议，研究日方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接收事宜，陆续形成中字第2号至6号备忘录。

8月23日上午，钮先铭（黄埔军校教导总队工兵营长）、王武赴今井武夫住所，正式告知降书签字仪式定于南京，并递交第2至5号备忘录。下午1时，今井武夫在中字第2、3、4号

备忘录受取证上签字盖章，但对中字第5号备忘录以“需大本营命令”为由拒绝转交，最终改由中方先遣人员直接封送冈村宁次。

午后，何应钦在办公室召见今井武夫，萧毅肃、冷欣及美军代表在座。何应钦开门见山确认备忘录已收悉，要求日军“迅速确实地实行各项条款”，并部署8月26日至30日空运部队至南京的保障工作。今井武夫虽以“需大本营命令”为由推诿，但承诺转达所有指令。这场仅9分半钟的谈话，标志着芷江洽降阶段的正式收尾。

下午2时35分，日军洽降专机载着今井武夫一行离开芷江，他们在芷江停留了3天共52小时。至此，芷江洽降结束。这期间，侵华日军洽降代表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备忘录。

芷江洽降是抗战胜利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将日本的投降承诺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条款，并以公开的洽降仪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为随后的南京受降奠定了坚实基础。黄埔

（作者单位：香山革命纪念馆）



/ 今井武夫在备忘录收据上签字。

南京受降始末

□ 贾伟龙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隆重举行。这一历史性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也宣告了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新纪元的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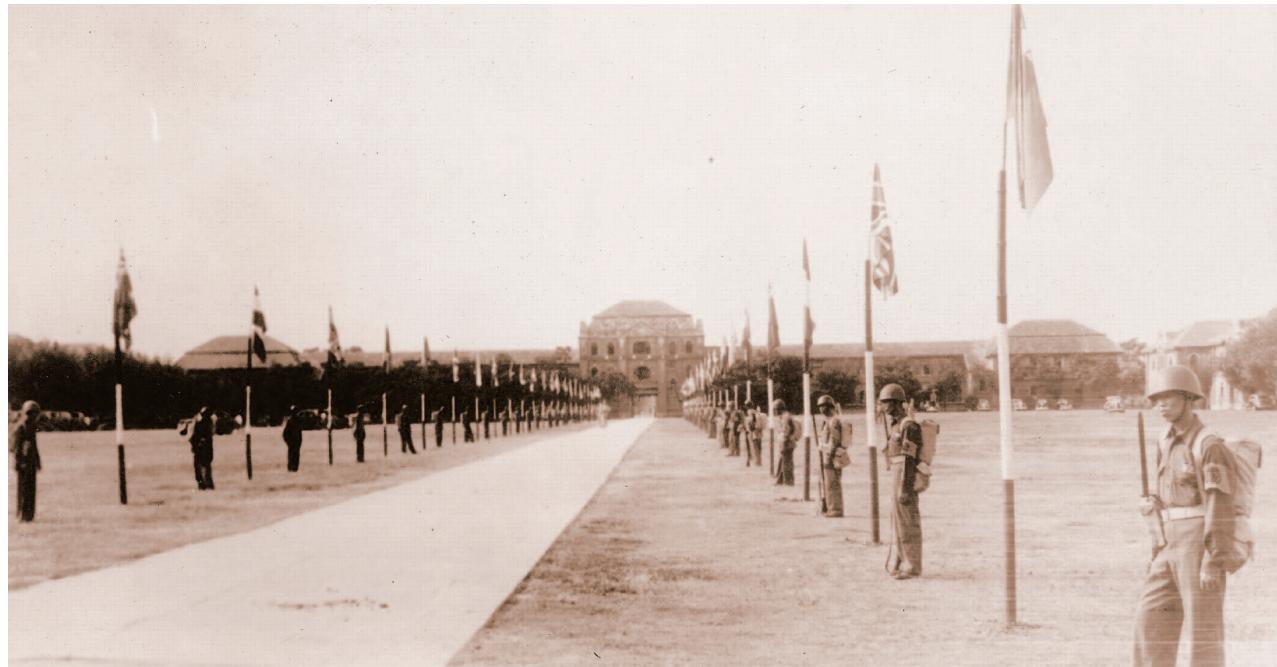
南京受降前准备过程

1945 年 8 月 24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收到了来自日军冈村宁次的电报。电报内容显示，今井武夫一行及中方校官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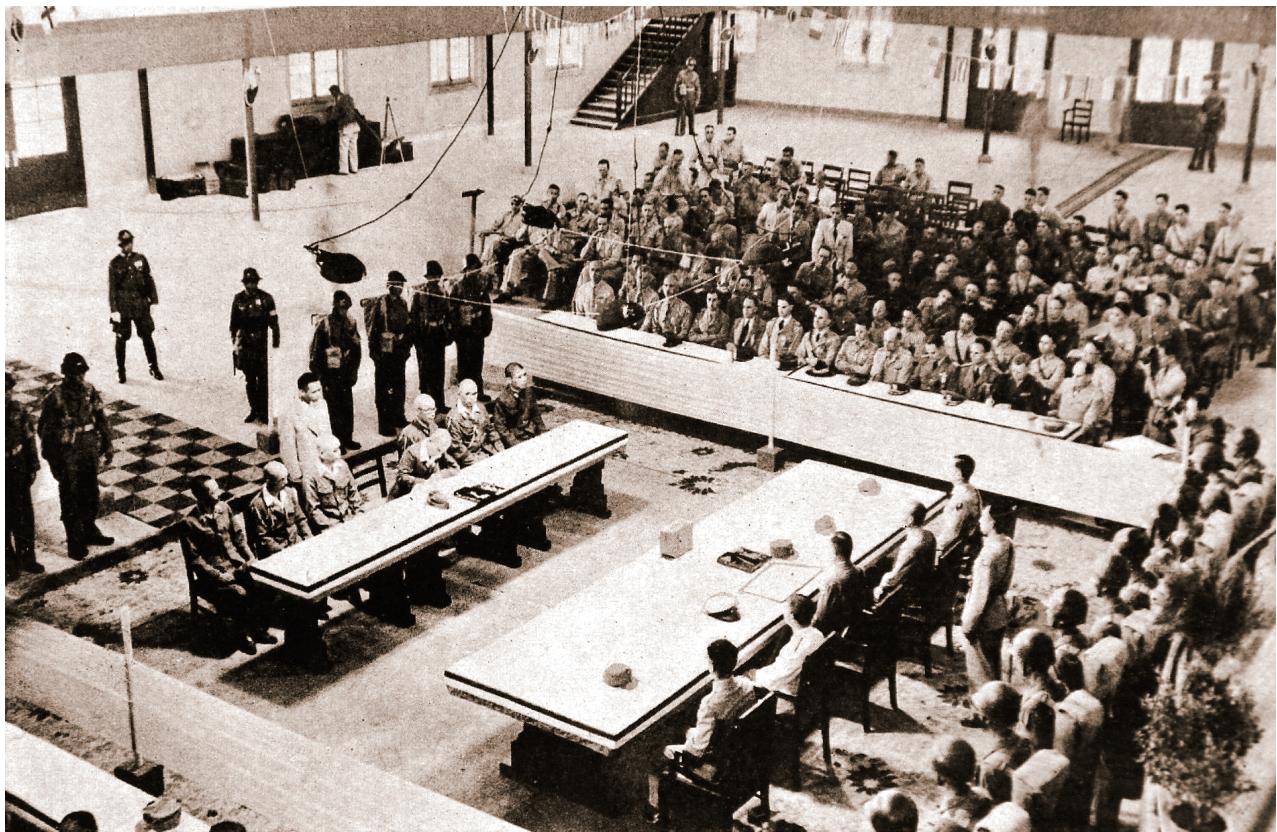
人已于 23 日下午 8 时抵达南京，并确认已收到中国战区带来的第 1 至 4 号备忘录，承诺将遵照执行。此外，电报中还提到，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受降仪式，中国战区计划在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并希望迅速前来商谈。同时，冈村宁次请求提供冷欣将军一行前往南京的具体飞行时间、高度、路线以及飞机的机种和架数等信息，以便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对于他们到达南京后的住

宿、办公地点、交通工具以及警卫工作等事项，冈村宁次表示已经做出了全面安排。

为进一步了解南京机场的情况，为设立空中站做准备，何应钦于 25 日派遣空军第 1 路军司令张廷孟飞抵南京进行实地考察。26 日，张廷孟向何应钦汇报称南京机场完好无损，可以正常使用。同日晚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成员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听取了何应钦的训话，随后分乘 7



/ 南京受降仪式会场外景。



/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南京。这些飞机途经长沙、武汉等地，最终顺利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随行人员包括冷欣、陈卓、宫其光、李人土（黄埔军校6期生）、舒适存、黄瀛、曹大中、陈容泰等人。当冷欣走下飞机时，受到等候多时的今井一行5人的迎接。冷欣随即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讲话，并在日军帐篷内稍作休息后前往招待所（原孙科公馆）安顿下来。

当天晚些时候，今井等4人来到招待所拜会冷欣，冷欣

借此机会向他们递交了三份中字备忘录，并要求其签收并认真执行。今井表示将会遵守办理。第二天下午，冷欣一行专程前往中山门外的中山陵谒陵，在孙中山坐像前肃立默哀，表达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敬意。

随着准备工作逐渐推进，双方就如何进行首次正式会谈展开了协商。冈村宁次最初建议由冷欣前往其总部进行会晤，理由是冈村宁次作为大将，级别高于冷欣。然而，日本是战败国，这种安排不符合常理，

因此遭到拒绝。后来，日方又提议在冈村宁次住所（原何应钦住所）举行会议，同样未能得到中方的认可。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冈村宁次前往招待所与冷欣见面，中方主官将在会议室门口迎接。

28日上午，冈村宁次在今井、小笠陪同下前往招待所拜会冷欣。冷欣及其随员邵毓麟、陈卓等在会议室门口迎接，并互致军礼。随后，双方举行了会谈。会上，冷欣强调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即根据何应钦上

将的指示设立前进指挥所，并为即将举行的受降仪式做准备。他要求冈村宁次提交关于执行第1至5号中字备忘录的书面报告。冈村宁次则表示所有细节都由今井负责处理，并承诺会提交详细的书面报告。

此外，冷欣还向冈村宁次递交了第6至13号中字备忘录，要求日本严格遵守并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冈村宁次承诺将按照规定执行。两人还讨论了关于日军武器移交、粮食供应、运输、技术人员征用以及通讯工具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冈村宁次提到希望能够在维持纪律方面保留少量武器，但冷欣并未立即作出回应，而是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后再决定。针对粮食和运输问题，冷欣保证中方会给予支持，但同时也提醒冈村宁次需配合中方的相关安排。

会后，冷欣迅速将有关日军总司令部移迁吴淞的消息上报给何应钦。何应钦很快回复，明确指示冈村宁次及其总部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南京。冷欣将此消息传达给了冈村宁次，他只能无奈接受。

随着准备工作逐步完成，关于受降签字仪式的细节也得到确定。原本计划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仪式，由于场地限制

改为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负责人变更为工兵指挥官马崇六。9月2日，马崇六抵达南京后立即与陆军总司令部第4处代处长刘措宜共同布置会场。与此同时，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高参王连庆（黄埔1期生）也参与到筹备工作中来。

9月初，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陆续抵达南京，其中包括新6军军长廖耀湘、第14师师长龙天武等人。重庆的许多官员和商人也纷纷涌入南京，这让南京变得非常热闹。为了维持治安，经何应钦批准成立了南京警备司令部，由龙天武兼任司令。

冷欣通过密报得知，冈村宁次打算在投降签字仪式上剖腹自杀以示忠诚。冷欣一方面紧急通知了何应钦，另一方面秘密联系了今井武夫，要求其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9月6日，萧毅肃从芷江飞抵南京，并召开了会议。会上，萧毅肃通报了何应钦将于9月8日抵达南京以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将迁入中央军校原址的消息；冷欣汇报了受降典礼仪式的筹备情况，包括邀请出席人员的标准和范围；萧毅肃还提到冈村宁次希望到机场迎接何应钦的请求，遭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反对，何应钦最终允许冈村宁次

等5人在机场另一端迎接。

9月8日，随着何应钦乘坐的专机降落南京，标志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南京城装饰一新，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主要街道，用松柏枝装饰的彩色牌楼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中间镶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广场四周竖立着52个盟国的国旗，每个旗杆下都有武装士兵和宪兵守卫。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正门上方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入口处设有来宾签到处。礼堂正面墙中央悬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方点缀着象征胜利的红色“V”字符号和“和平”字样。

举行南京受降仪式

早在签字仪式之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便通过中字第17号备忘录向冈村宁次传达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规定：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的仪式；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所有日军军刀均需与其他武器一同收缴，并且一旦正式投降，日军便不能再行佩带军刀。并说明这些规定在中国战区同样适用，同时决定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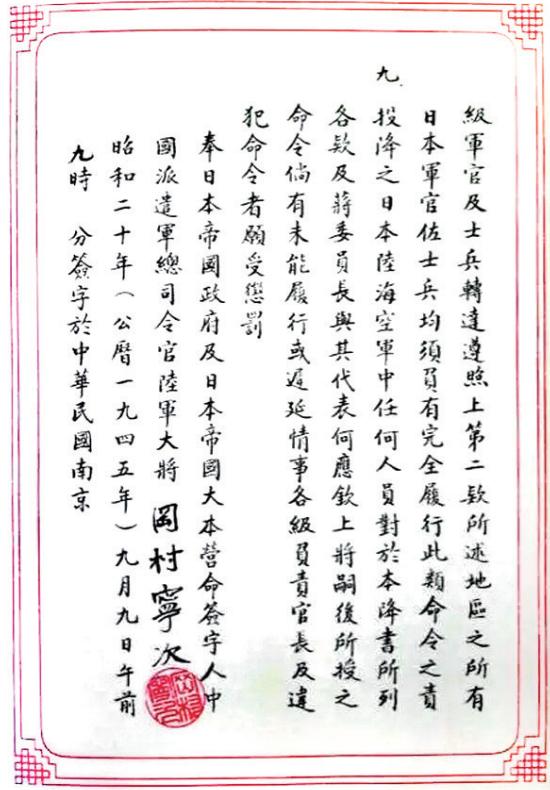
投降签字仪式上解除日军将领们的军刀，将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和今井武夫的军刀分别授予何应钦、萧毅肃和冷欣。

冈村宁次接到中字第19号备忘录后，得知中方对投降地点、时间以及出席人员的具体安排。然而，他试图违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一再要求中方提供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的具体内容并提前了解投降书的内容。经过何应钦同意，冷欣派人于9月8日晚秘密将投降书内容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发布的第1号命令抄件送交冈村宁次阅读，但明确禁止抄录、提出修改意见或在签字前宣扬。

1945年9月9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如期举行。会场内坐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军官与记者，除汤恩伯、王懋功（黄埔军校管理部代理主任）、李明扬等在内的众多中国军官、文职人员和记者，还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官及记者。整个投降仪式按照预定方案进行。

8时43分，新闻和摄影记者会在场外等待拍照。

8时45分，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一行7人乘车到达现场。在中外记者的镜头下，他



/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的签字。

们显得神情黯淡。随后，由王俊（黄埔军校教官）引导至礼堂左侧的休息室。

8时50分，记者进入会场就座，受何应钦委托，马崇六将军为记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8时56分，随着水银灯亮起，何应钦带领4位受降官步入礼堂，全场起立迎接。

8时58分，日军投降代表在王俊的引导下入场，他们脱帽向何应钦等人鞠躬后就座。

9时4分，何应钦指示冈村宁次提交签降的证明文件，小

林浅三郎呈递了相关文件。

之后，何应钦将两份日本投降书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呈递给何应钦。接着，何应钦又将蒋介石的第1号命令及其受领证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再次由小林浅三郎呈递何应钦。至此，受降仪式结束，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简短演说庆祝这一历史时刻。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在励志社举办酒会庆祝胜利。与此



/ 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 (左)呈递投降书。

同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受降的公告，宣布接受日本投降并将第1号命令下达给冈村宁次。

投降仪式完成后，冈村宁次不再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职务，而改称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部长。其任务是处理日军投降后的各种善后事宜，并遵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行事，不再具有发布命令的权利。各地日军司

令部也相应改为某地区的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10日上午，何应钦会见了冈村宁次，讨论了关于自卫武器、粮食供应、运输、技术人员征用、通信工具使用等多个方面的后续安排，强调了确保日军有序回国的重要性。他还针对日军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安全区域不保留自卫武器，但在需要的地方可以借用少量步枪；

粮食供应方面，日军自用部分将受到检查以避免浪费，必要时中方会提供援助；运输方面，中方将协助调拨船只帮助日军回国；对于技术人员的征用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通讯方面，除了批准保留五架联络用飞机外，其余飞机都需交出；并且要求日军不得使用密码进行通信。同时，何应钦还指出了日军必须遵守的相关规定，如不得惩罚中国平民、交出所有武器器材等。

冈村宁次表示完全理解并愿意遵从上述指示，承诺将尽力配合中方完成善后工作。此外，他还提到自己已下令中国大陆日军的武器全部上缴中国政府，并请求在维持纪律方面给予少量武器支持。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冈村宁次返回住所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南京受降的重要意义

选择南京作为受降地点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义。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在此制造了屠杀30万以上中国军民战争罪行，使南京成为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的象征。因此，1945年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是对遇难同胞的告慰和重建国家尊严的宣示。

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约20分钟，但却从法律程序上确认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取得首次完全胜利的成果。近代中国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九一八事变

以及七七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挫败，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严重损害。南京受降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象征着中国摆脱了百年屈辱，恢复了国家尊严与独立。这一胜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由危亡走向复兴的关键转折点，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并为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解放提供了重要范例。

这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结果，充分证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性。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倡导并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了包括国内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爱国力量以及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国人民不分地域、年龄、职业，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后方民众的物资支援、文化界的宣传动员以及海外侨胞的捐助，共同构成了抵抗侵略的全民力量。正是这种超越党派和地域的全民族团结，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最终赢得了这场艰苦卓绝战争的胜利。

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重要地位的国际确认。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本陆军兵力，迫使日军无法实施“北进”进攻苏联的战略计划，从而有效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同样，中国战场的持久抵抗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资源和有生力量，迟滞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部署与行动，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付出了超过3500万名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因此，南京受降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远东地区取得胜利的法律象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

故宫太和殿受降

□ 李慧敏

1945 年 10 月 10 日，初秋的北平天气晴和。天安门、午门、东华门外，“七时许，即已围满男女市民达十万人之多”。随着时间推移，人流愈发汹涌，“若(偌)大的太和殿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常，簷(檐)前河边，无处不布满了观礼的民众”。至 9 时，午门内已水泄不通，后续赶来的民众只得“在天安门内外，伫足观望”，更有不明真相者聚于东、西华门、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各处探询消息。据保守统计，当日聚集紫禁城周边的北平市民“当在二十万人以上”。

这座历经 600 年沧桑的皇城，此刻正屏息等待一场足以载入民族史册的盛典——中国战区第十一战区华北日军受降仪式。北平前进指挥所参谋主任刘本厚在报告中写道：“沦陷八年之故都于兹重见光明。”这场受降仪式不仅是中国战区 16 场受降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更因其选址太和殿而具有特殊意义。从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到

日军铁蹄蹂躏华北，这座宫殿见证了太多民族伤痛；而今，它将成为洗刷国耻、宣告主权回归的庄严舞台。

受降筹划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与此同时，庞杂的受降工作伴随着胜利的喜悦展开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立即着手规划整个中国战区的受降事宜，包括划分受降区域、指定受降主官、确定受降地点等。

8 月 18 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电令：“指派孙连仲(十一战区司令官)为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受降主官，指挥所辖新 8 军，第 30、32、40 军，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日军华北派遣军及直辖部队的投降。”9 月初，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司令长官召开军事会议，

宣布中国已接受日军投降。何应钦明确指令：“各战区应速派洽降人员，与日军联络，越快越好”，并特别指出，“第十一战区应速在北平，设立前进指挥所，接受日本洽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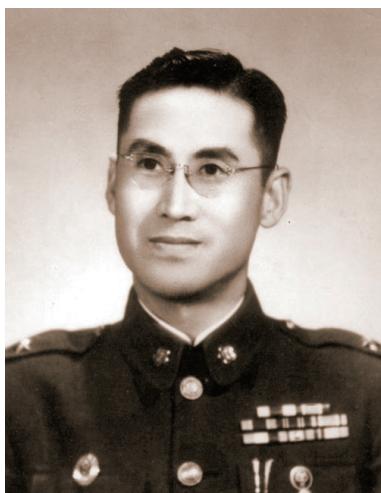
孙连仲迅速行动，在北平设立前进指挥所。北平前进指挥所的任务是：1. 传达本战区受降主官的命令，督促日军从速履行无条件投降。2. 关于本战区辖境内伪军的调查及处置，并向主官随时提出报告与建议。3. 为长官司令部及省政府的进驻作准备。4. 宣传国民政府德威，严密谍报组织。5. 根据工作的需要，要求日军随时提供一切方便。

孙连仲委任战区副参谋长吕文贞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刘本厚为参谋主任，先期赶赴北平，进行受降前的各项准备与接洽工作。北平前进指挥所是一个精干而高效的机构，常设军事(两组)、党政、总务共 4 组，总计 40 余名成员。

军事第 1 组，组长陈开疆，



/ 孙连仲作为中方代表，立于太和殿台基下的受降台正中。



/ 吕文贞。

负责处理日军投降核心事宜，包括联络（刘之泽）、械弹器材

管理（杨海澜）、投降计划命令（许绍庄）、伪军业务（张养浩）、械弹器材（王子恩）、通信交通兼情报及使令官（黄宗徵）、马匹车辆（王绍鹏、秦泽民）、粮秣仓库兼使令（张廷楼）、文书（杨全明、王华寿）、译电（杨竣、方臣志）等。

军事第2组，组长张家铨，主持刘云楷，负责情报、警卫（白莲丞、隋承礼、李竞俊）等事务。

党政第3组，刘漫天（黄埔4期生）、施奎龄主持，负责

处理党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宣传及伪军投降业务（高卓东负责），处理英文翻译兼党政业务（王福民）、新闻摄影（丁履进、汪松年）等。

总务第4组，组长马瑞庭，负责庶务、交际、经理（王熙春）、军医兼办兽医器材（韩梦麟）、翻译兼对日军联络（初光）及临时派遣等。

9月9日，吕文贞率北平前进指挥所部分成员飞抵北平西苑机场。对于吕文贞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他在1954年的

回忆文章中写道，踏上故土时，“一股家乡味，陟上心头”，甚至产生了“伏地一吻”的冲动。然而，现实政治交锋的严酷立刻取代了重归故土的温情。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率队在西苑机场“迎接”。高桥坦以典型的日军姿态——“拖刀跨步”走向吕文贞，并“伸出长臂，意欲握手”。吕文贞见状，“顺手一指桌前的小凳，说‘请坐下’”，并未与其握手。这可能是高桥坦到中国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对待，而吕文贞的反应则体现了战胜国应有的姿态。既是“执行同盟国的共同规定”，也是贯彻第十一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官佐工作手册中的要求，即“凡对日方接洽之官长应随时注意保持战胜国之地位，绝不可以平等相接待”。吕文贞观察到，这一举动让高桥坦“本能地，倒吸一口凉气”，并“抽出声来了”。

简短对话后，吕文贞准备入城。高桥坦立刻走到吕文贞旁的车前，主动为其拉开车门并立正请其上车。吕文贞认为受降人员乘坐日军军车入城极不妥当，便询问随行航空先遣办事员是否有中国车辆和国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登上了悬挂中国国旗的中国汽车驶向

城内。高桥坦则“脸上铁青”，乘坐自己的车辆紧随其后。

三次洽降

北平前进指挥所暂设于北平城内定阜大街。吕文贞抵京后，随即展开了与日军投降代表紧张而关键的洽降工作。根据档案记载，在太和殿正式受降典礼前，中日双方共进行了三次正式或非正式的洽降会议，每一次都充满了外交博弈和心理较量。

第一次洽降：非正式接触与初步试探

9月10日上午9点，即指挥所成员抵达北平的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主动前往北平前进指挥所驻地（北京饭店）求见吕文贞。此次会面被定位为“非正式谈话”，主要原因一是日方代表当时尚未准备好正式的身份证明文件。

得知根本博求见，年轻参谋迅速在吕文贞座位后的墙壁上悬挂了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使整个场面“增加了国权的气势”。根本博率领参谋长高桥坦、副参谋长渡边渡及翻译尾关正尔等人入室。有了前次经验，日方知道不可能握手，便以鞠躬为礼，吕文贞起立还礼。

谈话中，根本博主要表达了三点：一是确认信息，询问此前由重庆转交孙连仲长官的电报是否收到；二是表达困境，报告停战后日军在维持华北社会治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并急切询问中国军队何时能抵达接防；三是试探态度，流露出对中方对待投降日军态度的担忧。

对于前两点，吕文贞一一给予了明确答复。关于根本博最关切的第三点，即日军投降后的待遇问题，吕文贞展现了战胜国的气度与原则：“胜利者对能悔改的失败者之宽恕，为人类最高道德。我中国是有伟大文化的民族，在日军正式纳降以后，我政府对日军及日侨必依国际公法，使日本军民有安全的保障，决不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吕文贞观察到，在他阐述这一立场时，原本始终保持着微笑的根本博表情未变，但其身后的渡边渡却闭上了眼睛，反应耐人寻味。

第二次洽降：正式交锋与原则坚守

9月12日，在北平定阜大街迎宾馆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正式洽降。中方代表为吕文贞（代表孙连仲），核心成员包括参谋主任刘本厚、

高级参谋刘云楷及翻译初光。此外，还有14名军政列席人员、6名记者及两名记录官在场见证。日方代表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派遣的参谋长高桥坦、尾关正尔及翻译山内虎雄。

此次洽降前，日方曾通过门致中司令转达，希望在正式仪式上佩戴军刀与勋章出席，试图保留一丝“面子”。吕文贞对此予以断然拒绝，他严正指出日本勋章“是流中国人的血换来的”，并强调严格执行同盟国关于受降时日军不得佩刀的规定关乎国家尊严——“胜利者更需要荣誉”。

洽降开始，高桥坦准时抵达，经引导入座。吕文贞首先申明自己的身份和权限。随后，他依次质询关键事项：孙连仲司令长官第1号备忘录是否收到？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历次下达给日军的命令是否知悉并遵照执行？日军投降准备工作是否就绪？高桥坦对以上问题逐一进行了确认。接着，吕文贞郑重宣读了3项受降训令，要求高桥坦详细阅读并明确表示理解。高桥坦在表示理解后，在受领证上签字。

签字完成后，高桥坦承诺负责维持平津等地治安、完整保存并移交装备物资，但重点

强调所谓“匪团跳梁”及长城内外“苏蒙军行动”构成“极大障碍”，声称日军正部署应对。

高桥坦的陈述，尤其是关于苏蒙军部分，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试图利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雅尔塔密约及苏军进入东北）进行某种程度的挑拨或试探。吕文贞对此保持着高度警觉，虽然内心忧虑东北局势，但还是当场给予了坚决而策略性的驳斥，并严正声明苏联系“中国的忠实盟国，决不会做出不利中国的行动”，同时质疑日军情报的准确性，认为其所述可能是“一般匪徒活动之误”。此举有效阻止了日方可能的离间企图。高桥坦未再坚持其观点，转而再次重申日军会履行治安保证。

仪式结束后，日方退出，吕文贞与全体列席人员在迎宾馆院中合影留念。这一刻，众人感慨万千，这是“百年来中国首次以胜利受降者身份接受战败国代表的洽降”，象征着民族屈辱历史的终结与国家尊严的回归。

第三次洽降：善后细节的落实

9月22日，吕文贞再次召见高桥坦，举行第二次事务洽降（据档案描述，应为第三次

接洽、第二次事务性质洽降）。此次洽降的核心议题是解决日军投降后的具体善后问题，包括日军武装解除后的自卫问题、给养供应、居住安排以及投降前过渡期的治安维持等。

根据秦泽民所作记录，日方在此次洽降中的关切点集中在5个方面：一是安全遣返，要求确保日军与侨民安全撤回日本；二是物资转移，承诺完整移交华北物资；三是过渡期维稳，强调因苏蒙军压力、中共武装活动及日军士气低落，请求在国军接防前暂由日军保留必要武器维持治安；四是后勤保障，提出在集结期间面临粮食短缺问题，并希望获准携带部分给养回国；五是希望中方提供情报支持。

吕文贞代表中方承诺保障日方安全，有条件接受部分过渡安排（如暂持武器维安、内地方向缴械顺序）。同时划定原则底线，明确要求须严格遵循《备忘录》框架，拒绝携带武器至港口等超规请求，并强调工矿资产须完整移交。对话中，中日双方均认同战后日本复兴需中国协助，吕文贞更呼吁结束“历史悲剧”，以诚意共谋未来合作可能。

这三次洽降，从初步接触

到原则确立，再到具体善后安排，为 10 月 10 日在太和殿举行的正式受降仪式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和程序基础，也清晰地展现了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地位的根本转变。

场地变更

正当北平的洽降工作按部就班进行时，邻近的天津举行的受降仪式对北平受降仪式的最终形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45 年 9 月下旬，负责华北地区日军投降事宜的吕文贞在北平会见了先期抵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 军团副参谋长华德。这次会面带来了一个令吕文贞颇感意外的消息。华德明确告知，根据美方与中国战区高层（具体指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将领魏德迈）协商的结果，天津港及塘沽地区的日军投降事宜，将由登陆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 3 军团负责。这意味着，作为中国战区该区域受降主官代表的吕文贞及北平前进指挥所，在天津受降仪式中将无法担任主导角色，只能作为受邀观礼者出席。尽管吕文贞内心深感无奈，但基于现实考量，只能接受这一决定。此时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尚未抵达北平，吕文贞作为代

表接受了美方的邀请。

这一安排的直接结果，体现在 1945 年 10 月 6 日于天津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前举行的受降仪式上。上午 9 时整仪式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 军团司令骆基偕参谋长瓦顿步入会场。司令官发令后，日军第 118 师团内田银之助作为投降方代表，缓步行至预先布置之长桌前面，向受降主官骆基敬礼，骆基答礼后，内田就座，在降书上签字。签字过程历时约 15 分钟。签毕，内田再次向骆基敬礼，骆基答礼，内田退就原席。9 时 17 分，骆基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降书上签字，历时约 1 分钟。仪式完成，随后举行升旗、献刀等环节。仪式整体简单隆重。

令吕文贞和在场围观的中国民众感到刺痛的是，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官方代表，仅有代表第十一战区的吕文贞，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天津警察局李汉元，外事局津沽区联络官周培章等人。场上只见美军将领主持受降，而吕、杜两位中国军人只能作为旁观者。这种在中国领土上由他国军队主持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景象，让聚集围观的众多中国民众感到困惑不解。

吕文贞的回忆生动记录了当时民众情绪的戏剧性变化：当仪式进行到升旗环节时，首先升起的是美国国旗，同时奏响美国国歌。此刻，“群众的脸色立刻沉下来”，现场弥漫着疑虑的气氛，人们窃窃私语：“是不是日本走了，美国又来了呢？”紧接着，升起了中国国旗，奏响了中国国歌。这一瞬间，“现场一下子像火山口大爆发”，原本沉默的群众“脸上突然展开笑容”，许多人“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万岁’！”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认同感，深深触动了吕文贞，他描述自己当时“几乎落泪”。

这场露天举行并设缴刀环节的受降仪式给吕文贞以强烈刺激。一方面是在自己国土上受降主导权旁落的屈辱感；另一方面则是民众爆发出的对祖国真挚而炽热的感情。两者交织，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10 月 7 日（天津受降次日），吕文贞回到北平后，立即对参谋主任刘本厚表示：“原定中南海怀仁堂室内受降的计划取消！”他斩钉截铁地说：“美军公开受降，我们也要公开受降！”

为了寻找一个足以容纳万千民众、象征意义更为深远的场地，吕文贞和刘本厚亲自



/ 群众见日军入场投降，高呼“中国万岁”！

驾车前往故宫考察。当他们看到开阔恢弘的太和殿广场时，当即拍板：就在这里！太和殿位于故宫南北中轴线的显要位置，是故宫三大殿之首，为明清两朝举行大典的重地。选择太和殿，不仅是为了容纳更多市民共同见证胜利、分享喜悦，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寓意——在曾遭八国联军劫掠的紫禁城核心举行受降典礼，以此“用受降的胜利洗刷八国联军侵占的耻辱”。

太和殿受降

10月10日，中国战区规模最大的受降仪式即第十一战区受降仪式在北平故宫太和殿举行。

受降礼堂设于太和殿前丹墀，布置得“极为庄严重堂皇”。丹墀四周汉白玉栏杆分别竖着国旗和党旗。太和殿大门外两旁分别悬挂中、美、英、苏4国国旗，阶前竖立红底金色“凯”字，背面缀英文“V”字。天安门、午门、东华门各处十余万市民在引导下相继进入太

和殿前广场。魏云兰作为北平受降仪式的观众，记录下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宽阔雄伟的太和殿水泄不通，人头攒动，拥挤如潮。”

上午8时30分，受降主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偕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参谋主任刘本厚及高卓东、刘漫天、高松元、隋兆喜、刘云楷、刘之泽、陈开疆、梁同祺、张家铨等人到达会场。记录员为张养浩、秦泽民。中央社分社主任丁履进、江松年、马在



/ 根本博率幕僚在受降台前列队候命。

天、赵光贤、白进文、卜青茂等 6 人与会报道。8 时 50 分，北平市市长熊斌携各局局长、各盟国代表同时莅临。盟国代表计有美军司令骆基、参谋长华顿，英国代表蓝来纳（又译兰赖那），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高克等多人，分列殿内左右指定席。此外，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处长梁述哉，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书记黄逸秀及委员马庆瑞、张文波、马耀三、韩受卿，中央宣传部平津区特派员张明纬，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委员张怀、左宗纶，第 9 路军门致中总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平津支团康绍禹，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

哲熙，河北省教育财政厅厅长施奎龄，参议何海秋，暂编 12 军军长韩永和，及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士、各报社通讯社记者共 400 余人先后到达。广场十万余名民众的声浪渐次平息，静观大殿。

丹墀中央置一大方桌，铺干净白布单，上放墨盒笔架各两份，降书及日本受领降书证置于桌中央。桌后正中及对面置硬木太师椅两把，为受降主官及日军投降代表签降座椅。大殿左方为国际贵宾席，右方为各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席。第 9 路军及警察局派大批警卫官兵于会场四周及天安门、西华门等处严密警戒。

受降签字仪式于上午 10 点

开始。各长官、贵宾就位后，吕文贞恭引受降主官孙连仲由太和殿休息处步入场地，幕僚人员排队站在受降官后方，全体肃立致敬。太和门内十余万民众自发热烈鼓掌。主官就位后，司令官传达主官命令：“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命令传出，全场立刻肃静。据当时一名目击者回忆：“万人会场上一片寂静，除了南归的飞雁经过故宫上空发出的几声鸣叫外，此时此刻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日军人员已准时到门外候命，3 分钟后，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携参谋长高桥坦、副参谋长渡边及高级军官 21 人，由太和门外下车，在中方褚先中校引导下步入受降礼堂。

夹道两旁群众，见日军入场投降，高呼“中国万岁！”“这时台下的民众，都欢呼鼓掌，高亢沸腾，情绪之热烈，心情之愉快，表现之兴奋，实空前所未曾有。”“青少年展开欢颜，中年老年人多含热泪。”根本博等 21 人于礼台案前列队一行，向受降主官孙连仲敬礼后退至右方指定位置恭立待命。司仪再喊：“投降代表签字！”根本博急趋案前，再次向受降主官孙

连仲行礼，而后执笔伏案于降书及受降证（三份）分别签字，签字后行礼退回原处。中方主官孙连仲审视后签字。

签字毕，投降代表根本博及以下 21 人奉命将所佩军刀当场依次呈缴，共计 21 柄放置于签字桌上。典礼指挥高级参谋刘云楷将其分别标号附笺收存。据一亲历现场的老兵回忆，根本博在听到传唤命令后，“深深地向主席台进行了 90 度三鞠躬的大礼，而后双手捧着战刀献上主席台”。签降、献刀之后，日军退出，群众欢呼若狂。事毕，根本博等日军受降代表由中方派员引导，自丹墀西侧便道经西群房前出场。

11 时 15 分，军乐队高奏国歌，中方全体观礼长官、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全场民众齐向国旗敬礼，此为历史上最动人的一幕。仪式历时 15 分钟，在庄严隆重且悠扬的乐声中完成。一位亲历者回忆：“整个受降仪式时间不长，但那天，大家都跟过年似的高兴。”台下民众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情绪至烈，声彻云霄，呈 8 年来未有之盛况。

礼毕，受降官孙连仲偕中外来宾步入太和殿休息处同饮“胜利酒”，举杯祝贺光荣之最



/ 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在“投降代表”栏签字。

后胜利，11 时 30 分乃尽饮而散。众人退席出场时，民众夹道欢呼万岁，始终聚集不散，致无法行进。孙连仲频频挥动军帽回应，而后顺利出场。

1945 年 10 月 10 日的太和殿受降仪式，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象征之一。其规模之宏大、地点之特殊、过程之庄严，在中国战区受降史上独一无二。从吕文贞飞抵北平拒握高桥坦之手，到 3 次充满博弈的洽降；从天津受降权旁落带来的刺激与场地变更的决心，到太和殿前 10 万民众欢呼“中国万岁”的感人场景；从根本博签署降书，到黯然呈缴

21 柄军刀——这些生动细节共同构筑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太和殿受降不仅是一个军事仪式，更是中华民族历经 14 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得以恢复的庄严宣告。它洗刷了自甲午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民族耻辱，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和 8 年沦陷的深重苦难。在太和殿的晨曦中，古老的北平，乃至华北，甚至整个中国，迎来了重光。这一历史时刻，将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成为国家复兴道路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董伟

（作者单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

黄埔军校在祖国统一进程中的时代价值

□ 王海青 李立

2024年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贺信充分肯定了黄埔军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贺信也肯定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沟通两岸、推动祖国统一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黄埔军校百年历史的时代价值

孙中山积40年革命之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校。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希望黄埔学生将来成为革命的骨干，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他勉励黄埔学生“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一心一意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

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黄埔军校办学的最大特色和成功之处，就是进行政治教育与政治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开展起来的，是前所未有之举，从这里，黄埔军校迈出思想建校、政治建军第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通过帮助国民党办军校，开始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也开始注重军事。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经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

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军事人才，这些骨干在后来的东征、北伐、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征时期，黄埔师生付出巨大牺牲，实现了广东的统一，为后来的北伐准备了稳固的大后方。北伐时期，黄埔师生是重要力量。黄埔教官郭俊，黄埔1期生文志文、曹渊、金佛庄、蒋先云等血洒疆场。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师生战斗在抗战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埔军校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标志着中国军事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曾多次高度评价黄埔军校。他说，北伐时期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一个红浦，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毛泽东还在总结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绩时称赞说：“昔日

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朱德元帅也盛赞黄埔军校，肯定黄埔军校的历史功绩。1962年，朱德与黄埔军校出身的陈奇涵上将、杨至诚上将谈话时，特别指出：“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朱德所说的“老根”指的就是黄埔军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黄埔军校培养的黄埔学生历经岁月洗礼，不仅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更以深沉的家国情怀，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黄埔校友无论身处何处，皆心系桑梓，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了他们的智慧与汗水。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黄埔军校同学会应运而生。黄埔军校同学会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以“黄埔情缘”为纽带，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在两岸关系的破冰之旅中，黄埔校友展现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与历史使命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

角色，成为沟通海峡两岸的独特桥梁。

当中国进入新时代，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继承先辈遗志，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坚决抵制“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涉，在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黄埔军校百年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篇章。回望百年，黄埔师生因阵营对立、政见分歧，有过激烈纷争甚至生死对抗，但在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守民族大义，谋求国家统一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上，立场是一致的。

新时代黄埔精神的现实价值

最早提出黄埔精神的人，是黄埔政治教官安体诚。1926年，安体诚在《黄埔日刊》撰文《什么是黄埔精神？》，首次提出“黄埔精神”这个概念。后来，黄埔军校学生队总队长张治中、黄埔军校代教育长方鼎英等先后阐释过黄埔精神。黄埔军校建校4周年时将黄埔精神概括为“牺牲、团结、负责”（即为总理而负责、为主义而团结、为革命而牺牲），这里面既蕴含孙中山向往并作为座右铭的“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也包含东征

时形成的“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的“两爱两不”精神，还有北伐中形成的“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

1994年，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江泽民为黄埔军校同学会题词“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黄埔军校建校80、90周年时，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俞正声在讲话中都强调“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2024年，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强调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爱国、革命”成为黄埔精神的核心。

在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年代，爱国主义是优秀青年的精神追求。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求黄埔学生爱国，“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版。）这就是黄埔军校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是黄埔精神的原点，也是黄埔精神的内核，是黄埔精神之魂。

黄埔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强调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战

争岁月里鼓舞着黄埔师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勇往直前。在当代，黄埔精神作为一种具有激励和引导作用的精神传统，又为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鲜活的案例和精神榜样，深化人们对爱国主义的认知，激发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热情和行动。

革命是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的初衷，即打倒军阀、统一国家。所以，孙中山要求黄埔学生具有矢志革命、献身革命的精神。孙中山告诫黄埔学生，“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诸君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孙中山号召黄埔学生要向革命先烈学习，“发扬革命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军校讲演时指出：“如果军队只知道打仗，不知道主义是什么，不知道行主

义，便不叫做革命。”他希望黄埔军校师生“要确信主义”，一心准备革命，做“真正的革命军”。（莫志斌《廖仲恺与黄埔军校》，《黄埔》专刊，2004年。）“革命”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流行词。毕业誓词也成为对学生的最后一堂精神教育课，勉励他们“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誓词》，1926年10月4日。）一批批具有革命精神的军人从黄埔军校成长起来，黄埔精神中“革命”的教育造就了他们的铮铮铁骨。

黄埔军校强调科学精神和实践精神，这与中华文化基因中的求实、务实精神有共通之处。中华文化注重实际应用和实践经验，注重脚踏实地和实际效果，而黄埔精神也特别强调实践和创新的重要性，将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引入军事训练和教育中。黄埔精神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延续和表达，同时也为中华文化赋予了新的活力和时代价值。在当代的军事教育中，黄埔军校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不管是爱国、革命的精神力量，还是科学、务实的教育理念，对培养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又具有现代化观念

的人才仍有现实意义。

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黄埔师生跨越时空的理想追求，也是黄埔精神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黄埔师生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年，黄埔师生东征、北伐，实现了广东的统一和全国的统一；如今，两岸没有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痛，要结束这隔离的民族悲剧，实现国家统一，需要两岸黄埔人团结努力。新时代，两岸黄埔人要共同传承、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当前最大的“爱国”，就是勠力同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革命”，就是“革”掉“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命”，扫除统一道路上的障碍。广大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发挥黄埔的独特作用，团结海内外所有的爱国力量，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

以黄埔军校的历史资源推进祖国统一

黄埔军校深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具有独特优势。黄埔军校是中华民族携手抵抗侵略、致力民族复兴的

历史见证；黄埔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铸就、共同传承的民族精神；黄埔情缘是两岸同胞“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情感纽带；黄埔军校历史更是两岸同胞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黄埔军校得到两岸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是两岸共同的资产和财富，在两岸同胞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既是沟通两岸的天然桥梁，也是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的载体。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美国打“台湾牌”，妄图利用台湾问题遏制、打压中国发展；台湾当局打“美国牌”，妄图“倚美谋独”“以武拒统”。美台相互勾结，推升台海风险。尤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他的“520”讲话、“双十”讲话、“赖17条”、妄称祖国大陆为“境外敌对势力”等，都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言论，对祖国大陆充斥着敌意与挑衅。“台独”势力更加激进冒险，很可能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对这种背离岛内主流民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制造台海冲突的顽固“台独”分子，祖国大陆绝不姑息容忍。不管“台独”势力如何嚣张，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

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应该看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科技水平比肩美国，军事实力威慑美国，国际塑造能力逼近美国。美国因战略透支、国内撕裂、发展模式危机等结构性因素，以及俄乌和中东冲突等，势必继续走下坡路，中美之间攻守进退态势必将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美关系有望实现一定程度再平衡。届时，美国打“台湾牌”将逐渐力不从心，进而牵动台海局势及国际格局的变化。面对美国“弃台”的可能，台湾民众将更加面对现实，对“台独”失去信心，对美国产生疑虑，结束两岸对立、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得到更广泛认可，国家统一感召力亦会止跌回升。

孙中山先生曾说：“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

一，便要受害。”（《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3页。）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在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中，同根同源、同文同宗、血脉相连的海峡两岸同胞，应寻找“最大公约数”和更多共同点，而黄埔军校及其人文历史资源就是其中之一。百年黄埔，风云激荡，沧海桑田，初心如磐。要充分挖掘黄埔军校的人文历史资源，发挥其联系两岸的独特作用。黄埔精神作为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如同人类一切优秀精神遗产一样，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超越时代的魅力。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排除种种阻力，从对立、隔绝走向交流、交心，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今天，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共同传承和弘扬黄埔精神，不仅是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更是对两岸共同价值理念的锤炼和强化，有助于将两岸文化认同引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新境界，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黄埔

（王海青，厦门广播电视台集团；李立，北京联合大学）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5年6月—7月

□ 吴亚明

6月

公安机关依法公开通缉台湾“资通电军”重要犯罪嫌疑人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5日发布悬赏通告，公布中国台湾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指挥实施的非法网络攻击活动涉嫌多项违法犯罪，并对宁恩纬等20名参与实施网络攻击活动的重要犯罪嫌疑人进行悬赏通缉。这是公安机关首次通过执法行动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首次对台湾“资通电军”有组织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集中打击，一举查实了20名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全面固定犯罪证据并公开悬赏通缉。

国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洋关联企业予以惩戒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日表示，经查，“台独”顽固分子沈伯洋之父沈土城在台湾企业兆亿有限公司担任负责人，该公司与大陆某些企业存在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大陆方面决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谋利，决定对兆亿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并将对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台湾学界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还原台湾人民抗日真相

7日，由《祖国》杂志社主办、两岸和平发展论

坛协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座谈会在台北举行。与会台湾学者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掩盖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对乙未战争如此重大之历史事件装聋作哑。希望通过座谈会还原历史真相，唤醒台湾社会的真实历史记忆。

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江苏主题营举办

以“促进两岸科技创新交流 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题的台盟中央2025年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江苏主题营10日在苏州启幕。60多名营员走进昆山元宇宙产业创新中心等地，感受祖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亲身调研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获捐手机族谱查询系统助台胞寻亲

10日，由国家级对台专题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推进建设的“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获捐族谱8部15册以及“KFA手机族谱查询系统”，进一步丰富了两岸族谱信息，有助于该平台为台胞提供精准化族谱对接和寻亲服务。

国台办：《台湾义勇队档案》有力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日答问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台湾义勇队档案》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具有积极意义。

两岸人士齐聚福建平潭探讨基层治理融合新路

12日，第十四届共同家园论坛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举行。来自两岸的政商代表、专家学者、创业者和基层民众等近500名嘉宾齐聚一堂，叙情谊、话交流、促合作，探讨基层治理融合新路。

两部门推出12条政策措施，深化两岸金融领域融合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推出12条政策措施，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深化两岸金融领域融合发展。

洪奇昌率岛内生技产业界人士到北京参访交流
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洪奇昌10日至12日率岛内生技产业界人士到北京参访交流。

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第三届台湾抗日50年纪事“乙未割台与抗日——台湾光复80周年”研讨会在台北举行，台湾各界百余位人士及多位台湾抗日志士后人与会，旨在唤起社会对台湾抗日历史的关注并共同缅怀先烈。

两岸专家学者厦门共商气象服务民生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民生气象论坛14日在厦门举办。百余名两岸气象专家学者聚首厦门，共商气象服务民生。

第十七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
第十七届海峡论坛大会15日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025年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举行
2025（乙巳）年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21日在台湾新北市举行，数百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当日，祖国大陆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2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

台湾民间团体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发动“大罢免”政争

24日，台湾社会共好论坛筹备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台湾人民守护民主正义连线等多个民间团体在台北举行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发动的所谓“大罢免”，指出这场政治斗争破坏台湾民主，旨在

谋取政治私利。

国台办：7月起免收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证件费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日宣布，为进一步便利台湾同胞来往大陆，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经财政部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入境管理局，决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免收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证件费。具体政策由出入境管理局组织实施。

台湾舆论：赖清德“团结十讲”旨在鼓吹“台独”制造仇恨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启动所谓“团结十讲”，岛内各界对此广泛批评，指其刻意篡改历史、鼓吹“台独”史观，为推动“大罢免”政治斗争谋取政治私利进行文宣造势，“团结十讲”其实是“斗争十讲”，只为制造仇恨与不满。

国防部：解放军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6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解放军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上海举行系列活动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抗战记忆

“赤子同心补金瓯”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暨台胞抗日史料展30日在上海开幕。由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策划举办的此次展览，在广泛征集两岸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史籍复制、报章摘引、实物陈列等形式，通过“自古一家”“马关割台”“乙未抗战”“日据暴政”“武装抗日”“文化抗日”“欢庆光复”等主题篇章，呈现了1895年至1945年的半个世纪中，台湾同胞坚持团结抗战、奋勇保家卫国的宏大史诗。

7月

两岸以船政文化为纽带追溯共同历史记忆

作为第十七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1日在福州马尾举办。活动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为契机，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吸引海峡两岸船政专家学者、船政后裔、台青代表等200余人参加研讨。

第十九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举办

以“融合发展 共建支点”为主题的第十九届湖北·武汉台湾周4日在武汉开幕。1700余名两岸嘉宾齐聚一堂，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和乡村振兴等，共话两岸融合发展。

第二十二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广东珠海开营

4日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二十二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广东珠海举行开营仪式。夏令营共有来自宝岛台湾、港澳地区及海外16个国家的1800余名台湾青年大学生参加，分设总营和地方分营，举办各类特色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其中，总营于4日至6日在广东省举办，分营活动将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持续开展。

台湾政党团体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80周年，台湾劳动党、人间出版社等5日在台北举行研讨会，呼吁岛内社会正视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的历史，树立正确史观。

国台办发言人就启用M503航线W121衔接航线答记者问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日答记者问表示，民航局6日宣布，启用M503航线W121衔接航线。这一举措，是为缓解有关地区航班增长压力，保证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保障旅客权益，对两岸同胞都

有利。

台湾多个政党团体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要求当局正视台湾人民抗日史实

台湾社会共好论坛筹备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劳动党、统一联盟党等10余个政党团体7日在台北冒雨集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呼吁“尊重抗日史实、反对媚日史观”，要求民进党当局正视两岸共同抗战及台湾人民抗日史实。

台商台企现身兰洽会，看好祖国大陆“商机无限”

在第三十一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多位受访的台湾企业界人士表示，期待陇台两地持续加强经贸往来，赢得“商机无限”。

国台办对台湾风灾表达关切

7日，台风“丹娜丝”在台湾登陆，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大陆有关方面对此高度关切，对不幸遇难的台湾同胞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表达慰问，并希望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国台办发言人就商务部公告将8家台湾地区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答记者问

9日，商务部公告将8家台湾地区实体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妄图“倚外谋独”“以武谋独”，部分台湾地区实体参与其中，助纣为虐。商务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将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台湾地区实体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这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举措，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一再进行谋“独”挑衅的严正警告。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支持。

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活动在长沙举办

“乐越山海·相遇湖南”2025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暨第二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11日在湖南长沙开幕，海峡两岸500余位少数民族代表和青年学生代表参加。

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聚焦“人工智能(AI)赋能职业教育”

2025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16日在福州开幕。来自两岸的职业教育专家、学者、院校、机构和企业代表等230余人，围绕“人工智能(AI)赋能职业教育”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2025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以“同心同行 青春力量”为主题的2025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7日在江苏苏州开幕。本届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8月底，在江苏各地举办书画、体育、戏曲、动漫等近40场系列活动，约有2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借体育谋“独”挑衅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24日就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一场颁奖活动时发生的所谓“抢夺贺电”事件进行情况说明，并表示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借体育谋“独”挑衅。

外交部：赞赏南非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积极行动

就南非政府不再承认位于其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台北商务办公室”等行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24日表示，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并愿继续与南非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大罢免”首轮投票国民党完胜，台湾舆论指展现民意对民进党当局愤怒不满

针对24名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罢免案26日举行投开票。计票结果显示，罢免案均未获通过，国民党在“大罢免”首轮投票完胜。岛内舆论认为，这一结果是台湾民意的最新展现，代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强烈愤怒与不满。

第八届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体验营在泉州举办

28日，第八届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体验营在泉州拉开序幕，来自两岸及澳门地区22所高校的师生相聚于此。

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0日，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结合开展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有效加强有关海域管控，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厦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抗战胜地、三湘新貌——2025年海峡两岸记者湖南行”联合采访举办

“抗战胜地、三湘新貌——2025年海峡两岸记者湖南行”联合采访活动30日在长沙启幕。来自两岸及香港的40余名记者和特邀台湾青年自媒体人，在长沙、常德、衡阳、怀化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联合采访。两岸记者走访抗战史迹，体悟抗战精神；采访高新企业，调研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探访古城苗寨，感受多彩民族风情。

“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揭牌

31日，“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式揭牌。中心面积700多平方米，设有展示区、收藏区、查询区、交流区、操作区5个区域。

解码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那些“明星武器”

(中)

□ 石稼

UMPK 精确制导弹药

2024年1月，俄罗斯展示了一款名为 UMPK 套件的武器系统。这一套件由一个滑翔弹翼，一个格洛纳斯定位系统模块，相应的自动驾驶仪和舵机组成，其可以让苏34战斗机在高空投放，打开弹翼滑翔后飞向目标，实现防区外攻击。这款精确制导武器最大的亮点是“白菜价”，单价仅2万美元，是西方同类产品（如美国 JDAM）的1/5至1/3。这款武器成本低廉，且具有极高的打击效率，在俄乌冲突中一亮相即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了俄军的关键武器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高端武器的认知。

技术性能。UMPK 模块的基础设计理念是低成本高效能，核心目标是以最低成本将苏联遗留的庞大库存非制导炸弹如 FAB-500、FAB-250 等，升级为精确制导弹药。其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加装滑翔翼组件、



/ “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

导航控制系统和姿态调整舵面，使传统自由落体炸弹具备“发射后不管”的精确打击能力。加装 UMPK 后，炸弹滑翔距离为 40—70 公里，远超传统炸弹的 3—5 公里射程，显著降低载机被防空系统威胁的风险。制导系统采用的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 + 惯性导航复合制导，抗干扰能力通过加密信号与惯性导航备份增强；部分改进型号可能整合激光 / 红外末端导引头，以提高对移动目标的打击精度。该弹药的打击精度为圆

概率误差 5—10 米，接近西方第三代精确制导弹药水平；兼容性好，适配多种口径航空炸弹，包括 250 公斤、500 公斤及 1500 公斤级，覆盖战术至战役级目标。在气动结构上，折叠式滑翔翼设计，翼面为轻质复合材料，展开后翼展达 2.5—3 米，升阻比优化以实现最大滑翔距离。电动舵机控制系统是通过调整俯仰、偏航和滚转姿态实现航迹修正，响应速度达毫秒级。模块化安装采用标准化接口，地勤人员可在 30 分钟

内完成炸弹改装，适应前线快速部署需求。

实战表现。自 2022 年下半年起，UMPK 系统即被大规模投入乌克兰战场，其应用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纵深打击，俄军苏-34、苏-35 战斗机在距前线 50—70 公里空域投放 UMPK 炸弹，精确摧毁乌军后方弹药库、指挥所及交通枢纽，典型案例包括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设施的多次打击。二是饱和攻击，利用低成本优势实施多弹齐射，压制乌军“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2023 年哈尔科夫战役中曾出现单日超百枚 UMPK 炸弹的投放记录。三是环境适应性强，在 GPS 干扰强度达 -160dBW 的电磁环境下，仍能通过惯性导航维持 10—15 米级精度，显著优于早期俄制精确弹药。从战术价值上看，成本 - 效能比好，单次出击成本仅为巡航导弹的 1/20，使俄军得以维持高强度精确打击，有效弥补了“伊斯坎德尔”等导弹库存缺口；战术灵活，载机无需冒险突防，在防区外实现多目标打击，配合无人机进行毁伤评估，形成“察打一体”闭环；具有心理威慑效应，持续不断的精确轰炸加剧乌军后勤体系压力，间接削弱前线部

队作战效能。

技术局限与趋势。该弹药存在的主要短板：对气象敏感，强侧风条件下滑翔轨迹稳定性下降，圆概率误差可能扩大至 30 米以上；电子对抗存在瓶颈，面对北约升级版 GPS 干扰系统，如乌克兰部署的“蔷薇”系统，依赖卫星导航的型号效能波动明显；末端机动能力不足，缺乏主动雷达 / 红外成像导引头，难以有效攻击高速机动目标。未来技术升级的主要方向为：可以多模导引头集成，俄罗斯 2023 年测试型号显示，UMPK+ 激光导引头组合已进入实战评估阶段，圆概率误差有望压缩至 3 米内；动力增程改进，可以加装小型涡喷发动机的“UMPK-E”原型弹射程突破 150 公里，可媲美战术导弹；改进人工智能算法，可以通过引入实时航迹规划与威胁规避算法，提升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总体看，UMPK 的投入使用，标志着俄军工体系在“非对称精确战”领域的突破，即通过低成本改造旧装备，在局部冲突中形成可持续精确火力优势。这一路径对资源有限的中等军事强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在高端精确弹药与低成本无人装备间构建“混合打

击体系”，以大幅提升常规威慑效能。这种弹药特别适合在城市战和反恐行动中使用，有助于提高打击效率，减少附带损害。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集群控制技术的融合，UMPK 可能演变为“智能弹药蜂群”节点，进一步重塑现代战场规则。整个 2024 年，据称俄军投放了超过 3 万枚 UMPK 精确制导炸弹，型号从比较轻的 FAB500 到最重的 FAB3000，给乌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俄军自身的损失则极其轻微，几乎没有前线轰炸机被击落，UMPK 在现代战场上的威力得到充分体现。

9K720“伊斯坎德尔”导弹

俄罗斯 9K720“伊斯坎德尔”（北约代号 SS-26Stone）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弹道导弹系统，由机械制造设计局（KBM）于 20 世纪 90 年代研制，2006 年正式服役。作为苏联“奥卡”（SS-23）导弹的继承者，“伊斯坎德尔”凭借其高精度、强突防能力和战术灵活，成为俄军战术打击体系的核心装备，在俄乌冲突中多次亮相。

基本参数。该导弹分为“伊斯坎德尔 -M”（弹道导弹）和“伊斯坎德尔 -K”（巡航导弹变体），两者共用同一发射平台。

最大射程 500 公里，弹头可携带 480—700 公斤常规弹头或核弹头，当量 5—50 千吨。圆概率误差 (CEP) 约 5—10 米，堪比巡航导弹。最大飞行速度 7 马赫，末段俯冲速度超过 5 马赫。

制导与突防技术。该导弹为惯性导航 + 格洛纳斯卫星修正 + 末端光学 / 雷达景象匹配的复合制导系统，飞行中可多次调整轨迹，规避反导系统预测。电子对抗措施为释放诱饵弹和电磁干扰，降低敌方雷达锁定概率。在隐身方面，弹体采用吸波材料和低雷达截面外形，缩短敌方预警时间。发射平台为 8×8 轮式运输 - 起竖 - 发射车，从行军状态到发射仅需 4 分钟，单车可连续发射 2 枚导弹，间隔 1 分钟，发射后迅速撤离；公路时速 70 公里，越野机动性强，适应复杂地形。配备了伪装系统和主动防护手段，以降低被侦察和打击风险。

作战体系与战术应用。该导弹具有多任务兼容性，可打击指挥中心、防空阵地、机场、后勤枢纽等高价值固定目标，也能攻击移动中的装甲集群。作战时可与无人机、侦察卫星实时数据链联动，实现“发现即摧毁”。在战术应用上，实



/ 9K720 “伊斯坎德尔”导弹。

现饱和攻击与精确打击相结合，单旅配备 12 辆发射车，可在短时间内齐射 24 枚导弹，突破敌方反导拦截网，其高精度特性可替代部分航空兵任务，减少有人战机战场风险。该导弹具备核常兼备的威慑能力，可通过快速切换弹头类型，实现战术核威慑与常规打击的无缝衔接，增强战略模糊性。

实战表现。该导弹曾用于叙利亚战场，主要用于打击极端组织据点，验证了复杂地形下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当时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导弹遭电子干扰后容易偏离目标。2022 年俄乌冲突后，主要承担对乌军指挥所、弹药库、防空系统等的打击任务，日均发射量数十枚，通过与“匕首”高超

音速导弹协同，形成多空域打击波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产能存在瓶颈，导弹库存有限，难以满足作战需要；在西方情报支援下，部分发射车遭乌军“海马斯”反制。

总体看，“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体现了俄军“以质补量”的装备发展思路，尽管面临西方反导技术的挑战和产能限制，其升级潜力与俄军技术创新能力的结合，仍使其在未来一定时期保有重要威慑地位。

“猎户座”无人机

该机是俄罗斯首款大规模列装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由喀琅施塔得集团研制，自 2011 年启动项目以来，历经十年磨砺，在叙利亚战场完成实战检验后，

成为俄军现代化无人机体系的核心力量。俄乌冲突中，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主要部署了该无人机，也是目前俄乌冲突中唯一大规模使用这类无人机的战区。主要是因为该地区靠近俄罗斯本土，俄军对乌克兰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有效压制，作战条件相对有利。该机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行动，最大的一次战绩是锁定乌军据点，给乌军造成 20 余人的伤亡。

基本参数。“猎户座”采用常规气动布局，机身长 8 米，翼展 16 米，最大起飞重量 1.2 吨。其动力系统为奥地利 Rotax914 活塞发动机或俄罗斯国产 APD-110/120 发动机，巡航速度 200 公里 / 小时，最大升限 7500 米，具备 24 小时持续滞空能力，作战半径 250 公里。侦察模块标配高分辨率光电 / 红外转塔、合成孔径雷达，可全天候执行目标识别与跟踪，探测距离 100 公里级。有 4 个武器外挂点，最大载弹量 200 公斤，兼容 KAB-20/50 卫星制导炸弹、9M133 “短号” 反坦克导弹及 UPAB-50 滑翔炸弹等俄制精确弹药。操控与数据链部分采用的是 “人在回路” 操控模式，依赖地面控制站，同时支持卫星中继扩展任务范围。

作战性能。“猎户座”凭借长航时与大载荷优势，可执行广域战场监控。其光电系统支持对地面车辆、人员集群的实时跟踪，SAR 雷达则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穿透云层，生成高精度地形图像，为俄军炮兵及空天军提供目标指示。该机具备精确打击效能，尽管载弹量仅为美国 MQ-9 “死神”的 1/3，但其适配的小型化弹药在反恐作战中表现突出。例如，KAB-20 炸弹重量仅 21 公斤，误差半径小于 5 米，适合打击轻型车辆或掩体目标。在叙利亚实战中，该机多采用 “发现 - 评估 - 打击” 循环战术，显著降低附带损伤。“猎户座”具备体系化作战角色，该机被整合入俄军 “侦察 - 火力闭环” 系统，与 “海鹰 -10” 侦察无人机、“仙女座” 自动化指挥系统联动，实现从目标识别到火力召唤的分钟级响应。在乌克兰战场上，其常与 “伊斯坎德尔” 导弹部队协同，充当前沿侦察节点。

实战应用。“猎户座”首次实战部署于叙利亚，主要承担对地支援任务。据俄国防部披露，其累计飞行超 1000 架次，成功摧毁极端组织据点、弹药库等目标 200 余个。实战中暴露出滞空时间不足、卫星通信依赖度

高等短板，促使后续型号升级。在乌克兰战场，“猎户座”被广泛用于前线侦察、炮校修正及对高价值目标的 “猎杀”。2023 年，俄军公开视频显示其使用 UPAB-50 滑翔炸弹摧毁乌军 “山毛榉” 防空系统，射程延伸至 70 公里，规避了敌方近程防空威胁。但受限于数量（俄军列装约 30 架）和电子战环境，其出动频率低于土耳其 TB-2 无人机。目前，国际版的 “猎户座 -E” 已出口至阿尔及利亚、缅甸等国。

总体看，“猎户座”性能介于美国 MQ-1 “捕食者” 与 MQ-9 “死神” 之间，但航程、载弹量及网络化水平落后一代。其最大短板在于缺乏卫星通信全域覆盖能力，依赖地面站限制了战略级侦察范围，其技术成熟度与体系整合能力仍显落后。未来，随着俄乌战争的经验反馈与工业链调整，该机型或将成为俄军 “非对称作战”的重要支点，推动其无人机发展从辅助支援向主战装备转型。

S-400 “凯旋” 防空系统

S-400 “凯旋” 防空系统，是俄罗斯阿尔玛兹 - 安泰公司研发的第四代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设计目标是为俄罗斯及其盟友提供多层次防空能力，覆

盖从超低空到高空、近程到超远程的全域防御，并能对抗包括隐身飞机、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多种威胁。该系统2007年服役，被视为全球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

基本参数。S-400采用模块化设计，核心单元包括指挥控制中心、雷达系统、导弹发射单元和运输载具。指挥控制中心是基于数字化网络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并引导导弹攻击其中36个。雷达系统有91N6E大型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600公里，具备360度全向扫描能力；92N6E火控雷达，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探测范围400公里；96L6E低空补盲雷达，针对低空飞行目标，探测距离250公里。每辆发射车配备4枚垂直发射导弹，可混装多种导弹类型。运输载具为基于8×8或12×12轮式高机动底盘，适应复杂地形快速部署。S-400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兼容多型导弹，形成分层拦截体系，包括40N6E远程导弹，射程400公里，射高30公里，针对预警机、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48N6E3中程导弹，射程250公里，射高27公里，用于打击中高空目标；9M96E2中近程导弹，



/ S-400“凯旋”防空系统。

射程120公里，射高20公里，机动性强，可拦截高机动目标；9M96E短程导弹，射程40公里，专攻低空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该导弹系统从行军状态转为战斗状态的展开时间为5分钟，撤收时间为3分钟，具备“发射后撤离”能力以规避反辐射打击。作战半径最大覆盖范围400公里，形成半径600公里的防空区。

作战性能。S-400具备多目标拦截能力，可同时引导72枚导弹攻击36个目标，采用“多频段雷达+多型导弹”组合，实现对不同高度、速度目标的同步拦截。例如，可同时使用40N6E拦截高空战略轰炸机，9M96E2对抗低空突袭的巡航导

弹。具备抗干扰与隐身目标探测能力，电子对抗采用频率捷变和脉冲压缩技术，降低被干扰概率；有反隐身设计，91N6E雷达的L波段(1-2GHz)对隐身飞机具备一定探测能力，结合低波段雷达与红外/光学系统，提升对F-35等隐身目标的发现概率。S-400通过48N6E3导弹和高速数据链，可拦截射程3500公里内的中程弹道导弹，最大拦截高度35公里，填补了俄罗斯中段反导能力的空白；可与S-300系列、铠甲-S1弹炮结合系统及A-50预警机联动，构建一体化防空网络。例如，铠甲-S1负责末端防御，S-400则专注远程拦截。

机动性能。该导弹发射车

使用BAZ-6402型12×12特种底盘，载重40吨，公路时速80公里，越野时速40公里，最大行程500公里。雷达车搭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械厂生产的MZKT-7930底盘，具备核生化防护能力和独立发电系统，可在主发动机熄火后维持系统运行4小时，确保隐蔽部署时的持续作战能力。有战略机动性，系统模块可通过铁路快速跨区部署，24小时内完成1000公里范围内的战略投送。

实战评估。2018年，俄军在叙利亚部署S-400后，以色列战机转向低空突防并增加电子干扰，显示S-400对传统空袭模式的威慑。在俄乌冲突



/ UMPK 精确制导弹药。

中，该导弹主要担任巡航导弹拦截任务。俄方宣称S-400在拦截乌克兰“圆点-U”战术导弹和“海王星”反舰导弹中表现良好，但缺乏第三方验证。2022年，乌军曾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多次攻击俄防空阵地，至少2套S-400被毁，暴

露其阵地防护弱点。

总体看，S-400凭借其超远射程、多目标拦截和抗干扰能力，成为俄罗斯防空体系的支柱。但实战中暴露的反无人机短板、高维护成本及数据链兼容性等问题，限制了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效能。■

“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日子” 主题征文启事

自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以来，各省区市广大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工作人员，遵循“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在各自的岗位上，热心为黄埔同学服务，在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与黄埔同学结下了深厚感情，在与众多黄埔同学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为记录黄埔军校同学会发展历程、展现广大黄埔同学精神风貌、总结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经验，《黄埔》杂志社特开展“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日子”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广大

黄埔军校同学会机关工作人员征集稿件，征文内容包括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期间经历的事件、接触的人物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等。要求讲具体人物，具体事情，具体过程，具有故事性、可读性。征文字数不限，每文最好配数幅图片。

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的姓名、身份、电话、地址、邮编、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电子信箱：hpzzs88@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杂志社

邮编：100075

电话：010-58336325

联系人：陆东红

随“山河为证”策展人寻访黄埔旧址

□ 单补生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12日，由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山河为证——抗战文物特展”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隆重启幕。作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黄埔生后代，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开幕式。西安黄埔后代与会者有：窦杰民、郭睿、刘宏伟、孙卫星等。

本次展览由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军品专业委员会主任鲍浩源，军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黄埔七分校研究专家王翀，武警工程大学抗战史研究专家蒲元，及版本收藏家叶阳雨4人历时3个月精心策划完成。展览展出300余件珍贵抗战文物，引领观众重温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共同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我深感此次文物展意义非凡——这些静默的陈列品绝非冰冷器物，而是历史深处最真切的回响。每一顶斑驳的钢盔、每一纸泛黄的家书、每一帧模糊的影像，都是抗战



/ “山河为证——抗战文物特展”策展人鲍浩源在展览现场讲解。

烽火中不屈灵魂的证言。这些无声的展品胜过千言万语，将侵略者的暴行与中华儿女的浴血抗争，定格为不容篡改的历史铁证，击碎任何粉饰侵略的迷梦，在岁月长河中刻下永恒的印记。这些展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凝聚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与“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决绝意志，成为激励后世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当我们凝视那些见证国共

合作、并肩御侮的文物时，更能感受到其超越历史烟尘的当下价值——它们是维系两岸同胞血脉亲情的坚实纽带，无声诉说着团结奋战的峥嵘岁月，也深情呼唤着祖国统一、亲人团圆的明天。让我们以史为鉴，珍视和平。愿这些承载着血泪与荣光的文物，永远警示后人：历史不容遗忘，伟大的抗战精神必须永续传承！

展览期间，我随鲍浩源、王翀、叶阳雨等一同参观了国

瑞陈列馆、版本书店、孔庙碑林，并寻访西安抗战印记。

寻访黄埔七分校办事处旧址

抗战时期，中央军校在西安南郊王曲镇成立第七分校，为便于与外界联络，特在西安城内下马陵董子祠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简称七分校办事处），处理日常事务。

鲍浩源是上校预备役军官，酷爱军品收藏，近30年淘到军品万余件，当中不乏珍贵文物。鲍浩源博学强记，为人亲和，擅长演说。我们从孔庙出来向东，漫步于文昌门至和平门之间的下马陵。路上，鲍浩源手指明城墙，兴致勃勃地讲道：“这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在隋、唐都皇城遗存的基础上，历经8年扩建而成的，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建筑。城墙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1.9公里，城墙完全围绕‘防御’战略体系，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城墙有完善的排水系统，雨季无积水。抗战时期，当局派遣工兵在城墙开挖防空洞，供百姓躲避敌机空袭。南门城楼、



/ “山河为证——抗战文物特展”策展人王翀在展览现场讲解。



/ “山河为证——抗战文物特展”策展人蒲元在展览现场讲解。

瓮城、箭楼尤为壮观，大型的仿唐入城式就在南门举行。”经过东仓门便来到了董子祠，不料院内修缮，大门紧闭未能进入。鲍浩源站在门前说：“董子就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他向汉

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春秋大一统’思想，均被采纳，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董仲舒在位于长安陋巷的家中去世后，葬于长安胭脂坡，后人



/ “山河为证——抗战文物特展”展出的抗战文物。

在此建有董子祠。这里是通往芙蓉园的必经之地。有一天，汉武帝巡幸芙蓉园，途经此地看见董仲舒墓，出于对圣贤的敬意便下马步行，文武百官效仿汉武帝也都下马，敬拜董仲舒之墓。从此，这里便有‘下马陵’之名。明代文人马理诗曰：“汉朝冢墓知多少，今古独崇下马陵。”有趣的是，在陕西方言中‘下马’与‘蛤蟆’谐音，因此下马陵又称蛤（虾）蟆陵。”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王翀致力黄埔七分校研究多年，他治学严谨，秉持“以物证史”的学术理念，潜心收集抗战时期的珍贵文物。为还原历史真相，他不辞辛劳遍访各

地黄埔七分校老兵，详实记录口述史料，赴王曲校址实地考察，走访当地耆老，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他还致力于数字化传播黄埔军人的抗战历程，大力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其研究成果在学界广受赞誉。

王翀说：“抗战时期，下马陵董子祠及东仓门一号曾是西安最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七分校主任兼战干四团教育长胡宗南将办事处设在董子祠意在崇儒重道。”王翀还向我们介绍了胡宗南的一些轶事。

1944年冬，侵华日军在豫湘桂会战后攻陷黔南重镇独山，其先头部队继续北犯，兵锋直

指贵阳，西南大后方危在旦夕，陪都重庆为之震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调第一战区胡宗南麾下精锐——刘安祺第57军与胡长青第97军昼夜驰援。胡宗南抽调其最精锐之第1军、第16军各一部，在中美联合空军配合下，动用C-46、C-47等型号运输机200余架次，自西安机场昼夜实施战略空运，7日之内完成两个整编军的投送，创下我国抗战史上大规模战略空运之壮举。将士甫抵黔境，未及休整即投入战斗，与守军密切协同，经旬日血战，终在12月初击溃日军第13师团，一举收复独山战略要地。此役不仅彻底粉碎日军“一号作战”之最后企图，解除贵阳之危，更稳定了西南半壁江山，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重要基石。

王翀介绍道：“如今的和平门在1939年还只是一个扩建的豁口。当时为了便利城内教官往返七分校授课，专门开通了每日一班的通勤班车——清晨4点从城内办事处发车，直达终点王曲七分校本部，傍晚6点再返回城内。”他特别说明，这个交通安排不仅解决了教学人员的通勤问题，同时也兼具防空疏散功能。此外，七分校每期招生时，都会在办事处设立

报考点，待录取名单确定后便张榜公示，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

此外，由于历史变迁中房屋改造、街道扩建以及地名门牌的新旧更替，导致产生了“下马陵一号是否东仓门一号”的疑问。为此，版本收藏家叶阳雨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翔实的史料考据，作出了清晰解答：胡宗南在西安期间，东仓门一号是其主要的居住官邸，而下马陵董子祠则承担日常办公职能。两处建筑虽同处南城门内警戒区域，却为独立建筑实体。

东仓门一号的历史沿革可追溯至清代，其路西曾设敬禄仓。至民国时期，该处为胡宗南在西安的官邸——胡公馆。这座位于南城门内东仓门的花园式建筑占地四亩有余，兼具办公、会客与居住功能。东仓门一号与下马陵、董子祠、效忠里（胡宗南侍卫队驻地）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军事禁区体系。

下马陵作为西汉大儒董仲舒的祠墓所在地，毗邻南城墙。胡宗南曾将董仲舒祠堂改造为办公及起居场所：正屋作为其办公室与寝室，两侧厢房安排随从及警卫人员居住，对外称



/ 董子祠老照片。



/ 作者一行在黄埔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旧址董子祠合影。

“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因公务繁忙，胡宗南常在此留宿。尽管下马陵与东仓门一号南北相距仅约 50 米，在空间布局上分属不同区域，但二者在军事管理上具有高度关联性。

1939 年，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虽将指挥部设于城外小雁塔，但其主要办公居住

地仍在下马陵董子祠。下马陵、东仓门一号及效忠里连片划为军事禁区，并配备全天候武装警卫，形成了严密的军事管制区域。这一布局既体现了当时特殊的军事需求，也反映了两处建筑在功能定位上的明确区分。

我们在 1936 年版《西京快

览》中发现了南城地图。该图清晰显示东仓门与董子祠分处不同位置，这一实证资料表明：“下马陵一号并非东仓门一号。”

参观战干四团大礼堂旧址

位于西北大学校园内的战干四团大礼堂旧址平日不对外开放，经蒲元教授与西北大学宋老师协调，我们得以获准进入参观。

1936年，东北大学部分教职员及学生流亡至此建校，战干四团大礼堂原为东北大学建造使用。大礼堂门前立有东北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载了东北大学的建立及赴陕建校的经过，全文如下：

东北大学系民国十二年奉天省长王永江议就沈阳高师旧址创设，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学，十七年八月今校长张汉卿先生莅任，自行捐款一百八十万圆，于北陵新址建筑校舍及体育场，规制崇闳甲于全国。二十年九一八变作校舍随地方以俱陷，是年十月十八日于万难中，权在北平复校。二十二年三月卓然受命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当时经费无着几难支持，幸赖王叔鲁、宋子文两先生之力，由中央补助经

常费年三十万元，复赖孔庸之先生之力，中央准给设备费二十万元，分十年支付，然以北平环境关系，众议迁地为良卒，赖杨虎城、邵力子两先生及陕西地方人士之赞助，获得西安今址，张校长以其地不敷用，为筹款十万元，以万圆购地，万圆修理旧房，余八万元建筑新舍，交由卓然规画，并由本校建筑系毕业刘致平君设计，马俊德、刘鸿典、铁广涛、丁凤翎是四君绘图，均系义务；林主任耀山主持建筑，鸠工庀材，极为尽心；监工人孙继杰亦以为母校服务不辞劳瘁，用能以有限财力完成较巨工事，诚不可不记也！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王卓然谨识

宋老师打开大门，我们紧随其后步入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墙壁上悬挂着历史照片——战干四团的证章及训练场景、西北大学师生在烽火中坚持办学的珍贵图像，每一幅都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宋老师讲解道：“1936年2月，寄居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及其补习班41名教职员和263名学生迁入西安。东北大学这些建筑不到一年时间即全部竣工，兴建大礼堂时在墙基内嵌砌了一



/ 东北大学纪念碑。

块纪念碑，刻有张学良校长的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勦尔多士，复我河山。’大礼堂坐北朝南，平面呈飞机形，由门厅、左右门房、左右廊房、礼堂大厅、后台组成，为砖混结构，占地1208平方米，采用半圆形屋顶、高窄窗设计及四根圆柱支撑的风雨厅等特色建筑结构。其墙面的红五角星为解放后镶嵌，体现了时代印记。”

1938年初，日军兵锋直逼潼关，4月，东北大学再次南迁至四川三台。学校撤离后，留下的校舍、办公楼和大礼堂被战干四团接收使用。在此期间，战干四团从小南门至西关之间修建了占地50余亩的大操场，将校门至西关的“大学路”改扩建并更名为“战干路”。团



/ 中央战干团特科总队生产技术班第一期毕业照，背景为战干四团大礼堂。

内有3个医务所，并在西安城内西五台附设战干医院，有医护人员80名，病床50张，有X光机、手术灯，可做小型手术。1939年11月26日，战干四团遭敌机轰炸，政治部办公室全部被毁，其他营房也有坍塌，庆幸大礼堂安然无恙。当时的大礼堂舞台上可谓“冠盖云集”，军政要人轮番登场训勉师生。战干四团特设艺术班，延聘韩国音乐家韩悠韩担任教官，培养文艺骨干，还成立战干剧团在此排练演出，舞台上名角云集，好戏连台。大礼堂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之一，也是西北大学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现已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老师堪称大礼堂的文物守护者。无论寒暑晴雨，他始终如一地坚持每日巡查，以专业眼光审视礼堂内部每一处细节，如舞台纹饰、木门合页、高窄窗等，发现隐患立即协调处理。礼堂顶部悬挂着4个民国时期的大吊扇，在一次例行检查中，他敏锐地发现其中一片木制扇叶已开裂悬垂，当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抢修更换，及时消除了高空坠物的隐患。面对频繁来此取景的影视剧组，宋老师不仅严格履行文物保护协议签订程序，更坚持全程现场督导，常常守候至最后人员撤出，确认场地安全无虞后才放心锁门离去。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近百年

的建筑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光彩。临别之际，我们向宋老师赠送了一份礼物——一张摄于抗战时期的战干四团师生在大礼堂门前的合影，以表谢意。

战干四团旧文二则

谢冰莹忆初见胡将军

1939年秋天。我因慢性盲肠炎发作，扶病从老河口回到重庆去开刀。伤口还没有复原，就接到家兄国馨自西安来电报，促我即日赴京主编一个文艺月刊。我当时莫名其妙，不知道该刊的宗旨是什么？发行人是谁？稿费可靠不可靠？一连串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翻滚，几天之后，哥哥的长信来了；他告诉我胡宗南

先生新成立一个新中国文化出版社，计划出版大批有关军事、政治和文艺、哲学方面的丛书，还要发行文艺、科学、军事、政治性的四大刊物；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因为有次他在王曲和胡先生谈到我，所以胡先生立刻叫他拟电报稿催我速去西安。最后，家兄还用命令式的口吻写道：“冰妹，用不着考虑，千万不要迟疑，胡先生这个展开大西北文化运动的计划，是我一个人拟定的，胡先生的魄力真了不起，眼光远大，出版社的前途不可限量，你千万要来，哪天动身，先来电报，我叫你三嫂去洛阳迎接你！”我把哥哥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为了省钱，我没有回电，只写了一封航快告诉他，我决定应聘。抵西安的第二天晚上，胡先生在战干四团的贵宾接待室为我洗尘，还请了教育长葛武棨先生，副教育长蒋竖忍先生以及政治部十多位先生作陪，我还记得那晚吃的是西餐，我坐在胡先生的右边，家兄坐在左边，这种安排，显然把我们兄妹当做今晚宴会的主客，我受宠若惊地望着胡先生，他矮矮的个子，身体很结实，脸上露出严肃中带有和藹的笑容。他不喜欢多说话；可是说起话来每句都是实在的，有力量的。胡先生说：“我

们需要多做一点文化工作来教育青年；同时几十万军人在西北作战，没有精神食粮是不行的，所以我特地要令兄请你来帮忙主编一个文艺月刊，你想用什么名字好？”“我们已商量过了，就用‘黄河’两字。”我回答他。“好极了！好极了！我们正在黄河流域作战，这两个字太好了！太好了！”我那时酒量很好，尤其在兴奋的时候，也会把酒当做汽水喝的，但胡先生并不如此，他不喝酒，只举杯表示敬意。

我到西安还不到一个月，《黄河》出刊了，在有沙漠之称的西北，这是唯一的精神食粮，由五千份一跃而为一万二，是我当初梦想不到的事，我高兴极了。胡先生每次一见到我便说：“《黄河》编得好极了！好极了！几时要请你到王曲七分校去演讲，你是他们的老大姐，义不容辞，哈哈！”可是我始终没有去，原因是生了胜子之后，我自己喂奶，加之《黄河》的编务太忙，很少有社外活动。

在大礼堂欢迎韩国同学

2月25日傍晚，天色阴沉沉地，寒风吹着未曾消融的积云，吹着我们的热烈的情感和期待的心弦。

我们特科总队的全体同学鱼

贯地走进大礼堂的正门，门上端悬着“欢迎韩国革命青年同学入团受训大会”的红布白字的横幅，方大的字迹，箭似地射入每个同学的溢神的眼珠里，快乐、兴奋、伤心交缠在眼窝，不知不觉地迟缓了整齐的步伐。礼堂里呈现出了一种异乎往常的严肃景象，仿佛预示我们马上就有一幕悲壮的局面展开。没过好久，在欢笑的掌声中，我们的异邦友人，我们可敬的同学，挺着胸脯迈步走进来了；大家用目光周详的数个清楚；一个，两个……

在紧张的空气中，司仪宣布开会。行礼如仪后，首由主席总队指导员高承麒先生报告开会的意义：“中国欲求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必须获取韩国及各友邦的帮助，同时，中国的抗战也正是韩国复国的最好机会。历史告诉我们：捷克的革命领袖马萨里克，波兰的革命领袖比尔符斯几，都因领导国民参加第一次欧战，获得祖国的自由独立。中韩两国素来是患难相扶持的亲密兄弟，远在唐朝高宗及明朝神帝时，中国曾两次出兵帮助韩国击溃日寇，现在中国又为保卫自己解放韩国来和日寇战斗了。我希望韩国同学加紧学习，与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发挥最大的力量，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徐会之在抗战中的二三事

□ 童吉怀

徐会之(1901—1951)，湖北黄冈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抗战时期，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兼政治总队总队长。1938年初，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第1处处长。同年，第五战区成立，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后来，徐会之先后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总政治部二厅厅长、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湖北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襄樊警备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等职。

支持国共联合抗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1937年7月9日，徐会之奉命赴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任第1总队第5大队指导员。其间，他用短短9天时间撰写了《民众训练须知》，受到当时社会各界普遍赞赏。



/ 徐会之。

训练团毕业后，徐会之积极组建保定行营政训处，并出任处长一职，为说服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等与八路军化敌为友、共御外侮，做了大量工作。当平型关大捷喜讯传来之际，徐会之在《中国军人》月刊上发表署名文章《平型关大捷》，祝贺第18集团军取得的军事胜利，并号召华北各部队向第18集团军学习。

9月，中共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徐会之代表保定行

营主任徐永昌在欢迎会上致辞：“我代表行营徐永昌主任及所属官兵和石家庄各界人士，向中共军事联合视察团的代表周恩来将军、彭德怀将军、蒋鼎文主任亲临前方视察，共商抗战大计，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和18集团军向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全体官兵及民众表示亲切的慰问！会后，徐会之陪同视察团乘专车去太原。

1938年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用房紧张，董必武找到学生徐会之，徐会之将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一幢四层楼房)拨给八路军使用。之后，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在那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

在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政公署主任期间，为了支持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徐会之与国民党政府官员斗智斗勇，在他们之间周旋，

调动各方力量筹备药品、枪械、弹药、粮食等抗战物资。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他利用鄂北行政公署警保处王处长秘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源源不断地输送抗战物资。

保护进步人士

1938年，徐会之主持第五战区政治部工作时，任用和保护了不少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安徽大学教授詹云青、清华高才生穆谓琴及燕鸣轩等。1月中旬，徐会之从华北前线回到郑州，政训处第一科科长刘牢一向他汇报处内情况，谈到第三科上校科员詹云青(前安徽大学教授)言论有些“偏激”(意思是说詹对国民党有不满言论)。徐会之微笑着对刘牢一说：“读书人嘛，看问题是和我们军人不同的，只要他的言行不背叛国家民族，是抗日救国的，我们都应该欢迎，我们要团结所有应该团结的人，改掉过去老一套的关门做法。”后来又补充道：“我们负有动员辖区军民一致抗战的使命，因此，辖区内的一切抗日救亡民众团体像各地抗日宣传队、流亡剧团等，我们都要扶助他们，团结他们，共同对敌。”之后，詹云青得到徐会之重用，

还随徐会之调去第五战区政治部任职。

1939年，徐会之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直属第4大队中女生队队长潘琰，分队长赵亚夫，队员张全心、陈国钧、王云、龚承平等被指控为“激进分子”，并有被加害的危险。为了保护他们，徐会之立即采取措施，以政治大队名义保送潘琰、潘茜、王云等到湖北建始师范学习，以边署政治部名义分发赵亚夫、张全心、陈国钧、龚承平等到第25补训处担任连指导员，使他们化险为夷，安全脱险。

得到李宗仁的信任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湖北属李宗仁驻军的军事防区，但在行政上属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管辖。1940年5、6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辞职，由张治中接替。张治中上任几个月后，着手调整各战区政治部的人事，免去韦永成的五战区政治部主任职务，委任徐会之为政治部主任。徐会之到任后即从抗战大局出发，协调李宗仁桂系与

中央军的关系，对战区政治部的工作、人事也作了适当调整，尽量做到兼顾各方、合理利用、各尽其才。他自己与战区参谋长、机要室主任、机要秘书、军务处处长等人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对属下更是爱护有加。

在老河口期间，徐会之经常随同李宗仁参加一些群众抗日集会活动，如光(光化)河(老河口)各界联合纪念周，国民月会和国民党所规定的各种纪念集会。对于这些集会活动，徐会之都精心部署，亲临会场主持。李宗仁把每次群众集会人数、场面热闹程度，作为衡量政治部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为了做好集会的举办工作，徐会之注重调动下属积极性，他把各种群众集会的筹备工作交给主管宣传的第三科(科长燕鸣轩系中共内线人员)负责。政治部的工作常常得到李宗仁的赞赏，徐会之还常主动向李宗仁汇报工作情况，李宗仁对他的工作能力给予充分肯定，他也逐渐得到李宗仁的信任。

注重政工宣传

1942年冬，徐会之除担任

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外，还兼任湖北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襄樊警备司令，不久又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政公署主任。

当时，各战区政治部普遍办《阵中日报》。《阵中日报》是战区的机关报，也是战区的主要宣传工具，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徐会之常风趣地鼓励报社同仁说：“古代人把书生穿上军装，习惯地叫作投笔从戎。其实，从戎和投笔，虽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也并没有根本矛盾。从戎并不一定要投笔，如像我们现在，就是带笔从戎。”徐会之还经常告诉大家：“我们这些搞政治、组织、宣传工作的同志虽不直接去打枪放炮，但我们能用笔杆当炮弹投向敌人阵地，横扫千军就是这个意思。《阵中日报》是全战区几十万将士的精神食粮，我们把它办好了，就能起到提高士气、鼓舞斗志的重大作用。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精神力量，比炮火的力量大得多！所以《阵中日报》就是我们现在的战斗阵地。”徐会之自己经常为《阵中日报》撰写分析国际形势的社论和宣传团结抗战的文章，如《抗战必胜》《抗日救国》《如何纪

念双十节》《新年、新形势与新认识》等。战区各部队的各级政工人员，经常把他的文章作为教材，用以教育官兵，鼓舞士气。

徐会之还带领政治部工作人员编印《战地通讯》和《战地》两份刊物。《战地通讯》每月3期，内容包括时事综合述评、战地通讯等。《战地》是综合性月刊，每期印2000—5000份不等。作为这两份刊物的负责人，徐会之非常关注刊物的印刷质量、发行以及读者反馈情况。

多举措治理地方

鄂北地区当时烟、赌、娼盛行，土匪作恶多端，当地宗族间械斗之风经年不息。徐会之作为新任专员、行署主任，面临严峻考验。为了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专员公署办公场所，他都注重与各界民众亲近交谈，以掌握情况，有的放矢。目睹治安的混乱、社会风气的颓废，他发出禁烟、禁赌、禁娼，肃清土匪令，目的就是“除暴安良”，恢复社会秩序和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看到民众生活困苦，徐会之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打击奸

商，平抑物价，减轻民众的负担；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发展地方经济以增加民众收入。他动员民众抗洪、抗旱、灭蝗虫，此外还号召当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为建设鄂北、为全民族抗战贡献力量。

徐会之还特别注重体育运动，提倡全民健身。他说：“民众没有一个好身体，如何进行抗战？哪有战斗力？”于是，机关、学校、部队纷纷响应开展体育活动。1944年5月4日至5日，第五战区举办了以徐会之名字命名的“会之杯”篮球赛，比赛地点是中山公园篮球场。徐会之致开幕词并讲话，说明开展篮球赛的意义和作用，并亲临比赛现场观看球赛。总裁判长丁冬，裁判由杨学礼、郑培心等担任。参加比赛的队伍有“战青”队（战区长官部、辎汽八营代表队），“友联”队（光化代表队），“光化县一中”队、鄖阳中学队，“光青”队（光化三青团），“电友”队（电信局代表队），“前锋”队（新闻界代表队）、襄樊队，共170多人参赛，最后“友联”队夺得冠军。通过体育活动，丰富了当地军民的文化生活，增强了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忆祖父陈明仁

(下)

□ 陈湘生

回校任教

1926年4月1日，祖父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补充第2团第1营中校营长。北伐战争前，祖父作为积累了战斗经验的基层军官“种子”，被调离作战部队，改任黄埔军校入伍生独立营中校营长，以发挥“传帮带”作用。8月1日，祖父调任黄埔军校入伍生第1团第4营中校营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宋时轮时为该营入伍生。《宋时轮传》写道：

宋时轮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学兵，不幸却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留医广州东山医院半年多。由于宋时轮思想进步，住院期间由张一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宋时轮进黄埔军校第6期当入伍生，编在第1团第4营（营长陈明仁）第16连。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太平圩时，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入中国共产

党党员。

黄埔军校第6期入伍生周穆深在《第六期入伍生团留守广东情况》中写道：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打到武汉时，广东黄埔军事政治学校以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名义，在湖南长沙借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原址，招收第6期学生6200名（正取6000备取200）。录取后，由唐生智总部发给路费和介绍信，至广州市长堤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复试入校编队。这批学生绝大部分复试及格，纷纷奔赴广州沙河燕塘编入第6期入伍生1、2两团。第1团团长郭大荣，辖4个营。第4营营长即陈明仁中校；第2团团长李亚芬，辖3个营。第1团主力广州，一部驻广东北江。第2团开往广东东江一带驻防。入伍生团一面担任警卫，一面实施训练，做到任务、学习两不误。入伍生团的武器装备，除每团有一个重机关枪连和一个步兵炮连

外，其余都是步枪，俄国式，装上刺刀。一米七的身材，刚好与步枪齐平高，初次使用，颇感不便，根本没有配备机动车辆，连骡马也很少。

1927年4月，祖父收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第4营官佐学生赠送的铜瓶三件，其中一对铜花瓶铭文分别为“子良营长雅存”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第四营官佐学生敬赠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于虎门”。

1928年4月13日，祖父改任黄埔军校第6期步兵第1总队第2大队上校大队长。他带领的第1总队第2大队，计毕业学生552人（第5中队136人、第6中队143人、第7中队139人、第8中队134人），其中成为国民革命军将军的39人、上校87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12月20日，祖父离开任教两年零八个月的黄埔军校，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第28旅第56团上校团长，从此开始了他更为轰轰烈烈的戎马生涯。



/ 学生赠送给祖父的三件铜瓶，现存放于湖南省长沙市博物馆。

湖南起义

1949年8月4日，身兼国民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湖南省“绥靖”总司令，国民政府湖南省代主席、主席，湖南省保安总司令，长沙警备司令等职的祖父，认清形势，

顺应民心，率部与程潜将军领衔湖南起义。

祖父在起义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与军校校长蒋介石关系的呢？他在《湖南义举》中写道：

（1949年）8月3日下午，我约吴相和等人到我家研究起义

的通电文稿。这些电文稿有：告第一兵团全体官兵书；给台北草山蒋介石等人的决绝电文。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我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力求措辞委婉。

给台北草山蒋介石的决绝电文中，祖父自称“生”，称蒋介石为“钧座”。

电文写道：

台北草山总裁蒋钧鉴：X密。生投笔以来，许身党国，不惜万死。此次奉守长沙，统率大军，本应坚苦卓绝，尽力揩拭。况政府倚畀正切，钧座勉慰有加，人非木石，宁不知事。但焦思熟虑，深觉时至今日，徒言牺牲，终无裨益；唯有倡导和平，始为正确途径。良以抗战以还，人民久罹锋镝，国家元气丧尽，贫穷困苦，世无其匹。而吾湘战祸连绵，惨重更胜各省；今岁水灾遍地，尤属室为丘墟，人为厉鬼，伤心惨目，无以复加！方思救恤不遑，何忍复令涂炭。日来人民厌战、惧战情绪沸腾，呼吁和平，声泪俱下。生长养斯土，痛切肌肤，面对如此现实，瞻念国家前途，甘愿牺牲小我，以全大我，立罢兵戎，与民苏息，期解当前危难，稍留一线。

生机。否则，同归于尽，万劫不复。仅有于国，仅有于民。且政府腐败，失信人民，十余年来幸嬖当权，贪渎无忌，派系林立，徒逞私图，则至正气消沉，人心滔溺，上上下下，唯利是趁，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本党主义不行，党务任人包办，亦属弊端百出。钧座耳目难周，为所壅蔽，见悲不去，迹近纵容；今虽不居名位，而党政仍任若辈把持，迄无革新希望。众人侧目，亲者痛心……生绝非受人威胁利诱，纯属本着良心主张，但求有利国家人民，不计本身荣辱得失，知我罪我，悉听自然。并请钧座运其神智，定难决疑，俯顺民心，适应时势，重申和平意旨，立饬停止战争。俾大局早日底定，国家得免复亡，造福无穷，兆民永赖。生夙沐熏陶，谊难缄默。用敢披其纯洁之赤心，冒进最后之忠谏。临电惶悚，敬乞鉴谅。生陈明仁叩

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

1949年9月3日，祖父应毛泽东主席之邀，离开长沙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10日，祖父抵达北平，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北平市副市长

张友渔到火车站迎接。这些迎接祖父的首长都是精心挑选过的：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教官、祖父的老师，与祖父有师生之谊；罗瑞卿是黄埔军校6期生，虽然不是祖父亲自带的学员，但也算有师生辈分之缘；张友渔时任北平市常务副市长，是法学专家，曾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

9月19日，新政协会议开幕前夕，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邀请程潜和祖父同游天坛公园，刘伯承、陈毅、粟裕、李明灏等也陪同前往。在祈年殿前集体合影后，毛主席突然招呼祖父：“子良将军，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吧。”祖父和毛主席肩并肩的半身合照，是这次游天坛公园唯一的一张两人合影，其余均为集体照片。照完相后，毛主席关切地对祖父说：“子良将军，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的反动分子说你已被软禁在长沙做‘寓公’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黄埔同学、亲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促进他们及早觉醒，早日归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祖父回答：“是，我一定照办。”毛主席又说：“你

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他们，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估计要洗多少？”祖父回答：“我打算洗10打，120张。”毛主席说：“这少了，洗它50打吧，600张！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惟独缺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全面了。”祖父遵照毛主席的嘱咐，在与毛主席的合影上，郑重地签字盖章，一一寄出。

9月25日，祖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我是一个军人，我是黄埔第1期的一个学生，本来是以卫国救民为天职的。二十多年来，参加北伐，参加抗日，打了不少硬仗。不料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他欺骗我们，驱使我到东北与解放军作战，我仍旧也和胜利以前一样，替他出过不少死力。但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渐渐发觉参加这种内战，徒然为蒋介石私人作工具，完全违反人民利益，心理上总是耿耿不安。嗣后和各方面接触较多，了解进步，对于这种内战，更属越加由怀疑而厌恶，由厌恶而苦闷，最后终于觉悟过来。觉得我们国家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军人应该靠

拢人民，不能再作某一个人的工具。只是当时虽有这种心理，而限于环境困难，无法实际行动。适逢今年2月回到长沙，程潜将军主张和平，我便决心在他的领导之下，拥护和平主张、脱离反动政府。这时，我之拥护和平，主要目的还只是因为看见人民痛苦，实在不堪再战，而对中共的真相还不十分明白，甚至还听到许多歪曲宣传，是以令人害怕。但我想只要人民真心获得解放，将来解放之后我个人便遭受中共的严厉惩处，也是甘心情愿的。

……因为后来白崇禧的军队退入湘境，力量相当雄厚，对我监视防范非常严密。我一方面要暗中策动和平运动，一方面又要忍辱负重，虚与周旋，时机未熟，不能轻举妄动。直到8月初战事形势紧张，白军开始南撤，我们才得在长沙起义。那时蒋介石只知道程潜将军主张和平，还不明白我的态度。在起义前几天，他还派员送电报给我，要我“大义灭亲”。因为程潜将军是我进黄埔以前的老校长，意思是叫我杀害程将军，并要我率领部10万死守长沙，不惜全军牺牲，否则便向湘西撤退。并且还要我在撤退之先，把长沙那些主张和平的人士一律处决，以图泄愤。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



/ 陈明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了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的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学生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而打倒他的。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过去我在他（蒋介石）的欺骗之下，替他们打了不少的硬仗，这是我的一种错误，也可说是一种对人民应该担负的罪过。现在我已站在人民方面来了，一切服从人民，在人民政权指挥之下，在贤明的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我相信能发挥我的勇气，贯彻我们来参加革命的初衷。今后，打两广、打川康滇黔、打台湾，我一定更要追随解放军各位前辈之后拼命去打，务使

残余反动势力完全崩溃，战争彻底胜利。同时我愿意完全接受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虚心学习，努力实践，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统率的部队，绝对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来完成我们革命军人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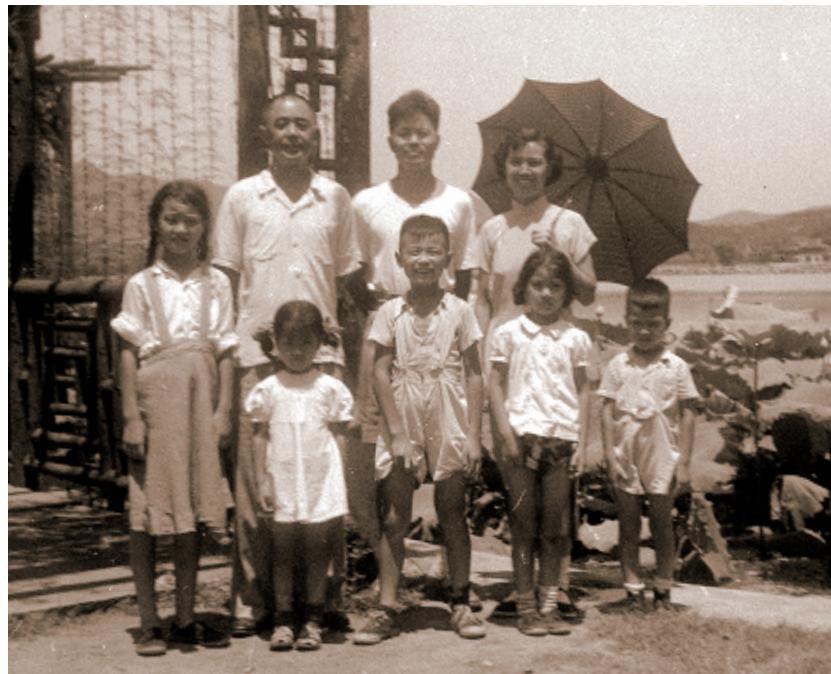
在北京开会期间，祖父受到毛主席两次单独会见。他在《湖南义举》中写道：

毛主席对我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就是好的。你今后怎样打算？”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力量。”

毛主席说：“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决定把你第一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可能还会很多，你要有思想准备。”毛主席又说：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毛主席摇了摇头，有点为难地说：“别人有要求我们还好办，你没要求，我们倒难办了。”然后又说：“你只管放心，有饭，我们应先给起义弟兄吃，有衣，先给起义弟兄穿，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所乐于执行的团结友军政策。”

毛主席的谆谆嘱咐，使我终生难忘。



/ 陈明仁和家属在杭州西湖留影（右一为作者）。

看望黄埔同学

10月12日，祖父到济南探视被解放军俘虏后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的黄埔军校同学，他们是王耀武、杜聿明、庞镜塘、陈金诚、郭一予、周开成、李汉萍、黄铁民等。祖父在《湖南义举》中写道：

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西南、西北前方战斗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我遵照毛主席的嘱咐，离开北京去济南作被俘的蒋军官兵的工作。离京前毛主席对我说：“反动派造谣说，杜聿明、王耀武已经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共产党是严格执行宽待

俘虏政策的，从不杀也从不虐待战俘。杜、王他们正在济南改造，生活得很好。你去亲眼看一下，并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故旧，策动他们及早觉醒，莫再顽固到底。”

10月11日，我同李明灏等抵济南。次日上午，我们在山东省交际处客厅会见了王耀武、杜聿明。他们被俘后都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王耀武衣履整洁，对客人侃侃而谈：“我正在努力学习，对过去受蒋介石的骗而犯的罪恶有了初步的认识，决心要以今天的王耀武控诉昨天的蒋介石，好好改造自己。咱们过去

那一套也确实不行。”杜聿明则垂头不语，似乎百感交集。我首先问他家里情况如何？他说：“家人住在上海，听说还好，没有联系。”我安慰了他一番，答应有机会到上海时一定去他家看看，要他好好悔悟，争取宽大处理，谈毕，还拍了合影，并与杜、王同席午宴。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到济南城外白滩头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参加欢迎大会。教导团共500多人，分4个队，都是淮海战役中的战俘，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牟中珩、郭一予等高级将领在内。在欢迎大会上谈了我起义的经过和思想转变的过程，以及见到毛主席所得到的收获，希望大家好好改造。

爱乡更爱国

1957年7月，祖父在《解放军画报》发表《爱国一家》文章，他写道：

我从1949年起义以来已经7年多了。7年多来，我目睹着祖国奔腾的脚步，亲聆着各项建设的捷音。当我想到祖国7年多的成就，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我展望着祖国的未来发展，眼前又呈现出一个壮阔的境界。

当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祖国正处在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的年代，

我曾有过“富国强兵”的心愿；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时候，我曾梦想为祖国立功勋，也曾梦想为人民做点事。1949年2月，我以华中军政副长官及第1兵团司令官之职由汉口移驻湖南，愈来愈壮大的湖南人民和平自救运动，使我清楚地看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那样形势下，我不能不为湖南三千多万父老着想，不能不为我所率领的十多万官兵着想。我终于站到人民的行列，走上幸福的革命的道路。

起义以后，共产党对起义将领和起义军队一视同仁。我一直在海边防部队里当指挥员，前年被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工作上既紧张又愉快。7年多来，全家生活极为舒适。我家共有14口人，我的妻子在驻地附近一个规模很大的医院里当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在同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和二儿媳妇同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全家的收入每月达1000余元，生活上的优裕可想而知了。我有8个小孙子，顶大的11岁，顶小的3岁，5个读小学，3个在幼稚园，有4个达到入队年龄成了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常想：我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我的子孙们的将来不知比我还要强多少倍！

我有很多旧时袍泽，身在台

湾不能欢聚一堂。这使我联想到周总理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周总理在发言中欢迎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或者来大陆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政府还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周总理代表政府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代表前来商谈，还提出了“爱国一家”的原则，要求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言语是那么诚恳，道理是那么透彻，我看不出台湾当局有什么理由来关闭商谈之门。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解放台湾除了用战争方式外，也完全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中国人民都将不咎既往。假如台湾军政人员对祖国的号召有怀疑、有顾虑的话，那么请看看我这个例子。1947年在四平街跟共产党恶战的是我，论罪，我的罪过大了吧，可是共产党对我怎样了呢。现在祖国已经向台湾军政人员敞开了宽大的大门，大陆的亲友故旧盼望和你们早日团聚；而我和你们过去是曾经同生共死、共过患难的朋友，更盼望你们幡然来归。让我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实现祖

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1972年8月，祖父被查出患前列腺癌，由湖南军区送至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旋又由周恩来批示转送至北京三〇一医院治疗。在北京期间，他的黄埔军校在京同学郑洞国、侯镜如、覃异之、宋希濂、杜聿明结伴到病房探望病情，大家相谈甚欢。

1974年5月21日，祖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去世，享年71岁。5月25日，祖父遗体告别式和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上花圈。郑洞国、侯镜如、覃异之、宋希濂、杜聿明也参加了追悼会。

后人追思

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我的伯伯陈扬钊时任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他在参观母校时赋诗一首，怀念诸前辈：

一九八四年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参观母校

怀台湾黄杰、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戴坚诸父执（即世伯，对父辈朋友的尊称。）

创业艰难百战师，肃躬瞻仰愧来迟。

丰碑依旧追前烈，堂构维新忆始基。

少日趋庭聆侃论，卅年隔海望旌麾。

江南草长催归棹，岂阻盈盈一带衣。

1991年4月3日，伯伯接待了回到祖国大陆探访的邓文仪先生，他写道：

1991年4月我夫妇以世侄关系，热情接待与父黄埔军校1期同期毕业、同乡、同事，亲如手足的台湾中华黄埔同心会访问团名誉会长邓文仪，他曾经两次受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亲切会见，这次南下广东参观。我们虽然相隔几十年未见面，但他一眼就认得我们，说好不容易啊。叙谈往事中，他很关心问及我的双亲，因为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本很稔熟。他很惋惜我双亲去世太早，说我母亲是位好大嫂。谈起我父亲当年在湖南起义，他说：“也只有子良（我父亲别号）大智、大勇、大义，才能这样做。你父亲说，我们是同学、同乡、好朋友，但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所以你父亲未扣留我和黄杰，反而送走我们。”使他感慨不已。邓非

常恳切地说：“你们的双亲真是太好了，子良为人一身正气、敦厚豪爽，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善良和蔼。你们要好好工作，将后代带好，为社会多做好事。”

4月4日，伯伯等人陪同邓文仪等瞻仰东江阵亡烈士墓。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我们作为黄埔军人的后辈，既感到光荣，更感到使命重大。我们将努力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世世代代继承发扬“黄埔精神”，不辜负祖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本文资料得到胡博先生的大力支持）

参考资料：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编《湖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 陈明仁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陈明仁日记》。
3.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1936年出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

回忆炮兵生涯

□ 口述: 潘章雄 采访: 孙晓明、黄炜炜、魏钟曼 整理: 黄滢

潘章雄,生于1917年,广东揭阳人。1935年报考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第4期,1936年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13期,七七事变后转到郁南学习,1938年毕业后参加长沙会战等。

离家去读军校

我1917年出生在揭阳榕城中山路暗桥池的一间小屋,家里姐姐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家庭生活算得上中等。父亲是做小生意的,做的是挨砻米(潮汕方言,指的是对稻谷进行加工和销售的传统农业活动),雇伙计帮别人挨砻。他还帮别人倒粗尿(即上门收集、处理粪便),倒粗尿是非常下等的,他雇了伙计去各家各户收别人的粗尿。父亲虽然不是一个多有知识的人,但他也有点地位——他在商会做执委,别人如有家庭纠纷,都会请父亲去做公亲(当调解人)帮忙解决。事情如果能处理好,别人会表示感激,中秋时会送鸭肉脯、月饼等礼品。



/ 潘章雄接受采访。

我在揭阳一中读了三年初中后就去潮州的金山中学,也就是广东省立四中,在那里读了一年高中。曾和我同在揭阳一中24班的同班同学陈名标,后来入读陆军大学第20期,和台湾的郝柏村成为同期同班同学。他俩比我早一年读军校,经常给我介绍军校的情况。当时,抗日的氛围已非常浓烈。日本侵略东北三省,这直接让我们产生要去抗日的想法。受他们影响,加之我思想上产生的大波动,我决定不读书了,要考军

校,要去抗日。于是,我便离开了高中学校去读军校。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在广州燕塘,要去读这个军校,得先通过揭阳的挑选。全省3000多人考试,只录取300多人。在揭阳,要选5个人去广州,去广州后再继续考。我在揭阳教育局考试,当时有十几个人去考,最后我成为被选中的5人之一。那时没有直达广州的公路,得先去汕头搭船到香港,再在香港坐广九线火车去广州。揭阳选中的5人中,最后只取我一人,

另外4人没被录取，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已不记得考试内容，大概是普通学校考试的程度，要考国文、历史、化学、物理、普通常识。体格检查不是很严格，没病没痛的年轻人都能通过。到了广州后还要再体检一次，这次体检比较严格。考官要看外貌外观和身体情况，太高大或是太矮小，身体不对称的都不一定要。在3000多人中进行淘汰，只剩下800多人。然后再由当时广东的“统治者”陈济棠亲自把关。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是陈济棠创办的，并由他管理。他拿了张椅子坐着，大家排着队，考生跑步到他面前鞠躬，合格他就打勾。最后勾了300多人，出榜后我发现有我的名字，也就是被他勾选了。

我在入伍生阶段是步兵，入学一段时间后分科，我选了炮科。炮科涉及测量学，所以挑选的都是在这方面有基础的学员。分科后，课程相对少了一点，每天出操使用的武器由步枪改为大炮。炮兵和步兵不同，步兵拿枪瞄准就好了，而炮兵要学打炮，涉及的知识更多一点。炮兵要知道炮手是如何操作的、火线是怎么拉的，要了解炸药包爆炸后推动炮弹发射

的原理和动作要领，日后还要指导士兵。

我读军校是免费的，包括伙食等全都不用自己出钱。服装鞋袜、牙膏牙刷都是公家给的，每个月放假还会发几元钱给我们出去用。以前的钱面额大，也够让我们吃上一顿好的，再去游玩一番。星期天，我们拿着钱去广州市区游玩，白天从燕塘徒步到广州市区，晚上有校车接我们回校。

编为黄埔学生

当时，陈济棠管理的是地方性的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有矛盾。陈济棠部队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投靠了蒋介石，当时陈济棠部队的60架飞机也全部飞往蒋介石那里去了（此处指“两广事变”）。1936年的一天早上，我们出操时眼看着60架飞机飞去。陈济棠自知没能力跟中央对抗，就自动下台了，而余汉谋的地位自然提高了。此时，中央来接收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接收后把我们编为黄埔军校的学生。我们的军校改称为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我被编在第13期。四分校后来迁去了贵州独山，第14期后的学生就不在广东了。第13期学生进黄埔军校后，不能马上成

为炮科的学员，而要经过一年入伍生训练后才分科。选炮科生还需要上级政府同意，因为炮兵的地位较步兵高。我被编在炮科，1938年从炮科毕业。

军校的生活是相当苦的，要献身给国家，就不能怕吃苦。军校里没有个人自由，日程安排都是固定的，我们按照时间表来生活。一切都要听从命令，到了时间就吃饭、上课、操作，没有停下的一天。每天都是忙碌的，天一亮，号令一响，就得赶快起床，不能懈怠。军队生活要得体，被子要叠得四四方方，起床后不能偷懒，非常紧张，叠完被子要赶快去集中。

在学习方面，主要学的是军事方面的知识，英语、物理、化学等普通学校的科目变成次要的、补充的。有关地形、测量、建筑、战术的知识，还有筑战壕的知识，都对我们非常重要。要学会判断部队占领哪个地方，地形如何，敌军有多少部队，要如何运用战术和如何指挥，这些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我们每天都要出操，入伍生都是步兵，出操时要操作枪。分科后我成为炮兵，作为炮手要学习如何操作炮。平时训练一般没有实弹射击，每隔一段时间才给我们实弹训练，具体

多久进行一次我记不清了。步科经常练习步枪射击，但是炮科没法整天练习射击。炮有山炮、野炮、榴弹炮等很多种类，中国当时没多少好炮，我们没什么别的炮可学可用。训练用的山炮是沪造山炮，口径较小，比较落后。另外还有野炮训练，野炮形状各异，必须要懂得如何操作。我们操练用的是中国汉阳兵工厂铸造的克虏伯野炮，质量不好，有一次在射击时爆炸，所幸没人受伤。炮手要把这门炮当作好炮来操作，而不是要求这门炮有多好。对于我们而言，有一门炮可以用来练操作，已经是很好的了。上午出一次操，下午上一两门课，除此之外，就是生活了。中午吃饭后，有一点空余时间，但也做不了太多私人事情。晚上自习，有时也会集队、讲话、开会。

因为出操要穿草鞋，所以我们平时整天都穿草鞋。星期天出去才会穿力士鞋（一种白帆布面、橡胶底的运动鞋）之类的鞋子。草鞋是用麻做的，一双可以穿很久，穿坏了公家又发新的。天气冷也要穿草鞋，再多穿一双布袜，布袜是裁订的，不是买现成的。还得打绑腿，就像缠脚一样从下到上一直缠

到膝盖。我们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澡，即使天气很冷，还是得洗冷水澡。

吃的方面，政府规定了每人每天多少钱，伙食还算可以，但谈不上享受。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跟老百姓相比，我们好太多了，还能吃饱饭。吃饭的时候，进去后就坐着等，队长喊“开动”后才能端起饭碗吃饭，不允许自己拿起碗来自由地吃。队长喊“集合”，无论吃完与否，都得放下碗筷，没有时间慢慢嚼。

冒着炮火撤退

七七事变后，日军飞机有时会来骚扰，甚至还来轰炸。军校是日军飞机袭击的目标，我们在军校的训练就不那么平静了，每天出操上课都得跑到外边去，跑到农村的树下。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安心学习了。为了防止被袭击，我们那期军校学生转移到了粤西一带，步科在德庆，炮科在郁南。我们在郁南训练了一年，学习炮科相关知识技能，直到毕业。

1938年，由于抗日需要，我们第13期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原本4年的学业，我们只读了3年。我清楚记得，毕业时军校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把中正

剑，可惜后来这把剑在武汉会战中遗失了。国民政府给我们这一期学生发了同学录，还发了几十块钱的服装费。整顿完后，我便奔赴抗日战场。

我毕业时恰逢武汉会战，于是直接去前线报到。报到的地方在鄂东的黄梅和广济，是保护武汉的外围据点。我到达后被安排在炮兵第2旅18团3营的一个连。我刚进去时担任见习官，士兵叫我排长。见习官就是“随从”，连长有任务分配给我，我就去执行，炮兵有任务时，我就跟随他们行动。

两三个月后，情况有了变化，汉口准备撤退，需要转移阵地。我们的部队也要跟着撤离，要经过汉口后再往西走，这时情况就变得混乱了。我们的炮是苏联的野战炮，非常笨重，体积很大，炮前还有弹药车，移动时要靠6匹马来拉动，所以我们只能走大马路和公路，不能走小路。因为炮兵的大炮主要向远距离射击，无法近距离抗敌，所以炮兵需由步兵掩护，步、炮兵协同撤退。撤退时若步、炮兵协同好则没有问题，如果协同出现问题，炮兵失去掩护，那么行动将十分困难。偏偏那时步兵提前撤退，导致我们失去掩护。敌人的炮

火猛烈攻击，公路上一直在轰炸，机枪一直在扫射，我们根本没法行动。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只能丢掉大炮，赶紧撤退。

撤退时相当辛苦，冒着敌人的射击和轰炸，有时只能匍匐前进。天下起雨来，就冒雨前行。晚上也在走路，朝着远离战场的方向行进。每过一处都艰难万分，我们连一共有二百多人，撤退时根本没法保持整齐和秩序，只能各自顾好自己的性命。连队里有的人牺牲了，有的走散了，最后只剩下十多个人。敌人还在不停轰炸，而我们渐渐远离了战场。当时散兵很多，不止我们这个部队。脱离战场后没有敌情顾虑了，感觉轻松一些。我们在路上没有粮食吃，每到一处都得找当地的保长给我们安排吃住。

不知经过多少天，我们到达湖南，收到指令要到祁阳集中。这一路上有两个插曲。一个是我们冒雨撤退到安定一点的地方时，就要找地方落脚休息，因为无法带行李，衣服也淋湿了，只能找老百姓借衣服，本来穿着军装，全换成了老百姓的衣服，走了一段又穿上军装。另一个插曲是经过常德时看到群众逃亡的惨状，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老百姓说刚刚飞机来轰炸，还指给我们看墙上的弹痕，可以看出扫射极为疯狂。常德凄惨万分，老百姓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东逃西藏。夜里没有灯火，黑漆漆的，远处有一些烛光，远远听到有受伤的人在哭，还有为死去亲人做后事的，家人朋友也在哭，十分悲惨。到了祁阳后，我们原地整理，重新领炮训练。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炮，我们领到的是迫击炮，迫击炮是步兵炮，而我们炮兵部队只能领迫击炮当作炮兵的炮来暂时使用。在祁阳住了一段时间，训练了几个月。

回忆炮兵生涯

抗战的这些年，除了驻军训练就是在行军或是在战场。驻军时，就是要训练；行军时，往往非常艰苦；在战场，即便不打仗，也要做好长期的戒备，一有情况立即出动。

部队经常调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还记得最长的一次行军。在祁阳训练几个月后，我被调到广西柳州。此时接到命令，部队番号变为炮兵第4旅第18团。后来从柳州调往浙江，行军途中经过好几个省，先是经过湖南衡阳，再到江西、江苏、安徽，最后抵达浙江。每

天都在行军，偶尔停一下让我们休息，非常辛苦。每天行军都有目的地，根据整个部队的计划和上头的指令走。一夜换一个地方，在各地转了大半年。

到浙江后，有敌对的情况就在那里驻军。驻军不一定有危险，比较安闲，平时训练，有情况就去应对。到浙江后，在金和、诸暨、绍兴一带与敌人进行过小型战斗，没有大型战役。在浙江前线打仗时，一般步兵在前头，炮兵听指挥，步兵占领阵地，炮兵向敌人射击。

在部队里，我从一开始的见习官，升为观测员，再升为中尉连副。后来从浙江调到湖北，我当了连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在湖南、湖北等地调来调去。

炮兵连的机枪班有一挺机枪和若干支步枪，没多少战斗力，可以说只能自卫。迫击炮暂时当炮用，射程短，约有一两千公尺（“米”的旧称），使用时经常只达1000多公尺的距离，有时可能只有几百公尺。迫击炮弹不大，轻轻的。野战炮射程比较远，但威力不怎么大。野战炮炮弹比较重，需要两人来扛。武汉会战时用的是苏联野战炮，10.5公分（“厘米”的旧称）口径，有苏联顾问指导我们，

告诉我们炮的性能和操作方法。后来我曾调到炮一旅，那里的炮口径很大，有 15 公分，射程也更远，更为机械化。一般的炮要用骡马来运载，迫击炮也需要骡马，一门炮可以拆为两三个部分再用马来载。

炮兵和步兵学习的知识不同，步兵要学习如何拿枪瞄准，炮兵要学习打炮的知识。在炮兵连里，一个连只有 4 门炮，一个班长负责指挥一门炮，一门炮由十多人操作，连长带一个观测班。作战时，占领山头后，一般会把炮阵地设在山后，这样会安全一点。观测班要先到地势稍高的地方侦查地形、侦察敌情，确定目标后，连长指挥观测员进行测算，观测员根据地图或者自己画的图，测算敌人的位置、距离、方向、地形高低等。连长带着观测班测定这些数据后，传回炮阵地。炮阵地由副连长负责，副连长将传来的数据告知炮兵第一炮手，并决定如何开炮。第一炮手是观测手，他调试好观测器材，根据指令确定距离、方向、高低，按照标尺装好炮弹后瞄准。炮兵不仅可以向前瞄准，还可以向后或者向别的方向瞄准。确定一个明显的标定点并瞄准后，再设定好距离打向目

标。炮在山后时，不能瞄准敌人，而是瞄准敌人后面的一个标定点。

婚后离家抗战

大概在 1942 年，我在轻迫击炮团当副营长。一个新来的团长由于和我的营长不和，要将营长换掉。我和营长关系不错，所以新团长不太喜欢我，他想要用他自己的人。营长被团长扣押，情况对我十分不利。趁这个机会我提出请假回家结婚，团长批准了。这门亲事是我在三四岁时由父母定下的，家人一直等着我回家结婚。营长曾做过 20 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的卫兵，和总司令有私人关系。所以当我要回家时，营长写了一封信，让我去见总司令并把信拿给他。我专门跑到桂林去找总司令，把信交给他后，他问我回答什么，尽量把情况都告诉他，说完就走了。

婚后两三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小家庭了。家里没什么事做，我不想做闲人。“相见时难别亦难”，离开时两个人哭了一整天。但我们谈好了，我考虑的不是个人利益，我是军人，应该坚持我的职守，不敢偷懒，也不敢放弃。所以我离开了我的家庭，一别就是 6 年。为我

的国家作出我的贡献，人生才显得有分量。

离家后有人介绍我到炮兵第 1 旅，这是个机械化部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炮兵旅。部队驻扎在湖南祁阳，我在炮兵第 1 旅当参谋、观测员后，在 14 团当通讯连连长。团里的几个营分散在重庆、长沙、广西等几个地方，哪里有需要就分一个营过去，分出去的营受步兵管理和使用，团长相当于空壳指挥。我的通讯连有 4 个排，其中 3 个排分别被安排在重庆、长沙、广西，通讯连相当于一个空壳连，我这个连长只带一个排。

不久后，炮一旅的一个参谋主任张可发被调去突击总队山炮团做团长，他叫我去帮忙，所以我就办了手续跟着他去了。突击总队驻在福建，到达之后，原本山炮团要领英国炮，但没想到竟然领不到，这样一来就没武器了。突击总队的任务改为接送新兵，即去某处接新兵，再送到另一处。后来，日本投降了，我们就去浙江接收日本炮来武装部队。山炮团有炮来补充就又可以训练了。这就是我对炮兵生涯的回忆。

（本文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供稿）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从南口抗战到忻口会战的黄埔军人

□ 傅克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回声依然在耳边回想，那场战争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今天，我们书写这段历史，不仅是歌颂胜利，更重要的是要记住那些在硝烟中浴血战斗的身影和为这片土地献出生命的人们。我的父亲黄埔 1 期生傅正模将军，从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始直至抗战胜利，身经百战，几番出生入死。在将军抗战的历程中，南口、忻口之战是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黄埔同学共赴国难，并肩作战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次，也是前期黄埔同学前赴后继，血染沙场极为惨烈连续作战的两场战役，在此特予铭记。

1937 年 7 月 7 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今丰台）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 29 军严

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 29 军奋起反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由此在中国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防平津地区的中国驻军在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仍然试图与日军通过谈判的方式平息战火，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在 7 月 28 日化为泡影。就在这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平津地区发起全面进攻，守军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等大量爱国官兵力战身死。在此情况下，中国军队开始调集开赴河北、察哈尔（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县，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部和乌兰察布市东境）两省参战。

1937 年 7 月，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开办训练团，但把军官团改为了暑期团。第 1 期庐山暑期训练团规模大，因抗战需要，训练团尤其主张军事训练。受训的军长有 19 人，师级军官

（师长、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有 194 人，其中黄埔军校前期毕业生占据多数。身为第 83 师师长的刘戡（黄埔 1 期）、副师长傅正模也位列其中。

7 月 1 日，训练团举行开学典礼。学习期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消息就传遍了牯岭的每一个角落。曾参加过 1933 年长城抗战的 83 师师长刘戡向大家介绍日军的作战特点与装备，学员们同仇敌忾。誓要保卫我河山。傅正模参加过 1932 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他自忖：自己所在的第 83 师，自北伐以来，各次重要战役几乎无役不从，此次必会赋予重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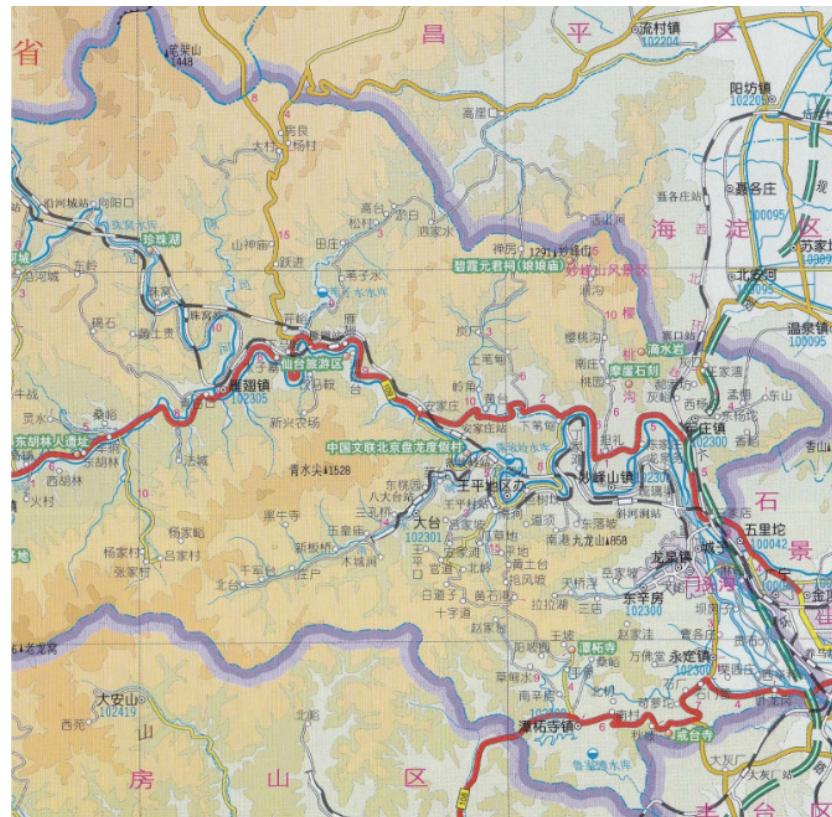
果然，在 7 月 12 日的总理纪念周上，第 10 师（师长李默庵，黄埔 1 期）和第 83 师北上奉命抗日，即刻行动。同时奉命下山率队抗日的还有第 27 师师长冯安邦。傅正模作为第 83 师副师长理所当然地也成为参战将领之一。对一个军人来

说，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呢。

此时，驻防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第29军节节败退，日军一方面继续南下直攻保定，另一方面调兵西进，其目标直指山西太原，华北战事不断扩大。

为了阻挡日军向山西进军的步伐，在北平城西北昌平南口驻守的第13军成为防御的中坚力量。从8月8日开始，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对南口接连猛攻十日，皆没有取得突破。第13军虽然暂时挡住了日军，但自身伤亡也十分惨重。第14军军长卫立煌接令迅速率部驰援南口。

南口，位于北平城西北45公里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会处，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这一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关隘重叠。从南口经居庸关西行至宣化、张家口，为一东西狭长之盆地，南北多山，中部下凹，平绥（北平至包头）铁路横贯其中，并有公路相辅，形成连通西北、华北及东北的交通干线。南口的南北两侧，有筑在高山脊背的内外长城，山上仅有羊肠小道穿行，故南口是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之地，人称“绥察之前门”，



/ 门头沟以西第83师作战区域。

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守住了南口，即可阻止日军占领察哈尔省进而分兵晋、绥（绥远省简称，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的海勃湾区和海南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大部）之图谋，从而保卫察、晋、绥三省。

第14军下辖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师长陈铁，黄埔1期）。在这3个师中，第10师和第83师都位于当时最为精锐的30个调整师之列。第

85师虽然是来自贵州的地方部队，但此时也已接受了中央军的全面改编。

卫立煌于19日上午召开军事会议，傅正模随师长刘戡一同赴会。在会上，卫立煌认为，南口局势不断恶化，第14军如果增援，沿途又会遭到日军第5师团的阻击，很难及时抵达目的地并完成任务。鉴于此，卫立煌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利用日军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猛攻南口，第6师团、第14师团集中精力在北平

城南房山的固安、良乡抵御友军第1军团等部的“猛攻”（实为佯攻）时，以主力继续驰援南口，一部突袭北平，如果此计成功，日军势必全力回援，南口之危自然解除，如果不成功，也必将搅乱日军部署，减轻南口守军压力，为更多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据此，卫立煌命李默庵率领第10师作为第一梯队，经九龙、奴才岭沿里长城内侧向河北省怀来县东南的镇边城镇推进，驰援南口友军；命刘戡率第83师主力为第二梯队，经大安山、西山大岭、千军台直攻门头沟，从日军第5师团和第14师团的空隙中向北平推进；命陈铁率领85师和第83师第247旅为第三梯队，推进至大安山后兵分两路视战况机动使用。

刘戡和傅正模受领任务后立即返回师部，经过两人与参谋长吴伯华商讨后决定，刘戡率领第249旅（旅长陈武、黄埔1期）偷袭门头沟，傅正模则指挥第247旅（旅长凌光亚、黄埔1期）随第85师行动。

第83师249旅在山区艰难行军，于8月24日成功越过险隘峪儿鞍，迅速占领了门头沟以西约20公里的千军台，成功打开了通往门头沟的道路，其

先头部队两个连则继续向东突进到庄户地区。这支部队正好插在了日军第5师团和第14师团的间隙，如继续向前就会威胁北平。可惜的是，由于汉奸告密，日军侦察机发现了这支部队，使得日军得以调整部署，派兵阻击。

第14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感到紧张万分。他对中国军队增援南口并不意外，但却没有料到竟然有中国军队敢突袭北平。一旦北平有失，将沉重打击日军士气，整个华北战局也将发生变化。

为保北平不失，香月清司急命第6师团所属第36旅团进攻千军台。

25日，第83师所属第249旅在千军台与日军第36旅团展开激战，旅长陈武亲赴一线督战，成功伏击日军先头部队，迫使日军暂时东撤退守王平口，并占据西山大岭上的制高点——清水尖，采取守势。陈武见状，一面向师长刘戡发电请求进一步指示，一面命令所属两个团抢占清水尖左右两翼的桃玉山和髻髻山（也叫髽鬏山），形成对峙态势。

刘戡接电，认为情况紧急，随即电告卫立煌，并请求将第

247旅归还建制，以便挡住日军进攻。卫立煌认为扰敌目的已经达到，南口方向的压力也稍有减轻，因此命令第83师放弃突袭北平的任务，命该师主力在桃玉山和髻髻山固守，同意第247旅立即归建，并命第85师所属第255旅亦迅速增援千军台，继续在此地牵制日军。命令传到傅正模处，他当即命令旅长凌光亚挥师急进，向千军台方向靠拢。

8月29日夜，傅正模率领第247旅抵达千军台，并与师长刘戡会合。经过刘戡介绍，傅正模得知第249旅已经与日军激战两昼夜，伤亡1000余人，该旅所属第498团团长曾宪邦（黄埔4期）也力战身亡，眼下该团残部由代团长谢政指挥，仍顽强地在桃玉山坚持。

为了有效抵御日军的进攻，经刘戡、傅正模和第85师第255旅旅长郝家骏商讨，决定各部由刘戡统一指挥，并经请示卫立煌获得批准后调整部署，由刘戡指挥第83师主力集中固守位于雁翅镇的青白口至付家台永定河河南山地，由傅正模临时指挥第247旅第493团和第85师第255旅两部，接替桃玉山、髻髻山、庄户、千军台一线的守备任务。

8月30日上午，日军第36旅团以两个步兵大队的兵力猛攻桃玉山和庄户，受到守军第255旅的顽强抵御。入夜后，日军又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偷袭鬃髻山，被第493团挫败。

9月1日凌晨，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但战至2日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在这接连的激战中，傅正模始终坚持在一线督战，其间有流弹擦伤腿部，经包扎仍然轻伤不下火线，直到第85师师长陈铁率领该师主力抵达千军台接替防守任务后才返回第83师师部向刘戡报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傅正模继续协助刘戡在青白口至付家台一线指挥部队阻击日军。

第14军抽调一部突袭北平的策略，成功调动了日军大量部队，破坏了日军原本的计划。但当南口守军突围之后，孤军深入的第14军反而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中，一旦指挥不力，很可能被日军围歼。在此危险情况下，卫立煌并没有选择撤离战场，他毅然决定继续坚守阵地，以一军之力继续迟滞日军对山西和河北的进军速度，打乱日军计划。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14军以3个师的兵力力敌日军第5师

团和第6师团第36旅团及后续敌人的轮番进攻。第14军损失巨大，第83师经过累日的激战，伤亡惨重，但全体将士英勇奋战，顽强阻击敌军直至接到撤退命令的最后一刻。

南口之战，历时19日，中国方面投入兵力6万余人，日军动用兵力约7万人，中国军队伤亡近3万人，日军伤亡约1万人。最后，中国军队在日军优势兵力及现代化装备的打击下，不得不战略撤离。但南口战役严重地挫伤了日寇，打乱了日寇的作战计划，使“三月亡华”的神话破灭。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称颂。同时，南口战役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日军攻陷平津后，分兵沿津浦、平汉、同蒲三条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整个华北地区，其中又把沿同蒲路南下，夺取山西作为战略重点。1937年9月，日本派遣最精锐的第5师团以及铃木兵团从察哈尔进入绥远开始向南推进，分路向晋北进攻，12日攻陷大同。并以主力由蔚县直趋广灵，矛头指向平型关。阎锡山急令所部在平型

关布防，同时，八路军由陕西来援，于9月19日抵达平型关右侧的上寨地区。

9月23日，敌向平型关发起攻击。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9月28日，大同之敌南下，突破茹越口，截断平型关后路，平型关守军被迫后撤。接着敌突破宁武关、雁门关以及整个内长城一线，于30日占领代县。中国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为挽回危机，着眼于山西要地之确保，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10月2日，命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4个师又一个旅，经正太路运往太原，增援晋北。

作为晋北通往太原的交通要道，忻口是日军从北进犯的必经之路。这里有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3公里的山岭，适宜防守，可以防止日军包抄。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阎锡山、卫立煌自然不会错过这么有利的地形，立刻命令各部向忻口附近集结。

10月1日，日本统帅部以临参命第112号，命令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在山西北部作战占领太原。10月7日，日军攻占崞县城（今崞阳镇），12日攻占原平镇（今原平市市区）后，前锋到达忻口。10月13日

晨，日军开始发起全线大规模进攻，忻口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刚经过惨烈的南口战役，傅正模所在的83师减员严重，装备损失巨大，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还未缓过气来，又接到开拔的命令。第83师原驻石家庄以北正定，接驰援忻口命令后，于第10师之后，由正太路车运太原，于10月12日晚全部抵达忻县西北地区集结。

第二战区在忻口一带，以重兵分成左、中、右三路，依托山地列阵进行防御，大致沿忻口东北之上社村、营房里、南郭下、板市、下王庄、南怀化、秦家庄、大白水、盟腾（今朦腾）、南峪的东西一线，构成山区防御地带。其中第9军第54师在炮兵第23团、第26团1营的支援下负责防守中央地区，左翼由第14军的第10师、第83师以及第85师、炮兵第27团、战防炮营一部把守，右翼由第15军第64、第65师防守。

根据前敌指挥部13日中午下达的命令，14军以第10师固守秦家庄、大白水一线，并推进警戒阵地于兰村、阎庄一线；第83师到刘庄附近集结，尔后向卫村、卫家庄、南庄头方面之敌攻击，进出永兴村、北大

常一线。

第83师是12日晚赶至忻县西北南高村一带集结的。13日，鉴于大白水第10师与敌激战，第83师第249旅第497梅展翼（黄埔4期）团增援大白水。第249旅第498谢政（黄埔3期）团、第247旅第494李奇亨（黄埔4期）团附炮兵营则于盟腾村东侧南北高地一线展开，向卫村之敌攻击前进。敌以炽盛火力还击，战斗十分激烈，尤以第498团髻髻山阵地为最。

15日拂晓，敌以轰炸机20余架向第498团阵地往复轰炸，投弹数百枚。其后，敌复以轻重炮数十门掩护步兵团一联队向第498团发起攻击，发炮2000余发，阵地工事全成灰土。敌数次攻入阵地，均被第498团官兵肉搏击退。3位营长相继负伤，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至午后1时许，阵地陷落敌手。

又经3日苦战，第83师第494、498团相继克复卫村、卫家庄，并以第493李纪云（黄埔3期）团一部配属第497团增援大白水村作战。鉴于部队伤亡颇重，疲劳已甚，无法对敌实施攻击，遂坚守阵地与敌成对峙状态。后至20日，鉴于大

白水、卫家庄正面之敌无意发动强攻，第83师后撤至杨湖村附近地区休整，构筑第二线工事。

日军因屡遭重创，实力顿挫。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则由平浦线及天津附近调来两个师团左右的兵力。自10月24日起，集中力量向盟腾村附近中国军队前线阵地展开强烈攻击，以图将中国军队包围于大白水附近。

25日凌晨2时许，日军利用前日接近中国军队阵地之少数据点增加兵力，继续向第71师第214旅阵地猛扑，该旅拼死血战，情势危急，刘戡令梅展翼的第497团火速增援。下午1时许，日军集中飞机、大炮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轰击。阵地被轰平，守军士兵多被尘土迷目，敌步兵则在浓烟灰尘中迫近，敌众我寡，但第497团官兵毫无畏惧，多次奋起与冲入阵地之敌肉搏，终于守住阵地。

鉴于日军连续两日攻击第71师阵地，该师受创较重，盟腾村一线阵地出现危机。军部于10月25日下午下达作战命令：以第83师一部占领大白水（不含）至盟腾村（含）一线。主力控制于刘庄、杨庄、井沟、杨胡村

一带地区，策应右翼第10师、左翼第71师之作战，将侵入盟腾村前方前进阵地之日军一举围歼。

根据此命令，第83师师长刘戡令傅正模率第493、494、498三个团及一个炮兵营接替第202旅阵地，加紧构筑工事。是日夜，第83师、第71师分派小部队向当面之敌实施夜袭。

26日黎明，日军混成第15旅团步兵第30联队又集中炮火、兵力分别向第83师左翼及第71师阵地正面实施猛攻，阵地因受敌重火力轰击，多被炸毁。其后，敌以战车掩护步兵实施强攻。第83师阵地一部一度被突破，但该师奋起反击，以血肉之躯英勇抵抗，又将阵地夺了回来，敌我损伤均严重。

27日，自拂晓起，日军增援部队第11师团第71联队又集中火力、兵力向第83师左翼阵地及第71师右翼猛攻，企图完全占领盟腾村西北高地，上午，第83师击退敌多次进攻，伤亡较重。午后，敌以步、炮、飞机又施联合进攻，将该师阵地一部突破。傅正模此时正在火线，亲自指挥第83师反攻冲锋十余次，毙敌五六百人，卒将丢失阵地收复。但第83师伤亡亦重，第494团和第497团

左翼盟腾村猛攻。经我昼夜肉博，战至未刻，将敌约二千人完全歼灭。我全副连日牺牲，全师不足二千。本日敌在南寨村下王庄增野砲三门，向我猛攻，激战终日，迄晚七时，我南郭下南方高地被敌突破，三里黄家岭、高高山头，仍在我手，正左右夹擊中。

2. 普東方面，自九日晚起，敵向我全佈砲攻，夜以继日，我师傷亡奇大，世師在平定西方高地，擋守平定城，民遠晚六時，各部隊右自下莊亘劉家庄台西村等魚干畢坪等地，左迄三鄉之線，佔領陣地，全線戒心，凹入形勢，敵人跟進，仍激戰中，又廿九日在黃莊南激戰，我十二師、世師、大主才已皆立，正上不捨營。

3. 晉北敵軍，除第二第3第5師團外，即漢外，新漢現第十一第十九兩師團，第七十三聯隊及第十五等。

4. 由原平逃回難民報稱，大泉之後，敵寺田師團長被我擊斃，追日獲還我夜襲，損失甚大，故對逼入敵方人民，殘殺洩憤，又崞縣現石敵傷兵五六千，傷亡至少七八百名。

/ 第二战区忻口会战战报。

干部多数牺牲，有的营排附已升任营长。

28日，据侦察敌势已衰，无强攻迹象。第83师、第71师分别派出小部队向敌出击，往返扰敌。

30日，自拂晓起，敌又以重兵、重火力向第83师及第71师阵地实施猛攻。第83师奋起还击，但因连日激战，伤亡甚重，再度出现险情。恰值前指命第94师朱怀冰部赶来增援，遂退敌。

31日、11月1日两天，盟腾村左右阵地仍遭敌不断攻击，中国守军英勇退敌，阵地坚守如初。至11月2日，中国左翼地区作战部队因东线娘子关失

守，奉前指命令全线撤兵，忻口会战就此结束。

忻口会战是十分惨烈的，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亦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尽管忻口战线中国守军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但是娘子关一线准备不足，在石家庄丢失后，日军从娘子关一线突破山西防线，而忻口地区的任务就是为了保卫太原，现在太原陷入危机，最后只能被迫撤退，但却迫使日军改变了突破山西然后包抄河北的战略，使得河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不至于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

会战期间，第83师全体将士作战勇猛无畏，前仆后继，坚守苦战大白水、盟腾村一带



/ 忻口抗战纪念墙。

阵地，始终坚如磐石，未使敌前进一步。但伤亡也是巨大的，会战结束全师官兵已不足一团。

忻口会战是由第二战区指挥实施的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21天。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浴血奋战，打得英勇顽强，付出了伤亡10万余人的重大代价。但歼灭日军2万余人，重创了骄横的“钢军”板垣师团，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中国军队战胜日军的信心。同时也为后方提供了转移物资、疏散群众的宝贵时间，减少了后方的损失。参加作战的部队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

称第18集团军）。而且参加会战部队的各级军官很多是黄埔军校生，他们都是军队的骨干，为抗战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忻口会战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

就在忻口会战即将结束之际，军政部突然发来一封电令，内容是调升傅正模为陆军第5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命他即日启程赴任。对此，傅正模认为自己所在的部队战事正酣，自己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先行离去，如真的这么做，不就等于“临阵脱逃”了吗？况且继任副师长到职需要时间，自己仍然有义务留守师部做好工作交接。因此，傅正模决定继续协助刘

戡，直到师部接到上级指挥单位——第14军军部下达撤退命令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服务两年的第83师。

傅正模在南口、忻口战役中与黄埔同学并肩战斗，为国家危亡置生死于度外，真正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也充实了自己统军带兵的战斗经验。他深为那些牺牲的同学、战友而痛心，也渴望能在抗战前线继续与日军浴血奋战，承担起一名国防军人真正的责任，但军令不可违，他不得不在与刘戡等人告别后启程南下赴任。黄埔

主要参考资料：

- 1.傅克刚、胡博著《傅正模将军传》，香港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和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 3.【日本】近现代史编纂会编《陆军师团总览》，新人物往来社，2000年版。
- 4.（台湾）《抗日战史》，1966—1982年版。
- 5.（台湾）《陆军第八十三师简史》，1960年10月版。
- 6.陈宇编著《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华文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纸上论兵”亦不凡

——慕中岳的《中国战争史·第一卷》

□ 蒲元 马砚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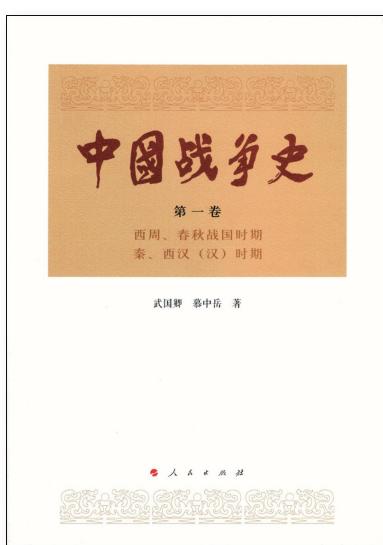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华民族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曾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研究这些战争和军事活动，对于汲取富国强兵的经验很有益处。克劳塞维茨亦指出：“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但是，中国历代战争史料浩如烟海，整理和研究谈何容易。1939年，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何干之的信中曾表达过一个遗憾：“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

因而，《中国战争史》（人民出版社）一书的问世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全书共八卷，记事上自远古社会、下至中华民国，乃是记叙中国历代重要战争的一部鸿篇巨制。《中国战争史》是军事科学院原战役战术部部长武国卿40多年心血的结晶。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一卷的作者却为武国卿、慕中岳合署。

慕中岳，1909年8月生，



/ 慕中岳。



/ 《中国战争史·第一卷》(武国卿、慕中岳著 人民出版社)书影。

河南武陟人，黄埔4期毕业生，在部队就职后还担任过黄埔第七分校战术研究班主任。历任国民革命军第97师参谋长、第8师副师长、整编第38师参谋长、第69军副军长等职。北伐时任第1军第1师第4团特务连指导员、党代表。在攻打南昌、武昌战斗中，多次参加奋勇队，身先士卒。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汉奸告密，家中老宅被入侵当地的日军悉数焚毁。1949年12月，慕中岳率部起义，随后进入西南军区高级研究班学习，结业后在解放军第二、第七高级步兵学校任教，不久转任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慕中岳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多年。1968年11月，他曾致信毛泽东，表示自己“从1957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1966年8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31卷，270万余字……”在慕中岳的《爱

国民主党派情况调查表》业务专长栏，他填的也是“中国战史编著”。

2016年，在给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主编的信中，武国卿道出了他与慕中岳在《中国战争史·第一卷》联合署名的原委：“本书第一卷中的一至五编，系1983年奉邓主席办公室的指示，与原国民党起义少将慕中岳先生共同完成。”

以战述史集大成

“战争是国家和人类历史的传记”，“历史上能看到的壮丽事业从来是用剑来完成的”，中国的历史亦堪称一部波澜壮阔的军事史、战争史。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刊行的诸多通史，尽管大都涵盖了军事和战争的内容，但受限于篇幅与体量，难以充分展开。而《中国战争史》则不同，它是一部以中国历代重要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史，断代完整，体例完备，脉络清晰，以战争为主线，通过记叙战争串联起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恢弘历史，以战述史特点突出。

《中国战争史》每卷（断代）下设编，全书共30编，编下设章。每个断代之始，均以“总论”为首先，内容包括：王朝的

建立过程，发展始末，政权、经济、军事建设及其对战争潜力的影响；重要战争梗概；战争特点和杰出将帅等。以第一卷第一编“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为例，该编首章“总论”下设9节，标题依次为“周王朝概述”“西周灭商的战争”“周朝的军政建设”“春秋战国主要国家的战略形势”“七国的革新与变法”“七国的建郡与长城”“七国的兵力与战争规模”“七国军制装备与军事学术的进步和发展”“夏、商、周、春秋战国的战争特点和著名将帅”。从次章起，聚焦重要战争及相关军事活动。

这种总分结构的体例设计，使读者在阅读各个朝代和时期的战争历史之前，便可将所涉朝代的政治、经济、国防建设的发展脉络，战争的宏观走向和基本特点，杰出将帅在国家兴亡盛衰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尽收眼底，从而在关注相对微观的战役战斗之前，能够从宏观上对每个断代的基本情况有所把握。不难看出，作者想要实现的是一种既聚焦战争，又不局限于战争本身，而带有历史大视野的阅读效果。

既然是专门史，《中国战争史》一书的重心自然在战争

上。纵览全书，其战争实例之多、内容之丰富，确为同类题材作品所罕见。仍以第一编“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为例，仅此一编，就有348页的体量，单行成书亦绰绰有余。该编除第一章“总论”外，另设5章，标题依次为“周朝东迁前后的战争”“春秋时期战争”“齐楚韩魏赵燕六国间的战争”“六国合纵对秦战争”“秦军进攻六国的战争”。显然，此5章中后3章均系战国时期战争。尽管这一时期战事频仍，但毕竟只有200多年的时间跨度，而作者颇费周章地将此间的战争分为六国之间、六国对秦和秦攻六国三个方面展开叙述，相较于一般史学著作按照时间线推进的方式，更有助于读者明晰地掌握战国时期的战争格局和阶段演进。

具体到每一章，内容均极为充实，但又绝非事无巨细地罗列。书中有关中国历代不同时期、性质、地域、民族、种类和结果的战争，都进行了精心筛选和梳理，经过大量比对和反复推敲后才落笔。为更好地反映重要战争全貌，对战前大局形势、敌对双方政治上的斗争、敌对双方军事上的斗争、作战序列（统帅、幕僚长、主

要将领、作战部队、兵力)、作战策划、作战阶段和经过、战后双方动向等相关问题皆有或宏大或细致的描写论述。

例如，第一编第三章“春秋时期战争”的第八节“吴越笠泽之战”，此战系越灭吴之战，对两国影响甚巨，但吴越远离政治中心，对春秋大势的走向影响相对较小，并不是传统史家书写的重点，因此历来对于笠泽之战的关注，相较晋楚城濮之战、邲之战及晋齐鞍之战等著名战役要小得多。但笠泽之战除决定了吴国的命运外，在战略方针、军事将领、指挥谋略等方面也有独特之处，值得深入分析。故作者从春秋后期吴越的基本战略形势写起，就吴越楚三方角逐、吴越间的反复较量、槜李之战、夫椒之战、越国的战败求和与复兴、吴郊战斗、越国的备战和大举攻吴等问题逐一展开论述，清楚交代了笠泽之战的前因，之后自然引出笠泽之战，而此中又包括了作战序列、作战经过和战后动向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仅“吴越笠泽之战”一节，下设的条目即达到13条之多，确实讲清讲透了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有学者认为，《中国战争史》



/ 郢之战遗址。

是共和国历史上战争通史研究的补白之作，亦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此说当不为过。

研战评战有深度

读过《史记》的人，恐怕都会对书中绝大多数篇目正文或前或后的“太史公曰”有深刻印象。在《史记》总序《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阐明自己的创作目的乃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即在著史的同时进行多方面评价，充分发挥史著经世致用、借鉴资治的作用，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方式就是撰写“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左传》等先秦史书“君子曰”的基础上所创新发展的史学批评形式，通过“太史公曰”，司马迁提出作史原则，议论历史事件，审视历史兴衰，

评论为政之道，发表政治见解，分析历史人物……可以说，“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得结论最为直接的表达，也是其“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统计，“太史公曰”的字数虽仅占《史记》全书的约6%，但言简义丰，精意深旨，议论宏阔，笔势纵放，使单纯的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著述，是《史记》的气血灵魂之所在，对后代史家也起到发凡起例的巨大示范作用。

《中国战争史》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史记》的这一优良传统。正如其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遗产。该书对各朝历代的典型战争和影响改朝换代、左右社会变革的重大战争，均以“评述”方式进行专业化的军事分析和解读。作者深刻挖掘战争史上的胜败得失，揭示战争事件和军事人物的作用及影响，形成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理论观点，体现了军人究治战史的鲜明特色。正所谓“言出将门，文随军旅”，这些理论的总结，离不开深厚的军事素养，两位作者得天独厚的军旅经历，成为奠定本书在战争史领域经典地位的重要保证。



/ 今日笠泽江。

晋楚邲之战是春秋时期影响中原格局的重要战役之一，历来受到学界关注。诸葛瑞强在文章中指出，晋楚邲之战中楚军展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和精湛的用兵之道：包括“知彼知己”的战前运筹；正确预判战争形势走向；积极谋势示弱于敌以骄其志，示形动敌探查虚实；当机立断，先敌出击等，因而大获全胜。至于晋军的失败，则在于将帅不睦，政出多门；主帅指挥乏力，将无威信，不纳良言，缺乏决断和担当；尤其是主帅荀林父关键时刻下达“先济者有赏”的命令，造成军心涣散，军队土崩瓦解。海军航空大学的任真、吕超在文章中指出，楚国胜因包括：发

展生产，重视军事；“先知”“相敌”制胜；掌控战场主动权，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巧用地形，因地制宜。晋国败因包括：晋国将帅意见不合；晋军指挥结构冗杂；荀林父为将无能，消极应战。这些评价都是相当中肯的。

那么，《中国战争史》第一编第三章中对于“晋楚邲战役”的评述，又是如何展开的呢？首先，作者抛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来，城濮战后的晋国已是中原地区赫赫声威的强国，何以在30余年后败在楚军手下，确有诸多令人深思之处”。接着，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是晋国战略决策的失误，失去了制衡楚国的盟友，使自己

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这是晋国兵败最沉痛的教训。”“二是战略上的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友的具体战略态势恰当地决定交战的时机和方式，是关系战争胜负最重要的环节。晋军正是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失算于一时，进而导致了全局的失利。”“三是楚国在邲战中的胜利，虽并非完全出于战前对双方战略全局的详细分析判断，提出了胸有成竹的正确战略与策略。但它却善于分析和掌握临战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渐坚定了与晋交战的决心，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与策略。无疑，这对弥补楚军原先战略上谋划不足的缺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每一观点之下，都有结合史实的详细论述。行文至此，应该说，楚胜晋负的主要原因已经解析得十分清楚了，但本篇评述却并未言尽于此。

作者深知，编修战史的目的在于启迪后人，胜败双方固然各有其经验教训，但败者是否百无一处，胜者又是否毫无破绽？故而，在评述的第四方面，作者即以独到的视角，从胜者楚军进攻渡河晋军时投入力量不足，与晋军阵地战时指挥统一性不够，将士忙于抢夺战利品缺少敌情观念等三个方面

面入手，得出“楚军在这次作战中，因在指挥上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结果未能夺取更大战果，教训是深刻的”这一结论，读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在整篇评述的最后，作者话锋一转，指出“楚军此役的胜利，仍远未达到战略上的彻底胜利。楚人说的‘犹有晋在，焉得定功’的警语，是教育楚军将士不要把此役当成全局上的一劳永逸之胜，时刻警惕强晋的存在。楚军的这种姿态，无疑反映出其决策集团颇为明智的战略头脑。”这段评论，看似言不在战，实则反映出作者重视规律总结，超出战争评价战争的一贯风格。

纵观“晋楚邲战役评述”，确实做到了该书凡例中所说的“评述力避人云亦云，在采纳百家之长的基础上，力争提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看法”。书中类似的精彩评述还有不少，第一卷第三编第十四章的“垓下战役评述”亦是一例。“垓下大战，是刘邦、项羽间的最后战略决战，项羽军在垓下作战中之所以迅速被刘邦军歼灭，除开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战场失利的直接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低能。”具体体现在，“战略撤退中疏于戒备”，“固陵之战缺乏战略远见”，“垓下突围造成战略



/ 垓下之战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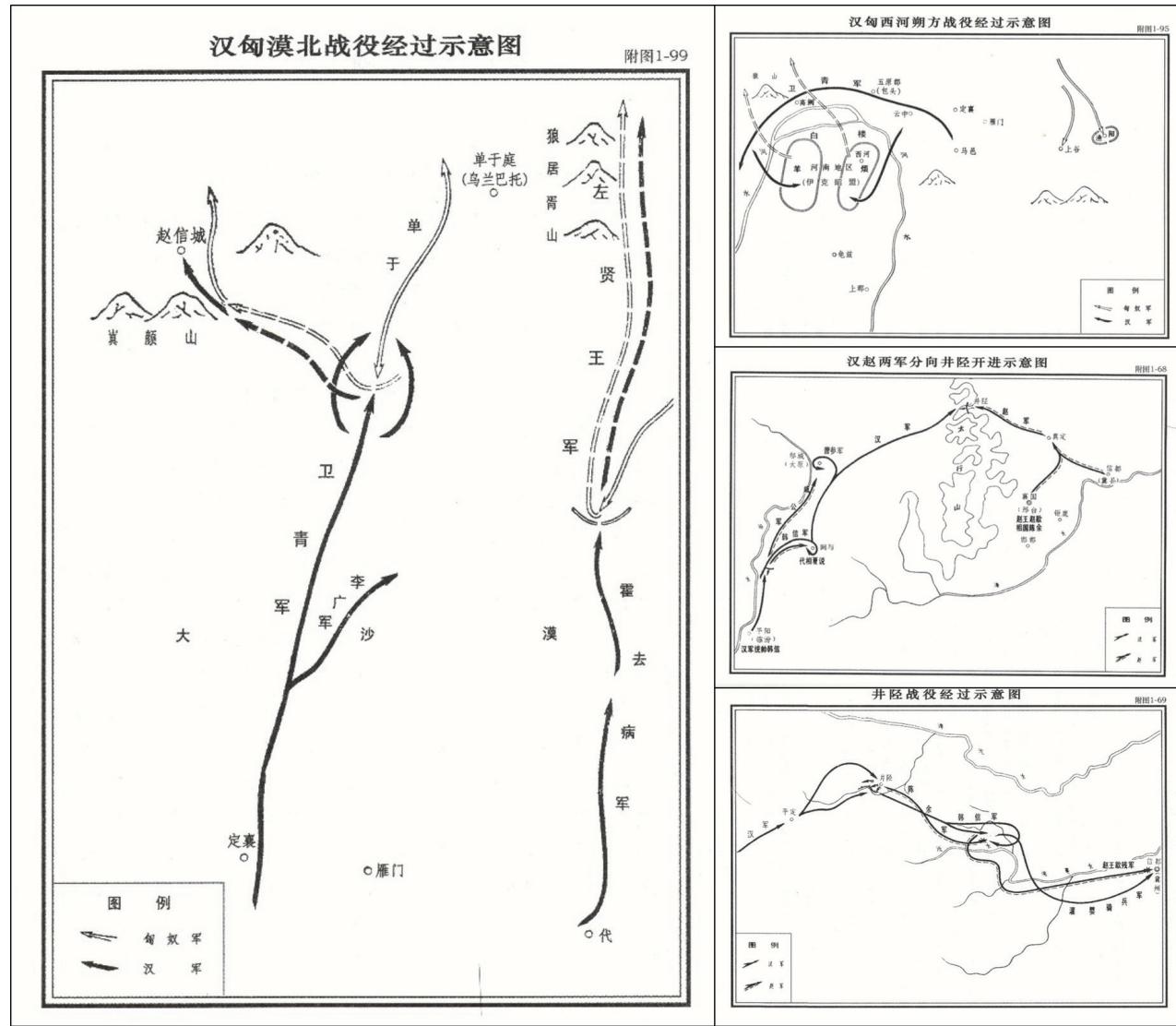
上的不击自溃”，“退守垓下，不返江东，是战略上最后的失策”等四个方面。如果没有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以区区千字篇幅，想要将垓下之战项羽的败因提炼到如此程度，是很难实现的。

左图右史见功力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理环境是影响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孙子兵法·计篇》提出夺取战争胜利的“五事”，其三即为“地”，“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至明代，专用于军事的兵要地志已颇具雏形，出现了一批军事色彩浓厚的军事要地志，对当时军队的兵防战守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图志、图说类的兵要地志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出现，著名的如《九边图志》和《二关图说》，采用“地图注记式”的方法论说防区内的地理形势、当面敌情及兵力部署。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曾共同签发过《关于实地考察地形地理增修地图与编撰兵要地志》的命令。时至今日，地图仍然常被称为指挥员的眼睛。

既然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记述和研究战争的史书中，地图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左图右史一词，出自《新唐书·杨绾传》：“性沉静，独处一室，左图右史，凝尘满席，澹如



/ 漠北战役、西河朔方战役、井陉战役经过示意图。

也。”原意用来形容典籍图史收藏的丰富，同时也说明图与史是不能分离的，即舆图与史书分置左右。文字构成的叙述与线条描绘的图像互相参补印证，即所谓“左图右史，图史相因”。

但战史的制图是极为不易的，这主要是由战争的动态复

杂性与图示的平面静态化之间的天然矛盾所决定的。同时，战史附图除需展示军事行动外，山川地貌、疆界政区也是必不可少的，其间还要考虑古今变迁等各种情况。换言之，如何用图示展现出兵要地志、攻守态势、战事进程甚至谋略对抗

等，这些都极大地考验着史家的综合能力。

可喜的是，《中国战争史》在这方面有不俗的表现。2018年，武汉市档案馆与慕中岳后人取得联系，就慕中岳生前所著《中国战争史》著作及手稿捐赠一事达成意向。在档案馆发

布的新闻中，特别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慕老先生通过大量史料，研究从春秋战国、楚汉三国、隋唐两晋、五代十国、唐宋元明清时期直到民国初期所发生的重大战役的政治背景、战争特点与战争概况，形成了既有文字也有战争经过展示图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手稿”。可见，武汉市档案馆认为战争经过展示图是该书的亮点之一。

例如，《中国战争史》第一卷第五编“西汉时期（中）”，以两章零两节的篇幅叙述汉匈之间的铁马烽烟，共计配图 16 幅。这些附图中既有漠南会战、漠北战役、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之战等带有决战性质的大型战役示意图，也有关市诱敌奇袭战役、雁门战役、西河朔方战役等相对较小规模的战役示意图。

一般而言，大型战役经过示意图重在体现对阵双方的宏观态势和大体行动，如漠北战役经过示意图，主要反映了卫青和霍去病两路大军分别自定襄和代郡向北进击，以及匈奴部队抵抗、撤退和汉军追击情况，对于重要作战区域真颜山、狼居胥山的山川形式亦有所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汉之飞将军李广正是在漠北战役结束返

程时自刎而亡的。当时，李广奉命从东路出击，由于迷失了方向，未能如期到达漠北，待卫青率军回师行至漠南时，才与主力相遇。卫青让其长史查问李广等军失期到达的原因，未曾想年逾花甲、身经百战的李广既懊悔于迷失道路延误会师，更不愿受刀笔小吏的责难，竟自刎身死。对于李广所部在分进途中因迷失道路而未能与主力会师的情形，漠北战役经过示意图中也有反映。

而一些较小规模战役的经过示意图，对战场态势的描绘就相对更加具体，如西河朔方战役经过示意图。公元前 127 年春，匈奴左贤王军大举入袭上谷、渔阳两郡，杀掠人畜甚众。汉武帝见匈奴军注意力在东北，立即命卫青和李息率部西出云中，沿河西进，避实击虚，对河套一带匈奴军进行远距离迂回包围。汉军依计而行，突袭了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占领的河南地区，大获全胜，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匈奴二王仅率少数卫骑逃走，此即西河朔方战役。在示意图上，东西两个战场双方的攻防行动都表现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对于一些作战过程比较复杂或前后态势变化较大的战役，

《中国战争史》还运用了连续配图的方法。如第一卷第三编“楚汉战争时期”第十三章中的井陉战役，就配图 2 幅，分别展示了汉赵两军向井陉开进和战役经过的情况；其后的潍上战役，更使用了 3 幅附图，直观展示了潍上战前、战中、战后（追击）的不同态势。

总而言之，包括作战经过示意图、形势发展示意图、疆域示意图等各类高质量附图，为读者提供了不同于文字叙述的战争阅读视角，对于研读史裨益良多，堪称《中国战争史》的重要特色之一。

军事科学院原战争和战略理论研究部部长余起芬这样评价《中国战争史》：“这部长篇巨著……既处处透射出历史的沧桑和厚重，又有着审视每次重要战争活动独树一帜、开人心扉的观点，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观贯穿于字里行间。应当说，这部书有着重大的科学价值、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填补我国军事和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且是具有令人赏心悦目难得一见的好书。”这其中，自然也包含着黄埔同学和教官慕中岳的心血与功绩。



春城飞花处，翠湖藏军魂

——记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办学地昆明

□ 赵灿林

昆明，云南省的省会，著名的春城，也是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办学地。

历史长卷：从古滇文明到现代都市

“波光潋滟三千顷，莽莽群山抱古城。四季看花花不老，一江春月是昆明。”昆明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昆明人”在滇池一带繁衍生息，开启了这片土地的文明序章。他们在滇池的滋养下，逐步发展出独特的生活方式，为后来昆明的繁荣奠定了最初的根基。

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蹻入滇，在滇池地区建立滇国，修筑苴兰城作为都城，这一举

措加强了昆明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中原文化开始在这里传播交融。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设置益州郡，治所就在现在昆明的晋宁区，将滇池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进一步推动了昆明地区的发展，使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的交流日益频繁。

唐朝时期，昆明地区属于南诏国的势力范围。南诏国在此筑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始。大理国时称鄯阐城。拓东城、鄯阐城分别为南诏国、大理国的东京，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之一。宋朝时期，昆明地区属于大理国的版图，延续着南诏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商业贸易兴盛，经济持续繁荣。

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治所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瞻思丁主持疏浚滇池、修建松华坝，将中原农耕技术引入，昆明首次成为全省政治经济中心。此后历经明、清，昆明一直保持着重要地位，城市建设不断完善，人口逐渐增多，文化日益繁荣。

到了近现代，昆明更是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成为重要的历史舞台。1911年辛亥革命后，昆明成为云南省的省会。民国时期，虽历经多次政治和军事动荡，昆明始终是云南的核心所在。抗战时期，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昆明被誉为“民主堡垒”，大量内地的学校、工厂和机构迁至昆明。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汇聚了众多大师学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明开启了新的篇章，随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更新着面貌。如今，漫步在昆明的街头巷尾，那些古老的建筑、历史遗迹，仿佛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不禁沉醉于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中。

铁血军魂：从讲武堂到黄埔分校

黄埔军校第五分校的前身为创建于1909年8月28日的云南陆军讲武堂（1912年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至1930年共举办19期。1930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依照陆军讲武堂旧规，成立讨逆军第10路军军官教导团（以下简称军官教导团），至1934年底，教导团共办3期（后衔接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20期、21期、22期）。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官教导团，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400人。其中有朱德、叶剑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也有朝鲜崔



/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旧址。

庸健、越南武元甲等国际名将。云南讲武堂师生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云南讲武堂迎来历史性转折。国民政府将其统一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分校系列中，纳入黄埔军校体系。1934年，云南省主席龙云主办的讨逆军第10路军总指挥部军官教导团奉令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1938年3月，依据全国各地分校成立先后顺序，昆明分校奉令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在抗战烽火中传承黄埔军魂，延续军事教育血脉，壮大黄埔力量。

黄埔军校五分校继承云南陆军讲武堂传统，自1935年7月昆明分校首批学生、军官补习班学员入学，至1945年10月第五分校最后一期学生并入成都本校，先后培养7期学员，共计11608名军官，其中第14至20期大部学员分赴滇军第60军、第58军等部，在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中重创日军，用热血写下“滇军悍勇”的注脚。在解放战争后期，近九成起义滇军军官出自五分校，为云南和平解放奠定基础。如今，旧址已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此举办的《百年军校将帅摇篮》主题展，以3000余件文物史料再现“革命熔炉”的历史温度，使这所军校在历史的荣光

中定格。蓝花楹掩映的庭院里，游客镜头下的铁血岁月与花香鸟语构成奇妙的时空对话

春城底色：造物主偏爱的诗意图居

北纬 25° 黄金纬度，赋予昆明得天独厚的气候密码。昆明属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 15℃ 左右，年均日照 2200 小时左右，无霜期 240 天以上，年均降水量约 1000 毫米。由于地处低纬度高原，再加上高原湖泊滇池对温湿度的调节，使得这里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鲜花常开、草木四季常青，是著名的“春城”与“花城”，也是人们休闲、旅游、度假、居住的理想之地。

昆明丰富的生态环境也孕育了多样的生物。这里共有 9 个植被类型，20 个植被亚型，56 个群系，118 个群丛，分别占云南植被类型的 75%，植被亚型的 59%，群系的 33%，群丛的 56%。动植物种类繁多，有中国特有物种 1764 种，云南特有物种 426 种，昆明特有物种 85 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 127 种（动物 73 种、植物 54 种）。昆明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45.27%，城市绿化覆盖



/ 滇池。

率也不断提高。近年来，昆明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滇池水质不断改善，沿岸湿地成为候鸟栖息的天堂。滇池金线鲃、云南樱花等珍稀物种，彰显着这座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无论是在茂密的森林中，还是在广袤的湿地里，都能看到各种珍稀动植物的身影，它们共同构成了昆明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清代孙髯翁笔下的大观楼长联，曾描绘昆明的山水壮阔。滇池烟波浩渺，西山龙门俯瞰着城市与湖光的交融，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以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地貌，诉说着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清晨漫步滇池畔，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黄昏时分登上西山，“睡美人”在晚霞中舒展身姿，这样的自然馈赠，让昆明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

每到冬季，成群的红嘴鸥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湖面上盘旋、嬉戏，为滇池增添了一份灵动与生机。游客们与红嘴鸥亲密互动，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时光。

西山风景区位于滇池西岸，由碧鸡山、华亭山、太华山、太平山、罗汉山等山峰组成，宛如一位仰卧的睡美人，静静地守护着滇池。西山森林茂密，植被丰富，空气清新，是天然

的大氧吧，是昆明市民周末的休闲好去处。景区内有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著名景点。站在龙门上，俯瞰滇池和昆明市区，美景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石林风景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以壮观的喀斯特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石头千奇百怪，有的像利剑直插云霄，有的像动物形态各异，还有的像城堡巍峨耸立。大石林迷宫般的石阵，小石林传说中的阿诗玛，都让人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石头世界，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穿梭于石峰之间，感受历史的沧桑和大自然的神奇力量，让人陶醉不已。

云南民族村是昆明旅游的热门景点之一，其中包括云南主要的25个少数民族村寨，是展示云南各民族社会文化风情的窗口。走进民族村，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文化的大观园。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村舍建筑，生产、生活和宗教习俗，还可以观看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参与传统节日活动，亲身体验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和独特风情。

除了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昆明老街区也值得一游。老街始建于大理国时代，距今已有900

多年的历史，曾是清廷统治云南贵州的总督府所在地，被称为“王者之地”。现有文物保护单位1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3处，市级3处，区级4处；历史建筑42处，包括云南贡院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五分校）旧址、西南联大旧址、抗战胜利堂、金马碧鸡坊、大观楼、朱德故居、聂耳故居、马家大院等，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官渡古镇位于昆明主城区东南，地处滇池北岸、宝象河下游，是历史上环滇池地区的商贸重镇。古镇既是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誉满滇中的古渡口及佛教圣地。不到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五山”“六寺”“七阁”“八庙”等多处景观及上百间保存完好的“一颗印式”民居，其中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刚塔”最为著名。

若想带走春城的浪漫，斗南花卉市场是必去之地，这里日均交易鲜切花300万枝，玫瑰与百合的芬芳里，“亚洲花都”的美誉实至名归。

文化熔炉：多元共生的民族交响

昆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

居的城市，拥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昆明方言属西南官话—云南片—滇中小片，主要指昆明市盘龙、五华、官渡、西山四城区汉语方言，从历史文化上看，既保留了移民中古语音的稳定性，又融入了中原近古语音的发展性和进步性，词汇丰富多彩、古拙朴实、雅达纯净。比如昆明方言里的儿化音就十分有特色，“我吃一个梨儿”“明儿天”等，让语言听起来更加轻快、俏皮。还有那些独特的语词，“你要来呢嘎”中的“呢”和“嘎”，让原本生硬的语气变得亲切柔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昆明的传统戏曲同样源远流长。滇剧作为云南省主要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清道光年间，至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滇剧声腔独特，表现力强，三大声腔——丝弦腔、胡琴腔、襄阳腔分别源于秦腔、徽调、汉调等古老声腔，又受到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滋养，板式丰富多变，曲调自然流畅，能表演各种题材、样式、结构和情调的剧目，被誉为“滇粹”，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明曲剧则是昆明独有的汉族戏曲戏种，以昆明方言、扬琴说唱为基础，以朴实自然、

接近生活的表现形式著称，现已基本完成戏曲化进程，形成了以板腔体大调为主，曲牌体小调为辅的声腔体系，叙事与抒情并重，音乐既明白如话又优美动听，既含蓄委婉又纯真质朴，极富地域特色。

在特色文化方面，古滇文化是昆明的一张亮丽名片。古滇文化是春秋末至东汉初期以滇池为中心，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外国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1955—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进行了5次发掘，清理了战国晚期至东汉初年的古墓86座，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滇王之印”，有力地印证了古滇国的存在。2021年以来，晋宁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汉晋时期城墙、壕沟、道路、大型高台建筑基址以及与“益州郡”有关的铭文瓦当、官印封泥、有字简牍等实物，证实了河泊所遗址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这些出土文物以青铜器居多，种类丰富，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反映了古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古滇文化之后产生的爨文化、南诏文化、



/ 泼水节。

大理文化，乃至今天云南境内26个民族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都有古滇文化影响、滋润的痕迹。

昆明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彝族的火把节，人们身着盛装，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载歌载舞，热闹非凡；白族的三月街，集商贸、文化、娱乐为一体，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傣族的泼水节，人们相互泼水祝福，在水花飞溅中传递着欢乐与祝福。各民族的传统服饰也是各具特色，白族的服饰色彩鲜艳，图案精美，以白色为主色调，搭配着鲜艳的花边和刺绣；彝族的服饰则以黑色、

蓝色为底色，绣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展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昆明独特的文化景观，让这座城市充满了魅力。

昆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烽火弦歌中的教育奇迹——西南联大。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北平的宁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背负着文化火种南迁，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存续仅8年零11个月的学府，却在战火淬炼中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传奇。

在西南联大的校舍里，铁皮屋顶在暴雨中轰鸣，茅草房

里油灯摇曳，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与研究。朱自清穿着露脚趾的皮鞋授课，华罗庚在牛棚隔壁推导数学公式，陈寅恪双目几近失明仍讲授“两晋南北朝史”。物理实验室里，师生们用自制仪器测量数据；图书馆中，学生们为查阅资料通宵达旦。在这里，教授们的授课方式各有特色，闻一多讲《楚辞》，常常身着长袍，在昏黄的灯光下，将古老的诗句讲得荡气回肠；吴大猷的物理课，能把深奥的理论讲解得通俗易懂，激发学生对科学的无限探索欲。

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文科有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理科有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等巨匠。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在这种氛围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众多人文社科领域的杰出人才。杨振宁回忆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时说，正是在这里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他在日后的科学道路上不断前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也深受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影响，形成了独特

的风格。

西南联大师生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学生们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街头巷尾、乡村集市，用话剧、演讲等形式唤起民众抗日热情。有的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为保卫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学校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为抗战提供智力支持，如经济学专业师生研究战时经济问题，提出一系列应对策略；地质专业师生进行矿产资源勘探，为战时工业发展提供保障。

西南联大解散后，各校复员北归，但它所代表的“刚毅坚卓”精神，早已融入中国教育的血脉。其独特的办学理念、自由的学术氛围、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成为后世教育的宝贵财富。如今，西南联大旧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着无数人前来瞻仰，人们在这里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味觉密码：舌尖上的昆明记忆

昆明，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不仅有醉人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还有令人垂涎的美食。滇菜口味以鲜、辣、香、浓著称，融合了汉族和10余个少数民族的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

的风味，如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过桥米线无疑是昆明美食的代表之一，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关于过桥米线的由来，有一个温馨的传说。相传，清朝时滇南蒙自县城外有一湖心小岛，一位秀才在岛上读书，他的妻子常常做好米线给他送去，但等到达岛上时，米线已经凉了。后来，妻子偶然发现鸡汤上覆盖着的鸡油能保持汤的温度，于是先用肥鸡、童子骨等熬好清汤，上覆厚厚鸡油，米线在家烫好，配料切得薄薄的，到岛上后用滚油将配料烫熟，再加入米线，这样做出来的米线鲜香滑爽。因为到岛上要过一座桥，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后世就把这道美食叫做“过桥米线”。如今，过桥米线已经成为昆明的一张美食名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端上桌，滚烫的鸡汤上漂浮着一层金黄的鸡油，这层鸡油下蕴含着巨大的热量。将生肉片、蔬菜、鹌鹑蛋等食材依次放入汤中，这些食材瞬间被烫熟，鲜嫩的肉片、翠绿的蔬菜、爽滑的米线，再加上浓郁的汤汁，每一口都让人陶醉。

汽锅鸡也是昆明的一道特

色名菜，属于滇菜系，早在200多年前就在滇南民间流传，因用汽锅蒸制而得名。制作汽锅鸡，选用的是建水特有的紫陶汽锅，这种汽锅质地细腻，保温性好。将鸡块、生姜、胡椒、小葱、精盐等放入汽锅中，再把汽锅置于放满水的蒸锅上，用纱布将汽锅隙缝堵上以免漏汽，然后放到火上煮。水开后，蒸汽通过汽锅中间的汽嘴不断循环，将鸡逐渐蒸熟，并在锅内聚集转化为汤汁。经过3至4小时的蒸制，鸡肉耙而不烂，用筷子一拨就“骨肉分离”，鸡汤鲜香浓郁，回味无穷。

每年6月至9月是吃菌子的季节，这是大自然给予云南人的特殊馈赠。在昆明，吃菌子是一种全民热衷的活动，一年总要吃上几回，才觉得没有辜负夏天，昆明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是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地，目前市场内野生菌达268种，日均交易量达300吨，高峰期单日交易量可达600余吨，年交易额已突破100亿元。市面上野生菌品种繁多，诸如牛肝菌、鸡枞、松茸、青头菌等都是主打品种。野生菌的售价根据品种、品相不同，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

此外，昆明还有许多值得

一试的美食。如破酥包子，皮坯酥软醇香，入口有化溶之感；宜良烧鸭，皮脆肉嫩，色泽红亮，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小锅米线，用炭火煮制，汤汁浓郁，米线爽滑，搭配鲜美的肉末和各种调料，味道十分浓郁；烧饵块，外酥里糯，加上甜酱、辣酱、油条、肉松等各种配料，口感丰富，是昆明人喜爱的早餐之一；还有玫瑰米凉虾，用大米制浆煮熟后制成凉虾形状，淋上特制的玫瑰糖水，口感清爽甜美，是夏日消暑的佳品。

昆明的美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每一道美食都承载着昆明的历史和文化，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暖。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都能在昆明的美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记忆。

未来之城：向新而生，向海而兴

展望未来，昆明蓝图壮阔。作为“一带一路”南向通道的关键节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昆明样本”。昆明正积极走上“绿色经济”“大健康产业”“数字经济”三大赛道，在

中老铁路的汽笛声里，以“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姿态拥抱世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在滇池之滨加速布局，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让“春城”不仅有花团锦簇，更有科技锋芒。

从马可·波罗笔下的“押赤城”到现代开放都市，昆明始终以包容姿态拥抱世界。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态的灵动；既有民族文化的绚丽，又有国际都市的活力。未来，这座“高原明珠”将继续在开放创新中书写传奇，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绿色枢纽与旅居典范。

从黄埔军校的操练号角到西南联大的琅琅书声；从多元共生的文化长卷到蓬勃发展的经济版图；从滇池的浩渺烟波到中老铁路的钢铁动脉……昆明，这座承载着黄埔军魂与西南联大精神的城市，正以“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诗意，书写着新时代的开放篇章。无论你是追寻历史的足迹，还是向往自然的美好；无论你是钟情美食的诱惑，还是期待未来的无限可能，昆明，都值得你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约会。

黄埔

（作者系黄埔二代，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